

夏潮 論壇 6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出刊 第一卷·第六期



**「前進」與「龍旗」對上了
他們為什麼「回歸」大陸？**

李政道的媽媽也是政治犯
侯德健談中國大陸與台灣

陳映真談江文也

席壯學喝采！

六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院會中，八位黨外委員為了抗議國民黨濫用「多數暴力」，集體退出院會。這個退席壯舉，對國民黨的表決部隊作了一次強而有力的打擊。

國民黨配置在立法院的表決部隊，時常以形式的多數否決民意，粉碎至真至善的事理，通過成全自己、打擊異己的法律，甚至剝奪反對者發言的機會。

這支無往而不利之表決部隊，如果是由人民親身選出的民意代表組成，則即使被它打敗，被它擊潰，倒也可以服輸，不必怨怪。

然而，這支表決部隊的主力，是三十幾年前組成的老兵，完全不具一絲民意基礎，毫無一點代表性，祇不過是國民黨為了壟斷議會、抗拒民意、壓迫異己、圖謀私利而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木偶。

這支威力強大的表決部隊，在立法院的戰場上馳騁縱橫，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當它的鐵蹄一再瘋狂蹂躪民意、踐踏民主之時，除了以退席抗議外，別無任何對制之道。

八位黨外立法委員集體退席的壯烈行動，就是在抗議這支不受民意駕馭的表決部隊，一而再、再而三的踐踏了民主，蹂躪了民意。

黨外立委集體退席的壯舉，擊中了國民黨的要害，不得不訓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三位召集人發表一份辭解的聲明。聲明中列舉選罷法修正案在審查會中的發言次數，以及有關限制記法和選委會組織等兩項條文的發言次數，企圖以此證明：「無論在審查會或院會，都是經過反覆辯論，充分討論，最後由於委員各持己見，只有訴諸公意，進行表決，此兩項表決，完全合乎民意法治的基本原理。」

這種辯解完全是強辭奪理。首先，選罷法修正草案的審查會，固然相當尊重黨外委員的發言權，並未輕易進行「停止討論，逕行表決」的處理，但審查會和院會是立法院審議法案的兩個不同階段，院會的委員遠超過審查會的委員，而委員發言的目的是要說服其他委員支持其意見，所要說服的對象既然截然不同，則審查會的發言次數絕對不能和院會的發言次數混同計算。尤其是黨外立委集體退席的第八條，在院會中僅有一位非審查會的委員發言，如何能說已經「反覆辯論，充分討論」？

其次，表決固然是議會中達成決議的必要手段，但符合「民主法治基本原理」的多數決，必須符合幾項要件：



爲黨外立委的退

1. 流動性。不同意見者之間，並非在開始討論前即有固定不變的陣容，而是可能經由討論辯結的過程，相互影響，相互轉化，使原先不同意者的陣容之間相互流動，形成最後的多數與少數，而在表決中以多數作定奪。

2. 開放性。不同意見者之間，並非在討論以前即設定自己最後的結論，而是以開放的態度，聽取別人不同的意見，再作判斷與抉擇，決定自己的立場。

3. 動態性。討論前並沒有任何預設的結論，沒有任何不可逾越的「堅持」，而是可能經由討論磋商的程序，漸次形成最終的見解或結論。

4. 自主性。參與討論與表決者，皆具有獨立自主的地位，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觀點，而且自由表達，自由投票，不受任何背後力量的控制或指使。

祇有在上述四項條件設定的情境下，多數決才符合民主的原則。然而，當前的立法院中，國民黨籍委員都不敢公然違抗黨部的指示，因此在議場中的發言與表決，經常祇不過是在扮演木偶的角色，完全沒有「自主性」；而且，國民黨經常在立法院審議某項法案前，就先「下達命令」，指示黨籍委員採取何種立場，使得立法院開會之前先已有了結論，討論和表決根本祇是形式，完全不具任何實質意義。

在這兩種限制下，立法院中的討論和表決，經常是在開始之際，多數和少數之間即已形成固定不變的陣容，全然沒有「流動性」，無法經由討論過程相互轉化；因此，居於多數派立場的委員，完全是以封閉的態度與會的，不願以「開放性」的態度面對相反的意见；在此狀況下，立法院中所有涉及政策性的法案，在討論和議決過程中，往往是在事先設定的結論或「堅持」之下進行，不具任何「動態性」的意義。

由於立法院的議決過程，往往不具備「流動性」、「開放性」、「動態性」和「自主性」，因此，各種政策性法案的討論和表決，往往祇不過是立法院履行其做為行政院或執政黨的「橡皮圖章」任務前的蓋章準備動作而已，不具備多數決應有的前提與意義，而這種狀況下所做的表決，無非是所謂的「多數暴力」而已，完全不符「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

正是由於表決部隊無堅不摧的威力，國民黨在立法院中以為所欲為，製造任何符合私心己利的法律，肅清一切反對的主張與聲音。對於這種國民黨卸用的立法機構，我們祇有以退席作抗議。

夏潮論壇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出刊

第一卷・第六期

目錄

《社論》 **為黨外立委的退席壯舉喝采！** 封面裡

《讀者之頁》 4

政治經濟

李政道的媽媽也是政治犯 / 成中雄 7

趙×呆的故事 / 陳松 9

「前進」與「龍旗」對上了！ / 李明熊 10

—劉元方事件併發症

破壞和諧，責任在誰？ / 幼鵬 12

—黨外集體退席抗議的一幕

這算不算選舉活動？ / 林妍 16

「華同」破產內幕 / 林坤 19

台中市計程車司機集體抗議事件 / 洪鯤 22

侯德健論中國大陸與台灣 / 張楚勇 29

—訪「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

秋海棠依舊，只是落紅罷了！ / 洪金立 33

—他們為什麼「回歸」大陸？

《議會走廊》 ● 限制連記法強制表決通過 ● 張德銘也會放水嗎？ 37

● 黨內閹割，黨外打圓場 ● 藍榮祥沒有說出真心話

● 林獐羊已經日薄西山 ● 議員出國，各懷鬼胎

● 古蹟遺址立墓碑，警方大喊「犯沖」

● 垃圾問題爭論不休，填山、填海各有千秋

● 議員會場打鬥，場外兄弟助陣

● 瓦斯公司包賺不賠，非特權份子莫屬

● 議會預算編列浮濫，居然勞動縣長刪減

● 議會淪為派系私器，議員提案議會總評

十年滄桑話「中」美關係(下) / 奧森柏格 / 著・李日章 / 譯 43

《華人世界》 ● 廖承志過世所引起的問題 ● 本屆中共「人大」所透露的訊息 52

● 中共石油開採 ● 香港問題最新發展

—一場鉅額的賭注

世界之窗

《潛望鏡》 ● 智利皮諾切政權麻煩大了 ● 金泳三絕食事件的回響 56

● 美國主教的反核震撼 ● 布里滋涅夫模式的再版

他山之石——也談接班人問題 / 南方朔 59

—塞內加爾桑果政權過度的典範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註明出處。

歷史與思潮

後藤新平的治台方案 / 廖祖堯 64

《歷史小品》 日人治台的政策試探 / 王詩琅 66

斷裂的巨龍 / 紀斷弦 68

——評被扭曲的民族主義

台灣不是美國的禁戀 / 余逢時 73

文藝

寫作是一個思想、檢討和自我批判的過程 / 李瀛 74

——訪陳映真

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 / 陳映真 78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發行人 柯水滸
 社長 黃溪南
 總編輯 蘇逸凡
 執行編輯 鍾 喬
 法律顧問 / 江鵬堅·易金全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51887·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翊豪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 J. 07932
 U. S. A.

美西聯絡處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 S. 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0791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9245210
 各地經銷處：
 自強書局 電話：(032)224807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228054
 英華書局 電話：(037)3202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333363
 義聯圖書社 電話：(052)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543743
 花蓮文具店 電話：(038)322941
 紐約書局 電話：(089)322267

海外訂戶請注意！支票
 抬頭請寫 夏潮論壇社
 本社啓

文季

第2期
已經出刊!!
絕讚發售中!!

黃春明最新小說「大餅」

本期文季
焦點作品

李南衡小說連作：MADE IN TAIWAN, R.O.C.

新生代的
新銳作品

- 東年：墨綠色的夜
- 張橫眉：彎刀
- 蘭花
- 左輪槍

評論

- 施淑：二〇年代文藝理論的發展與反省
- 許南村詩評：試論吳晟的詩

何欣：朱自清

一位最誠懇的教師

■唐文標：我的詩生活 ■郭楓：一縷縷

希望的燃燒 ■尉天驄：記三個死去的同學

● 吳晟 · 趙天儀 · 蔣勳 · 新生代詩人 · 楊渡 · 楊傳楷

● 李疾的詩

文季雜誌社 · 社址：台北市木柵一支一五五號信箱 · 電話七〇〇一〇八〇——
劃撥帳號：五七〇〇〇文季雜誌社帳戶 · 零售每本九〇元 · 訂閱全年四五〇元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電話：9142941

買新“夏潮” 基金會 典藏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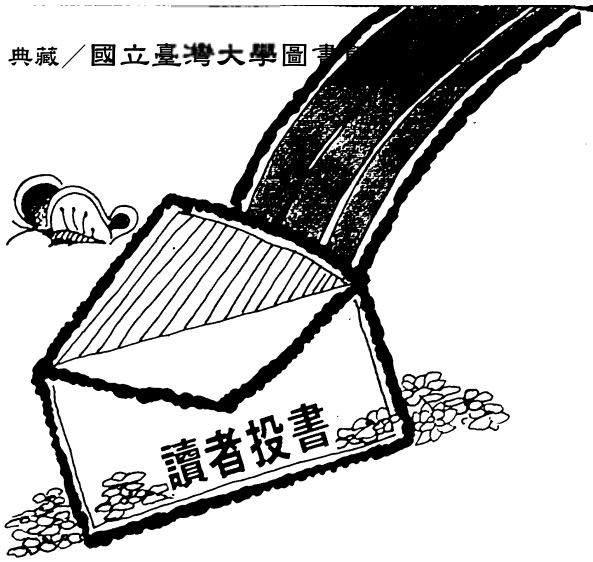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會報導

懷念舊“夏潮”，支持新“夏潮”



希臘狗與台灣龍

編輯先生：

看到「亞洲人」的一篇文章說「台灣沒有龍」，作者署名「西尼克」，應該是希臘狗（Cynics）的音譯，「希臘狗」不是台灣人，是外國人，不知道台灣有龍尚情有可原，但「亞洲人」的編輯是台灣人，台灣人不知台灣有龍，就令人驚訝了。

台灣人過年舞龍舞獅是千百年的風俗，大廟宇門口的柱子上也都盤踞着龍，不識字的阿公阿婆，也沒有人不知道龍的。（不信，可作民意調查。）「亞洲人」的編輯還把「台灣沒有龍」標得大大的，真是亂亂講。

國民黨說「永遠和民衆在一起」，「亞洲人」的編輯如果和民衆在一起，也應該不至於不知道台灣是有龍的。「亞洲人」要宣傳什麼政治主張，只要對老百姓好，我們都贊成，但講話要實在，不可做睜眼睛子黑白講什麼「台灣沒有龍」。說「台灣沒有龍」，那是知識份

子的幻想，不是真正的台灣人，也會被國民黨笑話的。

阿斌上

統戰何其多

編輯先生：

最近讀到一篇李筱峯的文章——「龍的傳人快回頭」。李先生認為侯德建回大陸會被中共利用為統戰宣傳，如果侯德建到大陸後附和了中共的政治宣傳，這還可說得過去。但李先生却以此認為「長江美」、「黃河壯」也會「恰恰好予對岸的中共政權一個統戰的好機會」；及「龍的傳人」這首歌，也會「提供了中共對我統戰的機會」。這就未免推論過份了。

「長江美」、「黃河壯」這是對祖國河山的歌頌，祖國河山不是政權，甚至不是有情之物，千百年屹立如斯，只有「檻外長江空自流」，從也沒聽說山川也可以為那個政權做統戰。「龍的傳人」歌詞中有幾句歌頌長江、黃河也被視為統戰。統戰又何其多，這簡直比國民黨還恐共。

如果說長江、黃河可以被中共利用作為統戰之用，那麼台灣人身上流的漢人血統，用的中文語言，過的中國風俗，難道就不可以利用為統戰嗎？為了怕統戰，就不准歌頌長江、黃河，是不是也可用同樣的理由不准台灣人流漢人的血液，不准用中文語言，不准過中國風俗呢？

李先生認為歌頌「長江美」、「黃河壯」是為中共統戰，必須戴紅帽子。請問不准歌頌

「長江美」、「黃河壯」又是為何方之統戰？素仰李先生為主張自由民主的君子人，何以不准人家有歌頌長江、黃河的自由？何以還白紙黑字的公開檢舉歌頌長江、黃河的同胞是為中共統戰呢？

據說李先生是君子人，「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盼李先生以後下筆能多加留意。並望「夏潮」諸君能慨允此信刊出。

敬祝

編安

何德儀 敬上

拜帝國主義之賜？

編輯先生：

「生根」第十期「閣樓手記」中的劉銘傳神話充斥著一片幼稚的胡言亂語。在毫不了解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治台政策的不同性質之外，更恬不知恥的說「後藤新平以新觀念配合新的現代統治技巧，奠定這八十年來我們仍然享受的現代化」，這些話洋溢著對後藤的景仰與感恩，十足一副奴才嘴臉。我們要質問所謂「這八十年來我們仍然享受的現代化」是什麼意思？這八十年是怎麼算的？又是那些人享受了日本奠定的現代化成果？「生根」的編輯不妨去問問自己的父、祖、前輩他們在日據時期享受了什麼樣的「現代化」？最能顯出「生根」編輯的奴隸心態是最後那句話：「落後地區的現代化，那一個沒有拜近代帝國主義之賜？」這樣的話，無異在嘲笑死難的抗日先輩不懂得匍匐拜接受日本帝國主義賞賜的「現代化」，卻跟

日本主子扯後腿、過不去，活該斃命！過去總想不通何以「深耕」與「生根」老對美國、日本獻媚，現在我懂了，原來他們準備再拜受美、日兩國的「現代化」之賜！

編安

敬祝

台南 張振聲

「賣春事件」 困擾留日女同胞

編輯先生：

生活在日本的留學生及已嫁日人的主婦，近年來受到很大的社會困擾，那就是由台來日賣春的台籍女性日益增多。尤其是在東京、長崎一帶，竟多達一萬人以上（六月初，聯合報海外版），這是台灣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所公佈的，但除了這兩地之外，是否又有幾千人在賣春呢？只是這二地較易調查而已。

五月三十日在成田機場被拒入境的事件，已非第一次，由日本的電視播出，報紙登出，日本人一聽到台灣女性就聯想起賣春，使在日本的台灣女性丟臉丟到家，頭也抬不起來。

國民黨政權能否使出像「高雄事件」或「二二八」那種魄力來處理賣春事件。就不談賣春的原委，因為這牽涉到太多因素，不管當初賣春的由來是台灣人的錯或日本男性的錯，至少台籍女性（賣春女性多是台籍人士）該有一點點尊嚴。

有一天與美國、日本朋友在一家規模不小的飯店吃晚飯，由於我們在場是說國語（北平語），鄰座的日本人恰好也會說幾句國語，希望能藉

這機會練習，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但談了幾分鐘後，他問我是從那方面來的（所謂中國人來自中國大陸及台灣島），我竟然脫口而出，很流利的回答「從中國大陸來的」，我覺得很難過，說了這麼大的謊，只因爲我想在這大眾面前保有一點尊嚴，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一方面是人數少，留學生之類，其次她們不賣春，日方沒這種資料。

如果是日本政府冤枉了台灣女性，國民黨理應挺身對日本政府表示抗議。更重要的則是加強調查赴日女性的出國理由。國民黨一向對出入境者的思想百般刁難，對出國賣春的事卻視若無睹，充份暴露了國民黨蔑視人權，不識大體的弱點。要知道賣春的事比十個黃植誠「迷航」大陸更沒面子。因爲，在日本黃植誠的事根本不受注意，倒是賣春事件竟日出現於電視、報章、雜誌中，嚴重困擾視聽。

日本讀者

堪憂的台灣警政

蘇總編輯，您好：

我是「夏潮」的忠實讀者，素來對「夏潮」公正無私的報導社會真實，深感敬佩。社會要進步需要「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人出來說公道話，否則一味粉飾太平，報喜不報憂，其結果著實令人擔憂。

公職人員不管是公務員或議員，其言行作風一定要受人民監督，而負責監督的，當然是以報紙雜誌的記者爲主。因此言論自由與安全一定要受到尊重，否則我們的國家就真正沒有希望了。

最近的輿論界好像挫折特別多，這兩個月來雜誌書刊被禁了六七種，簡直是開歷史的倒車。但這還是「文明」的，至少發行人及撰稿人不会被抓去坐牢已經算是進步了。

但是據報導，有兩件事令人憤憤不平。

一是中國時報記者葉志雲因爲報導嘉義縣議員互相鬪毆的事件，結果被歹徒毆打，並且搶去照片撕毀。這真是暴力介入選舉的後遺症。選民選出這樣的議員，簡直叫人痛心。

二據72.6.3自立晚報的報導。因涉及王迎先離奇死亡案的五名刑警罪行，至今尚未定讞，外界對五名刑警仍在職支領薪俸，議論紛紛，記者前往刑事警察局了解事實，不料事後却遭一名自稱「刑事警察局幹員」的男子打恐嚇電話，聲言「你們再提起王迎先的事，我們將採取行動」。

這是什麼話！警察局碰到人民集體抗議，就擺出猙獰面孔，說抗議民衆是「向公權力挑戰」，大叫要揪出「幕後嗾使的人」。但是當記者據實報導時，竟然效法黑社會的卑劣行徑，什麼「偵訊」、「恐嚇」都來，這是不是「向輿論力挑戰」？我們呼籲政府也應當把「幕後指使或縱容的人」揪出來，那樣才算公平。

由以上兩件事看來，警察和議員已經腐化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輿論力量不能發揮作用正義不得伸張，我們的社會將陷於黑暗的境地。謹以此文向貴刊致最虔誠的敬意與支持。

祝

大家好

嘉義 王布銘上 72.6.15.

豈可「縱火」？

編輯先生尊鑒：

本月十二日我經過高雄市建國三路高雄中學時，發現對面統大機車行樓上冒烟起火，隨即見路人打電話向一一九求救。數分鐘後來了五十名消防員、十四輛消防車及十一輛雲梯車。此時火勢凶猛，早已延及鄰居，但是偌大的消防隊只放兩個水龍頭灌救，其餘的消防車都在旁觀望。由於該區屬木造違章建築，火勢蔓延很快，轉瞬間，鴻達機車行、天天小吃店、雄中攝影社、貴美美容院都遭殃。等到大火快要燒到旁邊大樓時，木造房屋已快燒得精光，噴霧車才開過來，兩三下就把火撲滅了。

以前常聽說消防隊利用火災拆除違建，都半信半疑，覺得不可思議。如今目睹此狀乃使我相信消防隊確有此種惡劣的作風。

這些木屋是否違建，只是聽說，不能確知。無論如何，消防隊的責任是在救火，見火不救，隔岸觀火，實在是太不人道了。

消防隊長名叫曾火炎，真是名副其實的「增」火炎。但我不怪他，因為當時還有三民分局長沈福慶在場指揮，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碰到沈福慶這種人，老百姓的福慶都「沈」到水底了。但是沈福慶也不該怪他，如果上面沒有指示，他一定不敢這樣縱火的。

謹借貴刊一角，敬請披露，讓世人都知道，運用輿論的力量來防止這種殘酷事實的再發生。祝

高雄市 仇祝融上 六·一二

史均先生來函更正

「夏潮論壇」總編輯台鑒：

貴刊本年五月（第一卷，第四期）曾登載在下的「美國文化的特色」一文。

該文是本人將原稿交予友人，由該友人複印後，寄予貴刊的。可能在複印以後將其中兩頁的秩序弄錯了，因此貴刊在登載時也出現同樣的情形。

第一節「魯賓遜漂流記」的最後四段，亦即是從「在這個主題中……」開始，一直到「今日的美國確實是『荒原』」。止，應該是第二節的最後四段，亦即是緊接在「……，朝日落日，絕塵而去」之後。換而言之，筆者分析的「這個主題」，並不是第一節中的「一人小島」而是第二節中的「荒原」。

該文據聞在海外頗受歡迎，爲了不致以訛傳訛起見，望貴刊能予以更正。敬祝

編安

史均 一九八三、六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愛大家

大家愛夏潮

“夏潮”又出刊了，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夏潮需要您——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捐贈五千元（海外朋友美金二百元），您就成爲夏潮的榮譽會員，您就可以成爲夏潮的永久性訂戶，更是夏潮的永恒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李政道的媽媽也是政治犯

■ 成中雄

李家母子以

「掩護匪諜」罪名被捕

六月中旬，我去聖地牙哥會見了五〇年代被捕的「老政治犯」董軒樞先生。三月間在「論壇報」上他發表了悼念李政道母喪的文章，提及他本人的遭遇，並透露李老太太曾被保安司令部逮捕的消息，引起了僑界的關心。於是我去聖地牙哥的老人公寓，拜訪了七五高齡的童老先生和童老太太。兩老精神矍鑠率直忠厚。見面後，他們追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坎坷的遭遇。

李老太太本名叫張明璋。「我管叫她明璋」，童老太太說。「明璋常提起她的子女，宏道是老大、崇道是老二、政道是老三（由大陸逃到台灣的李根道，不是老太太的兒子），還有一個女兒是造船專家，留在大陸。」

張明璋母子全家的被捕，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一九四九年間，李母隨次子崇道住在淡水。崇道畢業於廣西大學畜牧系，專治牛瘟，來台後便在淡水血清試驗所工作。有個廣西大學同學借住李家，不久這人被特務機關以「匪諜」罪名捉去，李崇道夫婦和他媽媽一家遂以「掩護匪諜」罪名被捕。

李崇道是個書生，與現實政治並無牽涉，在偵訊期間，受到相當不友善待遇，迫他招認。傳說中，李老太太不堪折磨，在獄中曾一度打碎粉鏡，企圖吞吃玻璃碎片自盡，其怨憤的心情，可想而知。其後，幸經友人袁惕素等多方援救，李氏一家才以「自新份子」名義保釋

在外。

李崇道獲釋之後，依然被列入看管之列。李家的境遇，一直要到李政道得諾貝爾獎之後，才獲改善。

由「自新份子」到

「模範母親」

台北當局獲悉李政道得獎之後，即刻會教育部長張其昀函邀請前來「『自由』中國」觀光。李政道回信，要求給予家人恢復自由，「觀光」一事，則隻字未提。

於是，國府當局緊急召集了七個情治單位來會同「平反」工作。那七個情治單位是：安全局、情報局、調查局、警備總部、中央黨部、六組、知青總部及刑警總部。童老先生稱此舉為「七堂會審」，來替李崇道「摘下『自新份子』的大紅帽」。

由於李政道的得獎，在台的李氏家人才得以轉危為安，學有專長的李崇道乃步步高升，榮任農復會主任委員，而至擢升中興大學校長。而李老太太也由「自新份子」被選為「模範母親」。

李老太太出獄後，搬到鄉下大浦住，每次進城，便過童家，由於大家境遇相似，因而和童老太太成了知己。故她在獄中遭遇種種，都向童太太吐露。那段坎坷的際遇導致她罹患胃部鼓脹症，對她的健康有很大的損害。

今年二月間，李老太太高齡病逝，國府政府要均參與弔禮，「冠蓋雲集，備極哀榮」，李政道在辦理母喪之後，携帶着母親的骨灰離台前往蘇州與父同葬。

李母的橫遭下獄及刑辱，在這位名震全球的學人心靈上，未嘗不刻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李老太太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馬克吐溫 and 馬克思

不是一家嗎？」

童先生說：「我也是『自新份子』，因為坐牢，結識了不少難友，李老太太是我們的患難之交。我的故事是說來話長。」

童軒孫原籍福建福州，生長在北京，民國大學畢業。一九三〇年左右，在天津和董顯光合辦「庸報」。抗戰期間，在上海擔任「神州日報」總編輯。光復後，在上海、台北經商。他笑着說：「去台灣時我不是文化人。」在他事業的頂盛時期，曾在上海昂貴的「國際飯店」租了一間房招待客人。一九四六年到台北，籌辦化學工廠，做批發生意。他在台北市衡陽街復勝大樓（後改中央商場）設公司，將台灣茶葉運往華北，在天津設辦事處，又將華北豆餅、草葯運來台北。

由於生意做得大，認識面廣，四九年間許多從大陸逃到台灣的朋友找到他辦公室來。瀾朋友到他家躑躅，窮朋友來找他避難，客人一多，就引起了特務的注意，給他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點多，情治人員猛敲大門，闖入童宅。他們藉戶口檢查為名，到處搜查，但一無所得。僅搜去一本翻譯小說「湯姆歷險記」作為罪証，便將童軒孫押走。

在逮捕童軒孫之後，情治人員又將他公司的經理、會計及其他職員全抓到刑警總隊。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條，將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財產，就這樣毀於一旦。

最可怕的黑地方

童軒孫最初被送到刑警總隊，三天內被押往西寧南路保安處。保安處座落在日據時代的東本願寺，警備司令部最早時在那裡設立調查處，偵訊政治犯。提起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伯伯餘悸猶存地說：「那裡無須法律程序隨時可以槍斃人。」

童軒孫在保安處關了三個月，刑求盤問，查不出任何罪証。童太太問說：「沒有罪不是可以釋放？」他們回說：「進來容易出去難，還要留一段時間作『參考資料』。」

由於查無罪証，情治單位便以「思想左傾，意志不堅」為名，發交內湖新生營感訓七個月。這樣，童軒孫又開始了他的另一段「歷險記」。

所謂「思想左傾」，唯一能夠找出的「罪証」便是一本小兒讀物「湯姆歷險記」。童軒孫大為不解，問說：「這本書和我有什麼關係？」偵訊人員說：「這上面明明印着馬克吐溫的字樣，那不是馬克思一家嗎？你看這種書就是思想有問題。」

童軒孫被關十三個月放出之後，才知道自己被人誣告。誣告他的人，是在大陸軍警界顯赫一時的上海警備總司令宣鐵吾。原來有位孫二小姐借住童家，宣將軍追求孫二小姐未遂，以為童先生作梗，於是移恨童軒孫，誣告他一狀。

從獄中釋放出來的人，陰影依然罩着。童老太太說：「明璋常來我家躑躅。我家巷口有個賣饅頭的，樣子古裏古怪，我們懷疑他是特務，軒孫還說我多心。有一天到西門町看電影，在戲院門口看見那個賣饅頭的穿着警察制服，才肯定他是監視我們的特務。」

（寄自美國加州）



王二麻子何必選

我家巷口有個賣豆漿的老頭兒叫做王二麻子，只因為這條巷子只此一家別無他店，每天早上上班前不得不在此進早餐。我習慣叫甜豆漿加蛋。有一次王二麻子問我：

「蛋有大有小，要不要選個大的？」

「有就好，何必選？」

結果王二麻子給我選了一個歪七扭八的小雞蛋。

不久，忽然有一天，王二麻子豆漿店關門大吉。我問鄰居說：

「王二麻子那裏去了？」

「聽說到台北當國大代表去了。」

「豈有此理，國大代表不是要選嗎？」

「哎，有就好，何必選。」

趙×呆的故事

話說福建閩南有個賣牛乳的，名叫趙×呆。當時賣牛奶，不像現在一瓶一瓶放在冷藏櫃中出售，而是牽著乳牛，沿街叫賣，有顧客喊買，就當場擠下出售。

閩南的治安十分混亂，土共時常下山騷擾，凡是國民黨的人，不管是公務員、民意代表或者替國民黨搖旗吶喊的，只要被抓到了，輕者打屁股，重者身首異處。

所以民國三十六年，選舉中央民意代表時，趙×呆的選區竟然沒有人敢去登記。人家說「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當選國大代表，既沒薪水，又要殺頭，當然更沒有人肯做了。

這時趙×呆正好牽牛經過國民黨黨部。裏面傳出聲音：

「賣牛奶的，你進來。」

趙×呆以為是有人要買牛奶，便說：

「要買多少？」

「不是要買牛奶，你來登記競選國大代表吧。」

。

「什麼叫國大代表？」

「你登記就是了。」

那一選區終於沒有人登記競選，趙×呆是唯一的候選人，結果真的當選了。

雖然是國大代表，牛奶還是得照賣。

過了兩年，共軍殺過長江，閩南局勢大亂。趙×呆心想，這下完了，這個腦袋保不住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的那頭牛也不會游水，只好忍痛拋棄，隻身逃到台灣。

趙×呆到台灣之後，生活十分困苦，窮途潦倒之餘，想起那位「害」他當選國代的黨委，憤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於是天天找尋那「冤家

」，必欲殺之而後快。

沒想過了幾年，忽然福從天降，國民黨為了安頓這些孤臣孽子，發明了兩個機構，一是「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一是「憲政研討會」，每一位國大代表都是當然會員，月薪各三萬元，合計六萬元，以酬庸他們選舉總統的辛勞。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趙×呆失牛，豈不樂哉？想想要不是當年賣牛奶，也不會有今天的富貴呀！沒有黨委的提拔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呀！

於是他不再怨恨那位黨委了。領到第一次薪水時，趙×呆高高興興的抱著一大堆貴重的禮物去向黨委「謝恩」。

江律師，請保護我

有一次江鵬堅為謝長廷助選，演講完了之後，忽然有一位聽眾緊張兮兮地跑過來，說：

「江律師，請保護我！」

「為什麼要保護你？」江律師問。

「因為剛才我聽了你的演講，高興的鼓掌，但是每次我鼓掌，我旁邊那個人便看我。」

「我不能保護你。」

「為什麼？」

「聽講的要是被抓，演講的早就被抓了。」

「前進」和 「龍旗」 對上了

—劉元方事件併發症

■ 李明熊

三十多年來，國民黨爲了壟斷台灣政治，除了緊握槍桿子以外，便是嚴密控制新聞傳播事業，以達到箝制思想的目的。在台灣的人民便眼看著衆多報紙從啟迪民智的工具淪爲執政黨的傳聲筒。一切新聞的取捨，或言論的發抒，皆以執政當局的立場或利益爲出發點，這已經成了海內外皆知的「台灣報紙的特色」。

但是戰後生長的一代，對於這種控制新聞、箝制言論的局面，已經愈來愈難以忍受，近幾年來，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地出現，基本上便是對於壟斷勢力的一種反動；而「前進」週刊的出刊，更是打破新聞控制和爭取言論自由運動的新里程碑。

「前進」出刊至今已十五期，正當「前進」週刊的銷售份數直線上升，許多民主人士爲「前進」同仁的努力有了一定成果而正感欣慰時，却不幸發生了「劉元方事件」。「前進」週刊會二度報導前民族晚報採訪主任劉元方潛赴大陸的消息，如今劉元方已回到台北，而且正式控告「前進」誣謗。劉元方一回到台北便夥同龍旗雜誌的同仁（按劉某也是龍旗的社務委員）舉辦了一場以「聲勢」取勝的記者會，之後劉某除了向法院控告「前進」的發行人林正杰和總編輯耿榮水外，還揚言民事賠償一千萬台幣。劉某在記者會上曾說過今後他將以打贏這場官司爲他的職業，劉某立場之堅決，由此可知。許多關心人士均擔心劉某的控告如成立，對「前進」雜誌可能造成嚴重的打擊。爲了解事態可能的發展，我們特別訪問了前進發行人林正杰和總編輯耿榮水。



耿榮水。

一場奇特的記者會

由於劉元方已回到台北，如果他認爲「前進」報導失實，來函要求「前進」更正，則「前進」一定來函照登，以示負責，林正杰和耿榮水在談到這個事件時，都很坦蕩地做此表示。但是從劉元方六月廿三日的記者會看來，劉某和龍旗集團卻明顯地蓄意將此新聞傳播界經常會發生的現象，擴大成政治案件。

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記者會，劉元方表示：「已有充份跡象顯示，這一個事件不是我個人單純的事件和偶發事件。而是這些分歧份子背後和台獨份子進行一個更有計劃的毒辣、陰險的陰謀。」劉某分析到目前爲止，這個陰謀的發展可分成五個步驟：①四月二十三日的前進登出「萬歲不離口、背後偷溜走」一文指劉某可能潛赴大陸。②五月十一日，紐約「中報」轉載上文；③六月號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又轉載上文重要內容；④六月十八日的「前進」週刊又登出「劉元方已回歸大陸」一文；⑤紐約中報又刊載一文，大肆渲染說劉元方已秘密潛返中國大陸。劉某將上述各報章雜誌的

報導串起來，認定「前進」是「甘受共產黨統戰的陰謀、裏應外合的不法份子。」在這個記者會上，除了李永然律師態度較理性以外，盡是一片喊殺喊打，而這些人大都是龍旗雜誌的人。有趣的是一位自稱姓林的男子，表示因為和林正杰同宗，以宗親的身份向劉元方道歉。但論荒謬，莫過於一位與會女性的發言，她說：「據聯合報的報導，「前進」的消息是根據「申報」，各位「申報」就是中共大陸共匪的報紙……」這位女士除了要與會記者大加報導她這個重大發現外，還因為她的認定「申報」是匪報，而大談黨外人士和共匪的掛勾……據筆者的了解，這個記者會的第二日，全省各大小報紙都沒有報導這位女士的重大發現。因為，即使年輕的記者在國民黨「教育」下不熟悉中國近代史，報館的編輯老師，從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成長過來的，當不致於無知到不知道「申報」是什麼樣的報紙，還有最重要的是，目前並沒有一份叫申報的報紙在發行呢！

說到「申報」它是中國報業史上最早商業發行的報紙之一，它創辦於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創辦人是一批英國商人。一九一二年由席裕福手中賣給史量才，後來史量才在國民黨內部門爭中被極右份子所刺；三十五年申報改組加入官股，而由桂月笙——前總統蔣公在上海最大的支持者，上海黑社會的頭子——擔任董事長；三十八年上海淪陷後，中共沒收申報，將其改為「解放日報」。龍旗抓着這份早已作古的報紙，硬說它是現在大陸匪報，又據此來誣陷「前進」，識者聞之，莫不傳為笑談。據了解，聯合報登出「申報」，完全是「申報」的手民之誤，却沒想到讓龍旗出這麼大的醜。



林正杰。

名編輯的困擾

對於疾風、龍旗、掃蕩一類雜誌的構陷，譚

萬、大多數黨外人士早已習以為常了，了不起去個電話糾正或抗議。但是今天黨外雜誌稍有一點疏忽，對方便跳腳；對於龍旗這種對別人明察秋毫，對自己不見與新的作風，耿榮水表示感到非常遺憾！他說，難道黨外一定要公正報導，而龍旗們則有罵人的特權嗎？誰給他們這種特權呢？

但是鑑於今天的政治環境，黨外也只有陪小心的份了。不過，耿榮水說，「任何新聞出版均有犯錯的可能，這也就是為什麼「前進」標榜「接近事實」，而不說「完全是事實」的緣故。但是無論如何，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總是要力求報導真實可靠的。」在這方面，耿榮水認為黨外雜誌有先天性的困難，首先，雜誌不能派記者，便減少了一些採訪的機會，另一個困難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許多當事者不敢和黨外直接接觸，這也造成查証上的困難

。還有一種另一個極端的現象出現，那便是有人認為黨外雜誌敢說一般人所不敢說的話，所以拼命投訴或提供消息。據耿榮水說，有些人提供的消息，其內幕性和敏感性之高是非常驚人的，一般來說他對這一類消息均持保留態度。他分析這種消息提供者有下述三種可能性：①消息真實，提供者也沒有不良動機；②消息真實，但是可能是黨內鬥爭，而利用黨外雜誌做為黨內鬥爭的工具；③消息根本是假的，等你公佈之後，再控以誣謗等罪名，如此增加黨外雜誌的困擾。

因為劉元方事件，耿榮水對於黨外雜誌角色的看法，似乎有些修正。他說，黨外雜誌應該發揮評論的功能，今天黨外雜誌之所以小道消息盛行，是因為大報封鎖消息的結果，這不應該是正常的現象。

談到劉元方控告的問題，發行人林正杰表示他並不是好訟之徒，但是如果劉元方不接受前進的公開更正，而堅持告到底，不但他個人將反告龍旗，而且有許多黨外朋友也可能告龍旗。林正杰說，自從他當上市議員，龍旗、掃蕩等雜誌幾乎每期均有謾罵他的文字，從共匪、台獨份子，到大盜、小偷，甚而蚯蚓的傳人不一而足，他說他已着手準備整理對方謾罵他的資料。而且光是六月二十三日的記者招待會，劉元方和龍旗雜誌的人，不管是口頭的語言或散發的文字，均對他個人及「前進」構成謾罵，這些都可能列為告訴的基本資料。目前已經有江鵬堅、謝長廷、陳水扁三位答應當義務律師，不久可望再增加一個。這三位律師足智多謀，許多人都預期這將會是一場政治性極高而且精采絕倫的官司。

破壞和諧，責任在誰？

黨外團體與席抗議的一幕
幼鵬



黨籍立委大唱獨脚戲

六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院會審查「選罷法修正草案」黨外集體退席抗議事件可能是立法院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黨內外和諧的破裂。

從三月十四日立法院內政、法制、司法三委員會開始聯席審查選罷法修正草案起至六月八日審查完畢止，審查會對於各項條文雖然爭

議十分激烈，但是黨外委員的發言權仍然受到相當的尊重，甚至黨籍立委開明派也常常能夠提出反對見解，雖然表決部隊十分猛烈，但在少數條文尚不失協調的氣氛。

可是當選罷法進入二讀階段之後，院會突然呈現緊張狀態。出席人數出奇的高，約在一百五十席到一百八十二席之間，而且往往在多數登記發言委員尚未發言之時就有急進委員提出「停止討論、逕行表決」的動議。

當修正草案第三條有關監察委員選舉改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在國民黨強行表決下通過之後，黨外立委已經警覺到，國民黨當局已經採取不再妥協，快速通過的策略了。

六月二十一日討論第八條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行政院擬定，呈請總統核定之」一條時，終於爆發了分裂的局面。

本來在審查會時黨外即對本條提出反對意見，進入院會後，黨外十一位立委又提出了一份共同修正意見，主張第八條應修正為「其組織規程以法律定之」。

黨外修正案是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第六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所以選罷法第八條「由行政院擬定，呈請總統核定之」的規定是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的。

可是黨內立委却提出了反駁意見，認為選委會是依據行政院組織法第十四條規定：「行政院為處理特定事務，得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

不過這種法律依據是十分薄弱的。因為行政院固然有權依組織法第十四條組織「選委會」，但其「組織規程」仍然必須遵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以法律定之」的。所以黨外的立場十分堅定，認為選罷法第八條第一項必須修正。

不過黨外的修正意見雖然在法理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在席次上却屈居絕對的劣勢。

六月二十一日上午，當院會討論第八條時，聲明保留在院會發言權的李公權、張德銘、黃天福、蘇秋鎮、費希平五位委員及非審

查會委員鄭余鎮發言之後，那位曾向趙耀東在馬路上下跪、發動簽名籲請蔣總統連任的黨籍立委蔡讚雄，即以「已充份討論」為由向院會提議「停止討論、逕付表決」，附議人數二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主席倪文亞當即宣佈對蔡讚雄的提議進行表決。

黨外集體退席抗議

於是會場立即進入緊張狀態。許哲男、費希平、康寧祥連番上台，抗議黨籍立委剝奪院會發言權。他們說：

「剛才發言的六位委員之中，有五位是聲明保留在院會發言權的，只有一位不是審查會的成員，豈可說是已充份討論。」

倪文亞說：

「我知道，可是已經有人提議，並且附議人數已達法定標準。根據議事規則，我不能不處理，請大家原諒。」

費希平上台說：

「既未充份討論，停止討論的動議是不合理的，主席要處理這個動議是不公平的。」

可是倪文亞仍然下令對蔡讚雄的動議進行表決。

費希平上台高喊：

「這是強制表決，無黨籍委員決不接受！」

台下黨籍委員也失去理性，紛紛拍桌叫罵。「資深」委員王宜聲、潘維芳並從座位上起立，對費希平大聲咆哮。

於是會場秩序大亂，黨內外委員之間罵聲四起，而場外召喚表決部隊緊急集合的鈴聲大作，交響成一首絕妙的「立法院表決協奏曲」

此時阿公阿婆紛紛入場，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

「吓？是要表決那一條啊？怎麼這麼亂？」

於是倪文亞宣佈：

「在場一百八十二席……話未說完，費希平即高呼：

「退席！」

許哲男也跟進。

康寧祥起身，一面對蘇秋鎮作手勢，高喊：

「退席！讓他們表決去吧！」

蘇秋鎮一直站在會場中央前面，像是冷眼旁觀的樣子。見到這種情況，也高喊：

「黨外全體退席！」

黃煌雄、張德銘、黃天福、鄭余鎮紛紛退席。

席。

黨外立委一面向場外退去，一面叫罵：

「退席！退席！」

「你們去好好表決吧！」

許哲男大聲說：

「剝奪別人發言權，太不公平了。」

黨籍立委也不甘示弱，拍桌大罵：

「出去就出去！」

「滾！滾出去！省得在會場內搗蛋。」

表決結果，終於通過蔡讚雄等二十三位立委提出的「停止討論」案。青年黨謝學賢突然提出臨時動議案：

「既然不必要充份討論就可以表決，我看逐條表決太麻煩了，不如一次表決，只要在座委員舉個手，整個選罷法就算通過了。請主席就我的建議進行處理。」

主席倪文亞聽了很不自在，連忙起立說：「這樣子不好，這樣子不好。」

此時已十一時四十一分，青年黨委員決定自下午起也集體退席抗議。

蘇秋鎮是流氓？

黨外委員退席之後，場內突然呈現一片和諧氣氛。

黃煌雄等十一人提出的黨外「共同修正意見」在無人贊成下，被否決掉。

青年黨李公權等十一人提出的修正案也在相同情形下被否決掉。

全場無異議通過行政院院修正草案。黨籍委員高興的鼓掌叫好。

第八條通過之後，蘇秋鎮和鄭余鎮重新入場。鄭余鎮不是審查會的人，他必須表達意見，蘇秋鎮的目的，在對於以後各條，逐條杯葛。

院會繼續討論第十二條。

主席說：

「蘇委員秋鎮對本條保留在院會發言權，請蘇委員發言。」

蘇委員上台，見台下有人講話，借題發揮，大喝道：

「不要講話！」

全場一懾。突然，黨籍立委發覺原來是對自己吼叫，紛紛鼓掌。

「呱呱呱呱講什麼！」

主席倪文亞忙打圓場，說：

「蘇委員不要發脾氣。」

然後台下又是一陣鼓掌。

「講吧，讓你們講個痛快。」

蘇秋鎮一直不發言，台下繼續鼓噪。
張鴻學、林棟高喊：

「不講話就下來！」

蘇秋鎮說：

「台上講話、台下也講話，叫人家怎麼發

言。呱呱叫，呱呱叫，叫什麼，講了三十年還

沒講夠啊？」

這時李宗仁挽起袖子，衝上去：

「我才講兩年半而已，你這流氓作風。」

「你要幹什麼？誰是流氓？」

蘇秋鎮毫無懼色。倒是李宗仁一付摩拳擦掌的姿態，大有不惜一戰的氣概。許勝發、牛踐初、洪玉欽見狀，紛紛上台制止，把李宗仁拉回座位。

「人家發言是流氓，打人就不是流氓？」

張鴻學、林棟又繼續鬼叫：

「下來、下來！你亂叫。」

蘇秋鎮又沈默了半晌。然後一個字、一個字慢吞吞地說：

「剛才做了一個合法的表決……却是一個不合理的表決……表決怎麼樣也表決不過各位，但是發言總該讓人發言……這是破壞和諧、破壞溝通的作法……」

主席請聲明保留發言權的黃天福、張德銘發言，但他們早就退席了。

「沒有人要發言的話，照行政院案通過有無異議。」

蘇秋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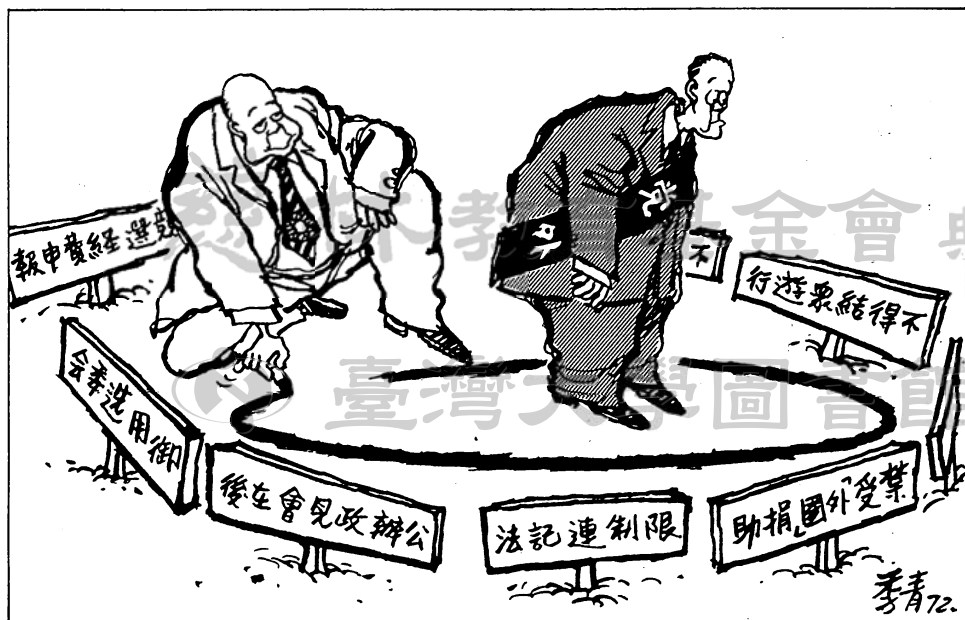
「異議！」

於是表決，以一百六十七席之多數通過。下午繼續進行審議。由於黨外及青年黨，除蘇秋鎮、鄭余鎮之外全部不在場，會議乃加

速審查。但由於鄭余鎮和蘇秋鎮逐條杯葛，整個下午從第十五條到第四十九條共動用了十五次內容表決，三次程序表決。國民黨雖以壓倒性多數，按照行政院原案通過，却沒有一條「無異議通過」。

表決那麼多，手酸了吧？

鄭余鎮和蘇秋鎮唱雙簧。鄭余鎮上台發言



反對，蘇秋鎮逐條表示異議，讓院會不得不頻頻提出「停止討論」動議，頻頻舉手表決。蘇秋鎮幾次上台說：

「我表示異議，你們表決去吧。」

「多講無益，你們好好表決吧。」

「國民黨包辦的法，由國民黨去表決吧。」

有一次鄭余鎮發言時譏諷說：

「表決了那麼多條文，我想有些人手都舉酸了吧。」

事實上不只酸而已。由於大部份資深委員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連續在場表決，不得休息，已經累得體力不支。

其中有一位大概是心臟病患者，胸前的強心機頻頻發出「吱——吱——吱——」的聲音，老人猛打啣筒，真怕偶一不慎，突然倒地不起，立法院又多一個冤死鬼了。

這時立委黨部書記長周慕文看在眼里頗為難過，派吳梓向蘇秋鎮溝通說：

「蘇委員，不要再堅持了，你看需要修正什麼條文，提出來好了。」

「現在不再提了，你們看要通過幾條就表決吧。」

倪文亞也在台上說：

「蘇委員不要堅持，堅持到最後還是要通過的。」

據說國民黨所以改採強行表決通過，完全是中常委的意見，中常委有鑑於黨外委員採取拖延策略，怕耽擱年底選舉，不得不出此下策。周慕文雖被稱為表決部隊總司令，但他還有分寸，不願破壞和諧氣氛。中常委的決策受到周慕文強烈反對，周慕文曾以辭去立委黨部書記長威脅，還是無法使得中常委回心轉意。周

幕文不得已，只好發動表決部隊強行表決，結果弄成立法院黨內外徹底分裂的局面。

下午五時，黨外十一位委員：費希平、黃煌雄、蘇秋鎮、張榮顯、黃余綉鸞、許榮淑、鄭余鎮、黃天福、張德銘、許哲男、康寧祥，共同提出一個「退席聲明」。茲將全文抄錄如下，與讀者共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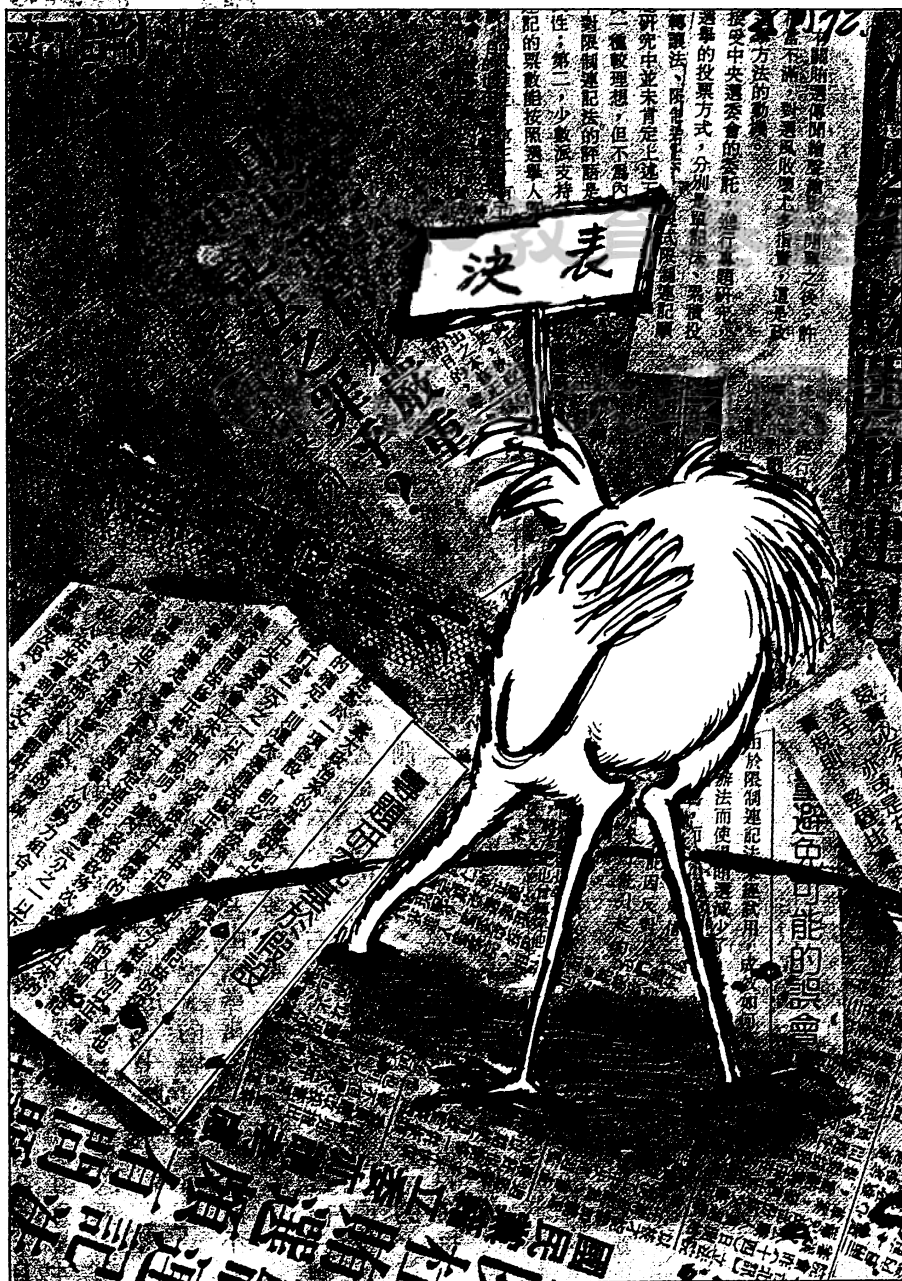
黨外的「退席聲明」

選舉罷免法第三條之修正，主要目的在封殺無黨籍人士當選監察委員。因此，學術界、輿論界，對本條文紛紛表示反對意見，可是國民黨不顧各界反對，一意孤行，強行表決通過。今天討論到第八條，第八條規定中央選委員之組織（規程）以行政命令定之，這很顯然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應以法律定之」的規定，此一違法條文理應加以充份討論，再行表決。可是國民黨就登記發言委員一人發言後，即迫不及待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並強行表決通過，如此重要條文，這樣匆匆處理，真乃如同兒戲。我們無黨籍委員對於國民黨的強行表決，並進一步封殺無黨籍的發言權，實在忍無可忍，只有全體退席，以示抗議。我們要嚴正表示：從我們集體退席以後，有關選罷法修正案的討論結果，對今後國內的選舉與政治，及我們國家民主形象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都應由國民黨負起全部責任。

黨籍委員黃澤青、牛踐初、楊寶琳三人，亦即本案召集委員，接到黨外的「退席聲明」，也不甘示弱，於下午六時退席後，發表「遺憾聲明」。

聲明中指出，選罷法修正草案自三月十四日起至六月八日止，共舉行了十八次審查會，其中九次係全天開會，在審查過程中，發言委員計有六百餘人次，其中第三條發言共十九次，第八條發言委員共三十九人次，提報院會後，廣泛討論時發言共二十人次，其中多半係針對第三條、第八條發言，逐條討論時第三條發言十七人次，第八條發言七人次，足見上列二條無論在審查會或院會都已經過反覆辯論，充份討論，最後由於委員各持己見，只有訴諸公意，進行表決，此兩項表決，完全合乎民主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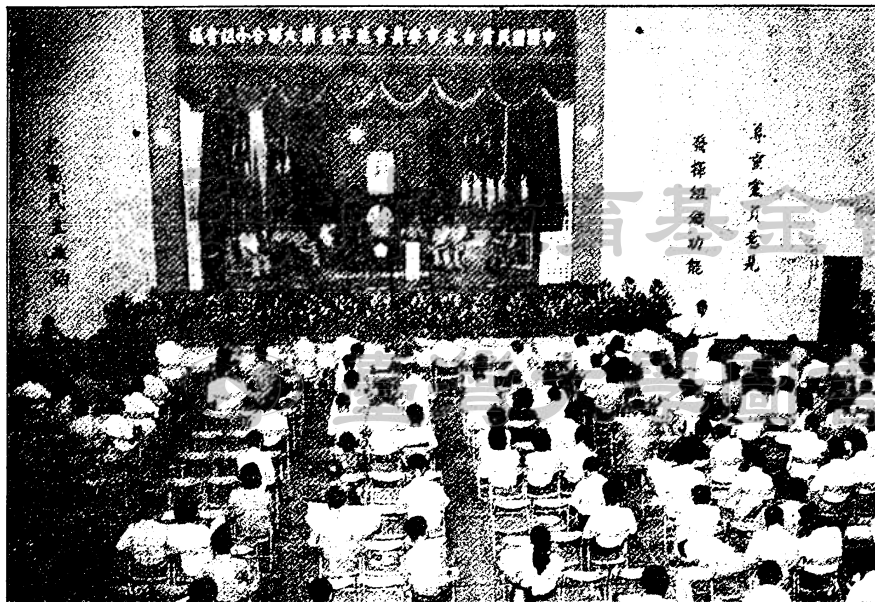
治的基本原則。其次便說，第八條是合乎行政院組織法的。其說已見前文，不及備載。最後三位召集委員在聲明中，表示對立法院「少數委員同仁」在院會中聲明退席一事，「深表遺憾」。有趣的是，「停止討論」動議乃是蔡讚雄等二十三人提出，這個聲明居然沒有他們的簽名，所有簽名者都是召集委員，國民黨內部意見如此一致，如此可代理，實在是值得回味的



這算不算選舉活動？

——記一場國民黨「擴大聯合小組會議」

■林妍



擴大聯合小組會議 形同私辦證見會

隨著年底增額立委選舉的逼近，國民黨的選前活動也如火如茶地展開來了。其中台北市黨部為介紹登記黨內提名的黨員，及辦理所謂

六月廿五日在台北延平國小舉行的國民黨台北市委員會「擴大聯合小組會議」。

「黨員意見反映」，於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七月五日止，分區召開十六場擴大聯合小組會議。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第二場的擴大聯合小組會議，在延平區的太平國小大禮堂舉行。從會議的性質、過程、內容看來，這場擴大聯合小組會議，若由無黨籍人士主辦，真不知國民黨又要冠加多少違反選法的罪名了！

約莫六點半左右，太平國小校門口便人潮絡繹不絕，幾位督察忙碌的指揮交通。而從校門兩側排列開來的，則是每位登記提名的「候選人」的工作人員，他們殷勤而有禮的向每一個人敬發傳單，偶爾還加上一句：「請多支持！請支持X X X！」而傳單內容更是琳瑯滿目，有成績單、言論剪輯、告黨內同志書、企業機構的刊物、雜誌……還有許多印着「黨內文件」的人頭玉照，上書「專誠拜訪」、「鞠躬懇託」之類的選舉文句，以及國民黨黨內刊物「群眾」等等，從入口處走到禮堂會場，抱着整整一大盤，足以塞滿一個垃圾桶。

會場外面的走廊，設置兩個「意見箱」，由每位與會的黨員即席投票，推薦理想的黨籍候選人，並做黨員意見反映，作為黨籍候選人提名的重要依據。即席投票採限制連記法，每人可於五十三位登記黨內提名參加人中，圈選四人。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關中聲稱，這種「預選」方式，是貫徹黨內民主及擴大共同參與的重要創舉。儘管許多人質疑，關中這項措施根本就是假投票、假民主，辦理黨員意見反映，也只是上級樣板，裝腔作勢而已。但是，這次擴大聯合小組會議，辦得很賣力、很盛大倒是真的，而其用心如何，諸君必知！

七點十五分，司儀請「黨員同志」入場就



楊麗花的群眾基礎足夠讓洪文棟進入國會嗎？

座，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嘿，看到沒？關主委來了，坐在後面！

「這是我們真正的『私辦』政見發表會，他當然要來的！」

黨歌就是國歌 口號即是政見

七點二十五分，典禮開始，司儀雄壯嘹亮的聲音：「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延平區擴大聯合小組會議，會議開始，主席就位，唱——『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時候唱這首歌是最親切的了）」。

唱完「黨歌」，典禮進行如儀：主席恭讀總理遺訓、向國旗暨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主



以國泰企業集團為靠山，蔡辰洲穩如泰山。

席致詞……，然後便是五十三位登記黨內提名候選人，每人為時二分鐘的「政見發表」（國民黨稱是「登記黨內提名同志的自我介紹」）。

綜觀五十三位人士的政見，不外乎「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服從黨的領導」、「願供黨國驅馳」、「維護黨之政策，打擊偏激份子」等等。根據現場統計，五十三位登記黨內提名人中，在二分鐘的「政見發表」裡提到以「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者，計十六人，「效忠黨國」者二十七人，要「打擊偏激份子，對惡勢力口誅筆伐」者八人！

其他諸如端正選風、轉移風氣、「立民所好之法」、與民衆在一起、根絕貪污……等等，不一而足，慷慨激昂，頗為振奮人心。（或許也可以用「煽動民心」吧？）

不過，儘管這些黨員同志，對國民黨有十



雷渝齊是否被提名，是選舉季節的熱門話題。

分的热情，坐在台下聽四、五十次的喊口號，也是會疲倦的！九點過後，許多「同志」們便三三兩兩的離去，及至會議尾聲，會場內只剩下少數聽眾。相對於演講台上的壯烈激情，坐在後排觀眾席上的關中先生顯得有點不高興。

而這場擴大聯合小組會議，便在關中主委的悻然神色間結束了。

公然違法、自毀立場

從這場看似熱鬧，實則滑稽的聯合小組會議，我們得到二點觀察和實証：

一、雖然關中一再強調貫徹黨內民主，甚至採取「預選」方式，辦理黨員意見反映等民主作業程序，但是由已登記黨內提名候選人的急於表態，可深知台北市黨部所謂的「民主作業」、「黨內民主」，事實上只是一種假象和



在「擴大聯合小組會議」場外分發的傳單。

謊言。在基於國民黨的利益，以及贏得選舉的前題下，國民黨於決定提名人選時，做做專斷獨裁的事，並不足為奇。

二、從台北市黨部辦理的聯合小組會議中，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証：「法律是用來對付反對者，不是用來規範自己的」。國民黨動用表決部隊，強制通過的選舉罷免法修正案，不是明明白白規定：

●第四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依左列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為十五天。……』」

●第四十九條「……自辦政見發表會……除候選人及其助選員外，他人不得在場演講……」

●第五十五條「候選人或其助選員競選活動，不得有左列情事：『在政見發表會外，另行公開演講。』於規定期間或每日起、止時間之外從事競選活動。」

——那麼，台北市黨部的這項擴大聯合小組會議，算不算選舉規定期間外的選舉活動呢？而主持小組會議的市黨部委員，算不算「候選人及其助選員之外」的人呢？如果是，他為什麼上台演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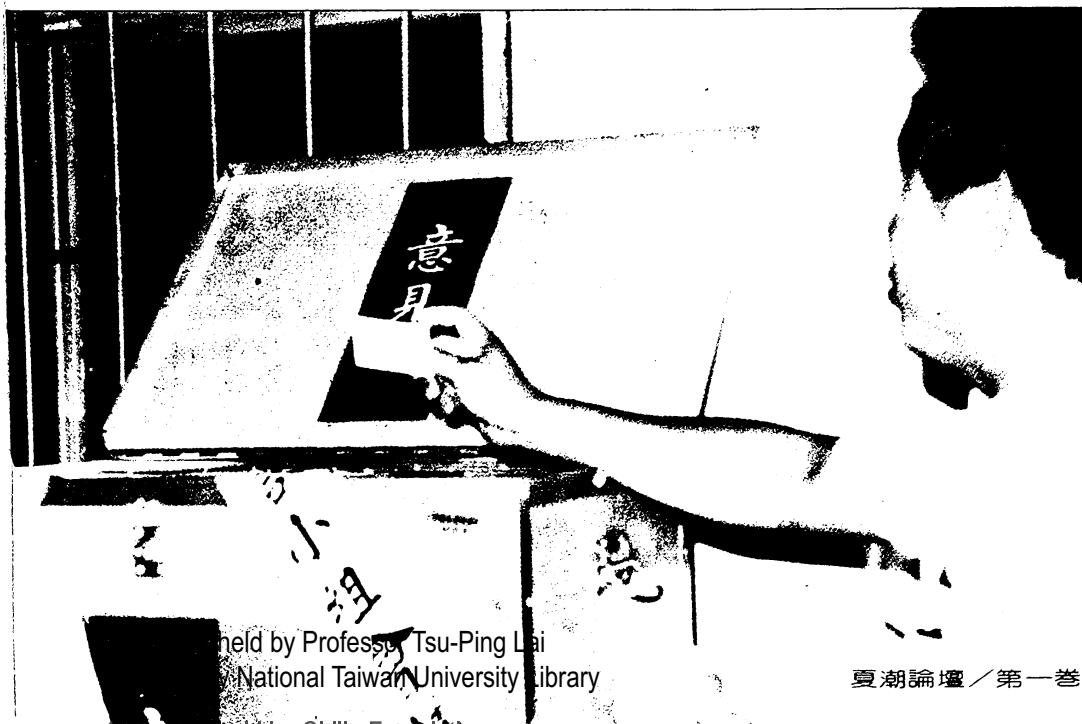
甚至聯合小組會議，是不是超出了選罷法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規定的競選活動項目？

自然，國民黨不會承認其黨內聯合小組會議，是一種競選活動，然而，它與選舉活動何異？那些傳單是怎麼回事？介紹登記提名同志，二分鐘演講又是怎麼回事？這不是選舉活動又是什麼呢？而誰又相信，中央選委會依選罷法第九十七條之一規定，處罰中一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設若換個角色，今天是無黨籍人士在台北市召開十六場「無黨籍人士聯合會議」，他們也在會場外散發傳單、名片，也來個二分鐘的演講，那麼，中央選委會該有什麼反應？

我們希望國民黨不要忘記，選罷法修正時，該黨籍立委是一致擁護通過的。今天反對該修正案的無黨籍人士未犯其法，倒是處心積慮要通過該法案的執政黨目無法紀，公然違法！這不僅霸道蠻橫，而且無耻至極。

基層黨員的意見受到尊重，才有所謂「黨內民主」。



華同汽車公司
HUA TUNG
AUTOMOTIVE CORP

「華同」

破產

內幕

■林坤

投資錯誤 是誰的責任？

轟動一時的華同汽車公司終於在六月七日宣告破產。據「華同」宣佈，該公司六月底前將已進口的一千零八輛重車零件，配合本地產製約百分之卅五零件全部裝配完成，然後停止生產。預定七月十五日資遣約半數，近二百名員工。其餘二百餘名員工，如不能及早成立新公司，勢將陸續遭受資遣的噩運。

華同現有四百多名員工，百分之九十係由原聯勤軍事廠、二〇一廠、台機重車廠，輾轉調到華同汽車公司，隨廠四次轉移長達十七年之久。這些技術人員被遣散時能夠拿到多少資遣費呢？遣散之後將何去何從呢？這些都是員工們焦慮的現實問題。

但是公司所焦慮的是另外一些問題。華同現有車輛近一千輛，截至宣佈破產時止，實際售出的不到二百輛，其餘的雖已由國防、經濟、交通部同情式的認購，但已提貨者僅零星的幾輛，其餘存貨如山，堆積在中壢工業區廠房及台北松山舊廠的通道中，這些車輛怎樣處理？還有積欠交通銀行和外商的十四億元台幣怎樣歸還？經濟部暗示新公司不能接收台北重車工廠，怎麼辦？

自從通用撤資之後，經濟部指示中鋼邀請日商投資，結果不但日商採取拖延戰術，無法談攏，就連中鋼本身對於華同都避之猶恐不及。雖然華同預計九月售清存貨，但是很顯然九月底以前，新公司是絕對不可成立以接收華同資產的。

現在人民所關心的是，華同是國營事業，國營事業的資產就是人民的財產。這些資產到底有多少？如何把損失減至最低？還有最重要的，華同的投資錯誤到底是誰的責任？

外傳華同資產有三十億之多，但據董事長兼總經理雷穎表示，至五月底，總資產約二十三億元，依資產負債表顯示，負債十四億元，虧損七億餘元，其後將因存貨損失、利息負擔，二十三億元將虧損殆盡。依現在情勢看，華同無論如何努力，這二十三億元的資產是絕對無法挽回的。

這個問題在六月十三日，立法院審查七十三年度中央總預算附屬單位關於中船及台機部份時，雷穎總經理答詢，透露一些「苦衷」，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抱「通用」小腿， 還是被出賣了！

原來民國六十五年底、六十六年初，國防部和經濟部奉「高階層」指示，成立柴油引擎和重型車輛發展小組，準備成立重汽車廠。正在選擇對象的當兒，忽逢中美斷交在即。「高階層」研議結果，認為防止美國「變節」之策，便是加強中美實質關係。於是國防部代表投資，邀請美國通用公司合作。

如所週知，美國汽車十分昂貴。據經濟部的估計，生產之車輛將較日本車費二十四至三十%



福特六和汽車公司總經理陳其蕃



三陽工業公司總經理張國安



裕隆汽車公司董事長吳舜文



中鋼公司董事長劉曾道

陳其蕃、張國安、吳舜文三位國內汽車工業鉅子，對於當前大汽車廠的經營方式，及汽車工業發展策略均持保留態度。中鋼董事長劉曾道樂觀地認為「大汽車廠可以帶動國內工業昇級」，是目前經濟部當權派的想法。只是，「華同」破產，股鑑不遠，能不慎乎？

。美國汽車在日本車的攻勢下，早已招架乏術，苦不堪言，連汽車大王的福特公司都大量採購日本零件，變成日本車的裝配廠。通用汽車也被迫和日本合資經營。為什麼台灣竟反而找到通用汽車要合資經營呢？為什麼不找日本汽車廠呢？

這就是「政策」，人在溺水之時，即使一根草都想抓住，通用公司便是那一根草。「高階層」以為抓住了通用，便可使美國政府憐憫這「忠實的盟友」，不忍出賣。沒想到「窮」雖「變」，却變不「通」。美國還是把台灣出賣了。

華同原來是由國防部代表投資的，但因通用不願與軍方合作，所以改由台灣機械公司代表投資。又因通用考慮華同車輛絕對不可能和外國車競爭，除非在台灣搞獨佔。所以要求管制重型車輛進口。

於是協議達成，通用出資四十五%，台機出資五十五%，七十年六月華同成立。

當時經建會及美日「顧問」預估，國內市場有八千輛至一萬輛之需求，但是實際上每年只有三千輛之銷售量。設備過剩，造成車價更高，消費者平空受到剝削。

另外，由於管制汽車進口，得罪了歐洲，當時對歐貿易順差，歐洲共同市場威脅如不開放進口即對台灣產品採取保護政策，經濟部權衡利害，終於開放歐洲重型車進口。

這一來，真正把通用汽車得罪了，華同車那是歐洲車的競爭對手？通用公司一怒之下，七十年八月以經濟部違背諾言為由，憤然撤資，台機公司也無可奈何。

經濟部雖然指示中鋼邀請日本四家公司投資，但一直拖延至今，華同苦撐硬挺，撐不下去了，不得不宣告破產。

我們不能不問——華同破產誰之過？「高階

層」頭腦怎麼那麼簡單？美國和中共建交，是長久以來的政策，難道只爲了抓住通用公司這根小腿，就能阻止得了美國政府「一意孤行」而「回心轉意」嗎？

還有當初和通用汽車訂立合同時，難道就沒想到會得罪歐洲嗎？如果想到了，爲什麼又出爾反爾，開放進口，得罪通用公司呢？

百思不解之餘，我們不能不嘆息：「高階層」實在太顛頂了。

爸爸無任期

小華今年五歲，剛上幼稚園大班，有一天他突然有一個疑問：

「爸爸，你是我的第幾任爸爸？」

「爸爸沒有任期。」

「爲什麼縣長有任期，爸爸沒有任期？」

「因爲爸爸是你媽媽選的，不是民選的。」

「那媽媽是第幾任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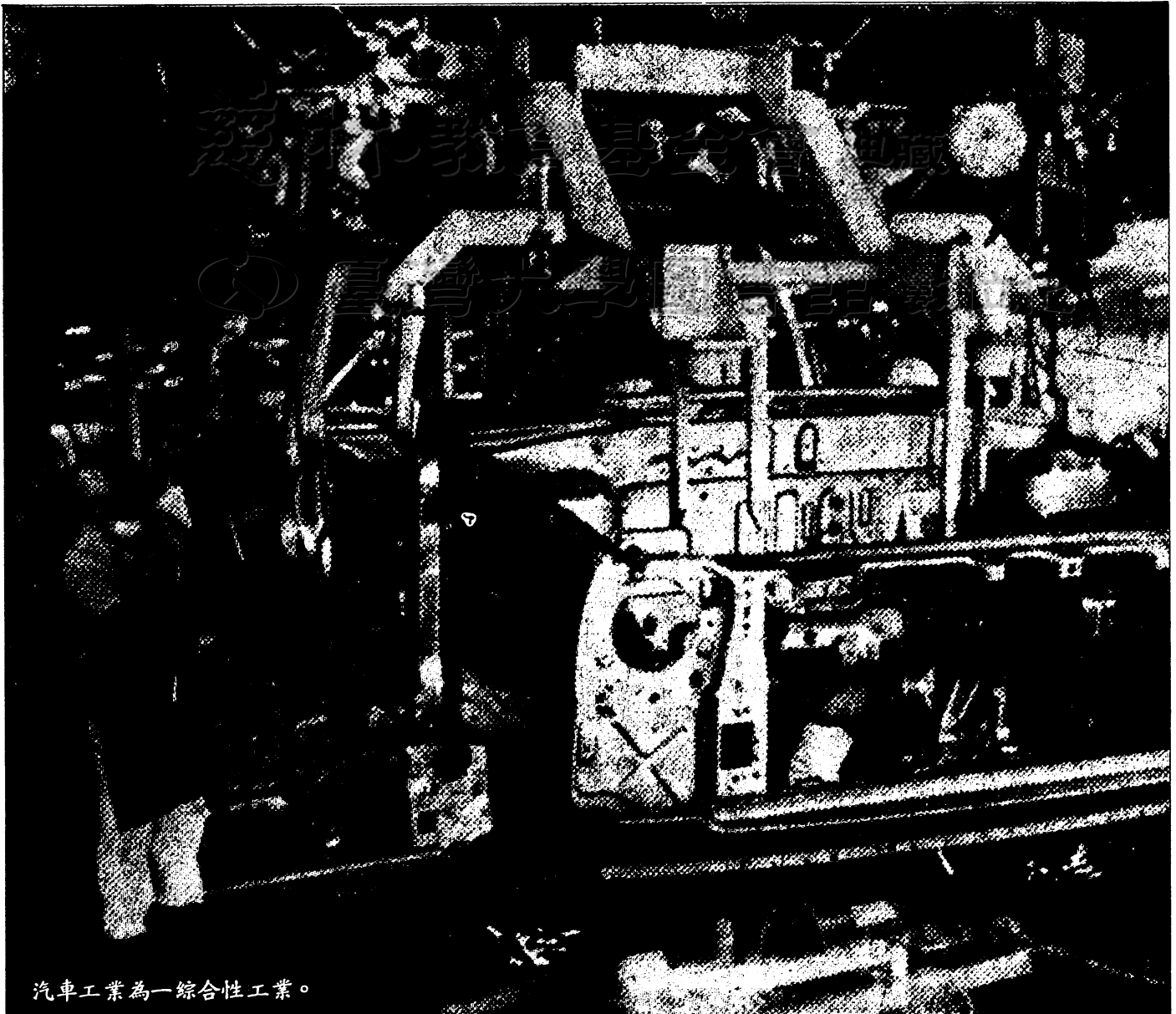
「媽媽也沒有任期。」

「爲什麼媽媽沒有任期？」

「因爲媽媽是爸爸選的，不是民選的。」

「噢！我知道了！」

「爸爸選媽媽，媽媽選爸爸，難怪永遠是我的爸爸媽媽。」



汽車工業為一綜合性工業。

台中市計程車司機

集體抗議事件

洪鯤

衝突緣由，各說一詞

台中市火車站東邊原是干城營區，自從營區拆離之後，改為台灣汽車客運的第二車站，是普通車及直達車的起點，營區外又是往台中與號客車的終點，所以干城車站的周圍有許多攬客的計程車停置或徘徊。尤其是當中與號由台北十一時發的末班車抵達干城車站（一時廿分左右）時，正是計程車拉客最激烈的時間。

六月十一日零時三十分，干城車站外聚集了幾輛計程車，駕駛北洲汽車行五〇一九八六二號計程車的劉基明（二十八歲高雄人）正好經過，劉基明停下來和另一輛車的司機談話。這時兩名交通警察黃清亮和許柏丸正好巡邏而至，發現劉基明停在快車道上，於是上前稽查取締。

劉基明催動油門，交警在後猛追，兩輛車在建國路、光復路、成功路、綠川東街繞圈子，最後在雙十路和光復路口遇上紅燈，劉基明停下來，此後發生的事情警方和司機的證詞完全相反。由於事情的經過關係著整個事件的責

任問題，所以雙方各執一詞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據黃清亮十六日向監委的報告——

黃清亮和許柏丸的警車見劉基明逃逸，便驅車追趕，車速三、四十公里，由於路旁停放了車輛，不便超車，雙方在市區繞了三圈，終於在上述地點遇上紅燈，逮到劉基明。黃員走到劉車旁邊索閱證件，劉基明反駁說：「路上停那麼多車你不抓，為什麼只抓我一個人？」雙方堅持了三分鐘，劉基明把駕照從車窗內擲出，此時黃員正好要打開車門，黃員的手架到劉基明的手臂，劉基明於是高喊「警察打人」。

但是據劉基明的說詞——

劉基明並不知道後面有追車，而且只在市區內繞了一圈半，黃員在追到劉基明時，態度十分惡劣，咒罵說：「幹你娘，看你跑那裏去。」劉某下車與之理論，黃員氣憤地用手肘毆擊他的左胸。有一名女子、蔡姓司機和附近麵攤老闆三個目擊者可以證明。劉基明並且檢具醫院證明，向監委提出陳情。

眾司機抱不平，

羣集分局討公道

此時有廿多名司機目擊此狀，紛紛圍過來，和交警理論，七嘴八舌的說：

「開罰單就開罰單，怎麼可以打人？」

黃、許二員見狀不妙，於是以無線電呼叫求救，支援交警趕到，才將二員救出，追回隊部。

這批計程車司機聚集起來，談到平常受到交通警察亂開罰單、態度惡劣，十分不滿，於是有人提議簽名證明警察打人，到市警局去討回公道，立時二十多人響應。

凌晨一時卅分左右，約三十輛車由干城站附近出發，帶著聯名證明書列隊由民權路、三民路、市府路、中華路繞行，沿路頻按喇叭，呼朋引伴，越聚越多，直到二時許抵達市警局所在的三民路口時，已經集結了近百輛之多，一輛緊接一輛，秩序井然停在市警局門口，東



百餘部計程車集結在中華路口至公園路口之間，警方出動持着瓦斯槍、水槍、盾牌的鎮暴部隊把群車圍圍住。



市警局以為事情終於告一段落了，乃鬆了一口氣。

不料這群計程車離去之後，先是一部部串起來，狂按喇叭，不久，突然失去秩序，各車猛踩油門，互相超車，並且表演緊急剎車，像一群發狂的野獸，在市區內狂馳。

「吱——叭，吱——叭。」

緊急剎車聲與喇叭聲齊奏，喧天價響。市區居民聞聲紛紛被驚醒，出來看熱鬧。技術較差的自用車望風披靡，退避路旁，不敢阻擋。連幾部外勤車與巡邏車也半擠半讓地被排斥在車陣之外，變成了觀眾。

於是原本平靜的夜市，忽然間變成了汽車競技場，百餘部計程車，在馬路上狂奔、狂鳴，什麼紅燈、綠燈，到這時候都一樣了。

串連的車陣在市區內繞行，約至凌晨四時許達到高潮。百餘部計程車，集結到中華路與公園路口，將附近幾條街道擠得水洩不通。

一場理性的「示威」

這時市警二分局勤務組接獲報告，派資深員警劉炳南率保警吳文華、郭清義，駕二〇六號巡邏車趕赴現場，維持秩序。

不料剎車到達中華路時馬上陷入車陣的包圍。

數約十餘名司機圍住警車，激動地拍打車蓋。

「綁——你們警察就可以隨便打人！」

一面指著員警嚴厲批評警察對待民衆態度惡劣。

「你們把我們老百姓看成什麼東西？」

「用無線電呼叫兩個打人的警察出來道歉

至自由路居仁國中，西至中華路口，聲勢之浩大，前所未有。

司機們下車擁入市警局，高喊：

「警察打人！」

「交出打人的警察！當面道歉。」

值日警官一見嚇壞了，一面打電話報告上

級，一面阻止司機們入內。

「派代表進來。」

劉基明等人入內，遞交聯名證明書，並說

明來意。

此時市警局交通隊、保安隊、刑警隊、以

稱：

「他們執勤去了。」

司機們於是悻然離去。他們討論結果，決

定自己去尋找。

。這時劉員十分恐懼，掏出手槍來，但是手臂發抖，一直不敢開槍。計程車司機見他掏槍的動作，立時引起極度的反感。

「有種你就開槍。」
部份激動司機說著，憤怒的高喊：

「燒掉它！」
可是大部份人不願把事件擴大。於是大家合力把警車抬高，重重地丟下，企圖將警車摔壞。

劉員等嚇得面色如土，趕忙呼叫支援。約四時五十分左右，天已魚肚白。大隊鎮暴車，在副局長林必文的率領下，載著刑警隊、保安隊及所有各分局員警，全副武裝，浩浩蕩蕩地持著瓦斯槍、水槍、盾牌前來，把「暴動」的群車，團團圍住。

林副局長則另外率領十二名保安隊員，衝入激情核心，將警車及三名勤務組員警救出。哨音、水槍，配合著麥克風，威脅群眾解散。百餘部計程車及大批圍觀群眾始漸離開。這時時間已是清晨五時三十分，天色拂曉。被驅散的計程車司機十分興奮，他們以為自己顯示了力量，勝利了！他們以勝利者姿態，得意地炫耀著他們偉大的事跡，幾個小時之後，消息便傳遍了南北，但是不久，他們便又發覺，一個恐怖的陰影正在向他們撲來。

局長下令查究，

多人聞風失蹤

事件發生之後，警察局、政府、民意機構、工會及計程車司機各有不同的反應。

台中市警察局長李慶培得到報告之後，十一日上午「大為震怒」，有關交通警察取締規是否有動粗一節，交由督察室調查；對於「部份不法」司機「糾眾鬧事」，責令刑警隊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李慶培於十一日發表談話表示：警方對本案絕對公平、公正處理，決不偏袒。對警車被圍困一事，認已嚴重妨害公務，決不姑息，查明之後依法從嚴究辦。

換言之，督察室調查執勤警員，刑警隊調查鬧事司機，分別進行，絕對公平。

不過，對鬧事司機查明究辦，我們相信中警局必然有這個「魄力」，但對於打人的交警，是否能拿出決心，就事論事，就不免令人狐疑。

事件發生後，有關方面為了替警方遮羞，特意製造民意，發動愛警察運動；圖為台中陽明國中製造的「警察節卡」，登此卡片的某報說「陽明國中學生自製卡片，真情流露！」

觀乎丑聞先案，刑求王迎先致死事件雖已震驚中外，並且影響立法，是個重大案子，但是當事的五名肅竊組警官依然在位領薪。我們怎能期待市警局對本案會秉公處理，決不偏袒呢？

果然，交通隊長李振光在事情尚未明朗化之前，便急急忙忙發表談話為屬下護航，說：「執行職務的兩名警員決不可能動手打人，因為黃清亮、許柏丸兩員平時不抽菸、不喝酒，待人和氣，為同仁所稱道。」

然後便開始揭司機的瘡疤，說最近常常接獲民眾檢舉，許多單身婦女乘末班車返回台中，在終點站被拉客的包圍，強要她們乘坐計程



車，甚至搶走皮包，丟進計程車，叫人非搭計程車不可。

言下之意，兩名警察本來是好人，不會打人的；鬧事計程車司機本來就是壞人，一定會鬧事的。

緊接著，十五日，李振光忽然提出一個「新構想」，好司機的營業執照改用黃色，壞司機的營業執照改發紅色。目前計程車司機執照都釘在前窗下，乘客在未上車前即可辨認司機的好壞，以免不知底細，誤上「賊車」。

這是國民黨的「法家」心態，以為出了事之後訂個「法」就萬事OK了，根本不去追本溯源，找出事件的原因。等辦法實行下來，原來的問題不能解決，又製造出一個新的問題。我們真擔心領到紅色執照的司機屆時生意清淡無以渡日，不知又會鬧出什麼事來。

言歸正傳，十一日刑警局接獲命令，立即進行調查，調查的根據，一是計程車司機聯名保證書，一是刑警登記的抗議計程車車號，一是現場拍攝的照片。其目的是要從中過濾出，那些是盲從的，那些是「幕後唆使者」。盲從者予以告誡，挑唆者從嚴究辦。警方並表示：「將藉此次全面查訪計程車司機，清查出來行不良的司機列管。」以維護地方治安。

先是十一日，主角劉基明在其兄劉基福及目擊發生的順風車行司機蔡錦賢的陪同下，主動到案說明。偵訊工作在市警局大禮堂後面的經濟課秘密進行，重門深鎖，不准任何人進入。從上午九時開始，直到下午三點才結束訊問筆錄。

劉基明堅持警察打人，並且否認挑唆，甚至離開市警局之後，其他司機鬧事，他也沒有參加。



緊接著，十二日起警方根據簽名書及刑警登記的車號傳訊司機，但是所有司機都稱只是好奇、盲從。其中有些請人代簽的，都矢口否認在場。只有一個坦承對交警不滿，他說：他被開罰單太多了，而且常聽同業埋怨警察，所以在聽說有同業被打，也隨同前往抗議。

至於證人蔡錦賢，依據警方資料，他有傷害前科，並且在十四日的查訪中，有部份干城車站前的司機，指出蔡錦賢駕車經過，高喊警察打人，大家快去。這對蔡錦賢十分不利，蔡雖矢口否認，但是恐怕很難洗清教唆罪的嫌疑了。

警方從十四日起另起爐灶，根據拍照所顯示的車號進行查訪，這些司機無法推托，只好坦承。

警方掌握的名單共有七十八人，但是十二日只找到十一、二人，其餘多未找到，甚至有些人已經搬家，以後陸續有人到案，但大多已經聞風走避，逃得無影無蹤了。

這就是群眾運動的特性，群眾中的個人是不會思考的，只有情緒的發洩，但是等到事件平靜下來，個人被疏離，失去了依靠，便開始害怕了。

官樣文章，等因奉此

當台中市警局正在為計程車司機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行政院長孫運璿正在日月潭遊覽，綠波蕩漾，涼風習習，令人好不心曠神怡。

這天晚上，孫院長飽覽風光之餘，倦鳥思歸，回台北途中，在台中火車站貴賓室單獨召見了台中市長林柏榕。院長問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啊？」

林柏榕答得很妙：

「台中市是個大都市，龍蛇雜處，犯罪率僅次於台北、高雄。其實根據統計，大多數涉案的都是外地人，我們台中市人都是善良的。」

言下之意，台中市的犯罪率與我市長何干？但是林市長也不是傻瓜，趁機敲一筆：

「院長，要增加基層建設經費呀！有錢才能辦事，才能造福地方民眾啊！」

第二天早上，省主席也打電話過來，指示林市長：

「是否有人暗中煽動，要徹底查明，知道嗎？」

「是，是，一定的。」

「還有，計程車司機要多加輔導，提高他們的榮譽感，多鼓勵優良司機呀！」

「是，是。」

其實這些都是官樣文章，林市長對於辦案有插嘴的餘地嗎？但是他的官樣文章也寫的很好。聽了李主席的電話指示之後，林柏榕立刻提出一道「書面呼籲」。

說什麼天氣燠熱、情緒容易激動啦、執法人員的作為如有不當，應當循法律途徑解決啦、不要衝動啦……等等。

於是，問題就OK了。

另外，監察院也有一些官樣文章。

十三日，吳大字提議，說：

「台中市警局既持有幕後指使的看法，即使經其調查證實，其可信度和說服力均值得懷疑，應由監察院以超然立場進行調查比較適當。」

王爵榮委員也說：

「是呀！依我乘計程車數百次的了解，計

程車司機對交通警察噴有怨言，本案是不是因為交警執勤態度不當引起公憤要調查清楚。」

吳大字委員又說：

「台灣社會在轉型期中，民眾為維護自己利益的意識增強，這不是糟糕的事，要善加疏導，把參與意識導入民主法治的正途。」

說的太美了。於是監院內政委員會立即通過，並指派謝崑山、王爵榮進行調查。十六日下午二時，兩位現代「御史大夫」終於抵達台中市。

他們先在市內兜了幾圈，換了幾輛計程車，問司機的看法怎樣，司機們異口同聲地表示對交通警察極度不滿。

然後兩位委員在市議會查問劉基明和證人蔡錦賢。劉基明堅持交警有打人，並提出一份陳情書。

接著，下午四時二位委員到市警局查問黃清亮、許柏丸。黃清亮堅決否認打人。警局並且呈遞一份調查報告。

「真是太麻煩了，怎麼都不承認呢？還是讓老夫回去想一想，看看公道在誰吧。」

於是下午六時，兩位現代「御史大夫」離去台中，悻悻然往台北歸去。在台中落腳的時間共四個鐘頭。

如此工會！

台中市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是台中市計程車司機的工會，但是這次事件發生，工會只作了一些官樣文章，實際沒有替計程車司機做什麼事。

十三日上午，一名計程車司機前往工會，要求工會發動同業，前往省議會陳情，指責市



台中市駕駛員職業工會在事件發生後，不但不幫司機們解決問題，反而參加愛警察運動，動用司機們繳給工會的會費，買可樂、毛巾、肥皂等沿街慰問交通警察。

警局在處理交通違規時的不當措施。他的理由有三：

一、火車站前排班的計程車均拒載短程乘客，以致後面的計程車一直無法輪到，站崗的交警均視若無睹。

二、交通隊便衣稽查衣衫不整、態度惡劣，尤其是便服取締，容易引起誤會。

三、交警對違規停車的告發，厚彼薄此，台汽或市內車不依規定停靠，從未見交警加以取締，對計程車則動輒開單。

這個陳情在此時此地提出是十分恰當的，所謂打鐵趁熱，一方面可以減輕集體抗議的責任，一方面敦促警方加速改善。

但是這個動議却被工會否決了。工會表示，以上各情可以反應給警方參考改進，但不需勞師動眾，影響大多數計程車司機的生計。司機工會同時希望全體會員要保持冷靜、理性，勿再有不法的行為出現，影響社會安寧。

於是第二天（十四日），工會做出了一件十分「冷靜」和「理性」的事。工會理、監事開了一個會。會中做了決議：

一、呼籲警方對會員劉基明與警方的爭議，秉公處理。（真是廢話，市警局已經答應了嘛。）

二、警察先生太辛苦了，應該在警察節前夕的當天組團前往慰問。

於是慰問團很快的組成，成員包括常務理事林炳南、趙永華、常務監事賴萬水、理事楊坤棋及秘書吳恩培等人。當天下午四時，帶著一大堆禮物，有可樂、有毛巾、肥皂、琳琅滿目，先前往市警局交通隊慰問，致贈每位交通警察一份禮物，隨後前往火車站、建國市場等地和站崗交警握手致意，並為警察擦汗。對於

警察先生的辛勞表示萬分敬佩與感謝。

台中市司機工會是全世界工會的怪胎。你可知道會長是誰嗎？正是台中市警察局長李慶培。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工會爲了對局長表示「敬意」，特致贈一幀「名譽會長證書」。李慶培以前擔任基隆市警局長，司機工會只贈他一份「榮譽會員證」，憑證可以在基隆市免費搭乘計程車。後來調任中警局長，一下子升爲「名譽會長」。可見中市司機工會拍馬屁的功夫比起基隆市司機工會來，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工會對會員又是怎樣呢？據受訪的司機說，他們每年要繳交三千七百元的會費，但是一年到頭，只享受到勞保的好處，其餘一點服務也沒有。

勞保費每年約兩千餘元。換言之，剩下一千多元的會費，不知去向。台中市計程車共一萬餘輛，每一位司機都是硬性規定的當然會員，每人一千元的話，一萬人就是一千萬。這一千萬以上的會費，到底花到那裏去了，司機們毫無所悉。

雖然到處傳聞說工會幹部大貪的話，但是沒有確實證據，誰也不敢說中市司機工會的理事們也會貪污。不過，從這次警察節前夕，工會買了那麼多禮物向警察先生致敬，我們想，一千多萬總不會完全落進工會大老爺的口袋，工會還是「做了一點事」，只是不是爲司機做的就是了。

計程車司機人心惶惶

台中市計程車司機自六月十一日發生集體示威事件後，由於警方大量的約談，連日來一直人心惶惶。

根據六月二十七日報載，警方專案小組調查該日有關警車被困部份，目前已告一段落。調查報告說：有十人涉嫌在場攔截警車，吶喊煽動，並撞搖警車。至於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及妨害公務」之嫌，專案小組表示，將有關資料整理之後，在近日內將全案函送地檢處偵辦。

從這項調查報告看來，這十名涉嫌的計程車司機，恐怕前途不妙了。

而調查報告對集體示威情況的描述是這樣的：「本月十一日凌晨三時許，二分局勤務組巡邏車二〇六號，在執行勤務經公園路及中華路口時，遭計程車司機攔截，並被大批民衆包圍，當時曾有人說要扣壓警車，也有人敲打車窗，及撞搖警車等行爲，後經警方支援，驅散群衆，才使該車脫困。」對於導致示威的背後原因與導火線，均未作深入、明確的說明。而調查報告，亦與計程車司機說辭有極大出入。

報上又說，專案小組是根據察訪當日在場的民衆和司機，結果「發現有十人涉嫌」；但是，由於這十個人均矢口否認有不良動機，因此警方考慮將全案函送地檢處，由檢察官繼續指揮偵辦。

惟至截稿時間爲止，未有進一步的消息。

（本刊編輯部）

誰說癌是絕症？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遇到癌症，她付梓以白己的例子去鼓勵他們。在日，業以自己的經驗爲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爲緯，陸續寫了數，篇防癌、抗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小病」三大部份，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 李豐醫師 定價 八十元
出版 健康世界雜誌社 郵撥 106474號

侯德健論中國大陸

與台灣

張楚勇

訪《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

編按：

侯德健在今年五月到香港宣傳他的新唱片——龍的傳人續篇時，曾接受百姓半月刊雜誌的訪問，時間上離他去大陸（六月四日）不足一個月，雖然在訪問當中，他沒有明確透露日後的動向，但從他的談話中所顯示的心態、對大陸與台灣的一些看法，讀者不難理解侯德健的選擇，為此本刊特別轉載這篇登於六月十五的「百姓」雜誌的訪問稿。

老祖宗沒做過

幾件好事

口侯德健從你的作品「龍的傳人」和「龍的龍人續篇」看，我覺得你很關心中國人。你在台灣長大，是什麼原因使你這樣關心中國人呢？

■你這個問題很大，我只能夠舉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來解釋我今天給人的這個印象。第一是因為我母親是湖南人，父親是四川人，又是國民黨的軍人，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我這種家庭背景是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我和每一個台灣孩子所受的教育，都大同小異，在小時候灌輸反攻大陸的意識，這個意識，在我們小學畢業前都覺得

是應該的。加上小時候我的生活環境中，有很多老兵，都是國民黨軍隊的，在抗日時受了傷，後來退到台灣去了。由於他們沒有念過書，只好做一些臨時的零工，例如在我家做清潔；他們經常和我講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大陸很好，台灣太小，台灣比不上大陸，台灣什麼都不對。這反映了老兵懷舊思鄉之情。

第三影響就是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至現在，我們的老祖宗真是沒有做過幾件好事，數都數得出來啊！但壞事却做盡了。所以我們中國現在很多樣第一嘛：人口第一的多，每人平均吃的肉第一的少，每個人穿的衣服第一的難看，中國人平均擁有電話和汽車的數字又是第一的少！在文明的程度上講（注意我說的是文明「CIVILIZATION」，是生活方式，不是文化），中國很可能是最落後的一個國家。因為人口太多，這百多年的近代史加上今天

的事實，常使我感覺到，我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媽媽。

我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到過泰東邊界的難民營，看到華裔難民的遭遇，了解到東南亞的華人受到當地很多政治逼壓，我更覺得中國需要一個强大的媽媽。這個媽媽要能保護我們才行，否則我們在世界上的實在太不安全了！

想想有七十萬中國人在柬埔寨被殺。當柬埔寨游擊隊殺害當地中國人時，如果我們的國家有航空母艦和原子彈威脅他們，他們便不敢殺了！

你們在香港可能也有類似的感受，在中國大陸的人也可能如此。在美國長大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也很可能有相同的經驗。於是，「龍的傳人」這首歌就很可能引起中國青年的共鳴。

要人權民主及吃飽肚子

□但是，你這樣關心中國人，你覺得有什麼用嗎？今日中國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是有階段性的。

我小時候最喜歡看的書是「孫中山傳」，那時我覺得我可以做孫中山。後來我覺得問題並不如如此簡單，時代和環境也不一樣。孫中山很清楚地看得見他的敵人，那敵人是誰，是什麼東西，他全知道。但我却看不到我的敵人！我的敵人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一種狀況，一種心態，就因為這種狀況和心態，造成今日中國人的分裂！中國人的分裂又把這種心態嚴重化。我甚至覺得共產主義也不是我的敵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國大陸實行什麼共產主義。他們雖反對封建主義，但他們比誰都封建。

□那麼是否封建主義就是今日中國的問題呢？

■我們盡量不要太突出「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因為這樣會把問題拉小和縮窄，沒有觸及真正的問題。所以我的答案唯

侯德健在泰緬邊境慰問難民。



然不一定是明確方向的答案，但接觸面會比較廣。我覺得中國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什麼都要，我們要有人權，要有民主，又要能吃飽肚子。不過，對今日中國的問題我並沒有真正的答案，我自己也在找尋答案，包括和你談話，也是找尋答案的方法之一。

□那你的方法具體說來是怎麼樣的呢？

■我打個比喻。我所見過的美國人，他們包括耶魯、柏克萊、洛杉磯、芝加哥、哈佛、

哲學經濟學

四〇〇頁 / 二〇〇元

這本書寫作的方法與中外經濟學家都不相同，它以簡單的五個模型，解釋了古典經濟學、馬克斯經濟學、暴力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民生經濟學，和第三種經濟學的新思考，是散文式的不是數學式的，所以很容易懂，而且充備了道德的感性，章章令你感動！

出版：楓城出版社 郵撥：104063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13號



民歌唱出了一個民族的心聲

……：等大學的畢業生。我給他們的分數最高是八十分，最低是六十分，沒有八十分以上的。六十分不算低啊，但却永遠過不了八十分。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從文藝復興以後用的一套方法，只能使他們這樣。如果我們框框太多，用一個答案回答一個問題，就永遠得不到答案。沒有一個答案真的能夠回答問題。所以，我

們需要超越，超越的方式有時並不一定邏輯，或者是根據社會學的基礎，也不見得一定是科學的。

□那我們該做些什麼來改變今天中國的狀態呢？

■小時候，我認爲讓我當總統就解決了一切問題。小時候我認爲這個政府不好，假如我當官就不會這樣了。但長大後我發現自己做官可能會做得更差，因爲我不是那種料子。

最近，我的態度又不同了，我學習去喜歡他們，喜歡台北的官員、喜歡香港的官員、也去喜歡北京的官員。我學習去喜歡和相信他們，在他們年青時，或在今天，他們有個起碼誠懇的態度，想要做得好一點。另外，我要做到讓他們學習去喜歡和相信我，相信我不是他們的敵人或要革他們的命。再進一步令他們相信我很想幫他們的忙，用比較軟的方法來幫他們。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態度。

以前我的態度是，那樣不對，就應該改，不改就不合理，不合理就是錯誤，所以一定要改。有時他們也承認我說得對，但他們說基於現實的考慮，有很多地方不方便也不能馬上就做到。但我總認爲這不可以。所以我今天就把我這種態度收一收。

□你爲什麼有這種改變呢？

■最重要的是，我發現認識一件事，跟去做一件事，是有很大分別的。舉個簡單的例，和女孩子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組織家庭，想來很簡單，我過去絕不覺得有什麼困難；但我結婚以後，才知道這太困難了。我結了婚，有一個兒子，婚姻給我的壓力很大，我才知道想像的和真實的世界，距離是多麼大。既然我是這樣，我的父輩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我自己

做不到的事，就當然不能要求他們做得到！現在我希望和他們一起努力去超越一些事情，用些溫和的、軟的、抽象的東西，像音樂，讓一種聲音使所有中國人聽到以後，對明天都有新的想法。使所有的當權者有一種想法，或者使他們從新肯定過去一個舊的想法；然後這想法就成了所有中國人普遍的想法，這就會有一種力量，這力量會使所有中國人信賴，而不是仇恨中國人；起碼爲了明天，我們不再仇恨。

台灣憑什麼可獨立呢？

□我們談談台灣吧！你在台灣生活了二十六年，比起世界上其他的中國人社會來說，你對台灣的認識應該是深入得多了，你對台灣的印象如何？

■台灣是每個人都有汽車、電話的社會，每人都可以吃牛排，每個學生都很健康，生活非常愉快。但台灣的問題在於，她今天並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每個地方都有人遷入或遷出，但都是在一個正常的比例之內的。可是，一九四九年時，有大批人移到台灣居住，把台灣社會原來的狀況完全改變了，這使台灣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政治環境，她必須說她代表全中國。最近十年，台灣集中於發展經濟，但發現很多經濟上的事情其實是建築在政治基礎上的。所以，在政治上所遇到的尷尬，就是說，她希望自己是誰，她明天是誰，是否永遠都是中華民國等問題，都和經濟掛上了鉤了。所以，台灣人對台灣的明天，很難捕捉，不那麼清楚，也找不到的。我知道我這樣說必須負上很大責任。

□但是，台灣的國民意識不是比較強一點

嗎？

■ 比香港好不了多少！我們看看在美國洛杉磯、柏克萊等地，一個銀行裏台灣人存了超過四十億美元，就知道問題的所在！台灣人對未來老感到不能掌握，沒有將來，只能見一走一步，但越來越感到前面的歧路越多、也越分散！我小時候台灣說要反攻大陸，還要打蘇聯。但後來想想打蘇聯這事情太荒謬了，打不過，於是不叫打蘇聯了，只叫反攻大陸、消滅「共匪」。後來連消滅「共匪」也不叫了。最近幾年反攻大陸都沒有了，攻勢沒有了，變成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態度看來是越來越不積極，就好像甲跟乙打架，但甲只顧逃、只顧躲一樣，沒有打人家的機會！所謂理不直、氣便不壯，上樑不正下樑歪；上樑都如此，下樑就唯有拼命賺錢。

□ 那你覺得台灣可以獨立嗎？

■ 不可能！台灣憑什麼獨立呢？

□ 是不是因為有國民黨？

■ 沒有國民黨也不可能獨立。獨立也得有本錢啊，好像香港，又怎能獨立呢？

□ 香港情況不同。但台灣有自己的政府、

軍隊，經濟也不錯。在美國也有不少很高興見到台灣獨立，為何你說台灣沒有條件呢？

■ 這個問題我暫時這樣來講吧！這句話我

負不起責任。我負不起責任並非是我怕，而是我對這問題了解的程度不夠。我是這樣想的。台灣不僅在血緣上跟中國大陸分不開，在政治環境上雖然暫時與中國大陸割離，但以台灣目前的經濟狀況，十年之後，台灣不跟中國大陸做生意的話，台灣就維持不了今天的生活水平。十年二十年之後，台灣民主問題越到後來就越有必要和中國大陸連在一起。這不是政治問

題，也不是共產黨、國民黨的問題。中國大陸也一樣，四個現代化的成敗與否，沒有人知道，但也朝著大家吃得好一點、穿得好一點的路走去；這樣的話，和台灣的生活水平是會越拉越近的。何況中國大陸和台灣經過現代訓練實際點考慮，中國大陸很需要台灣經過現代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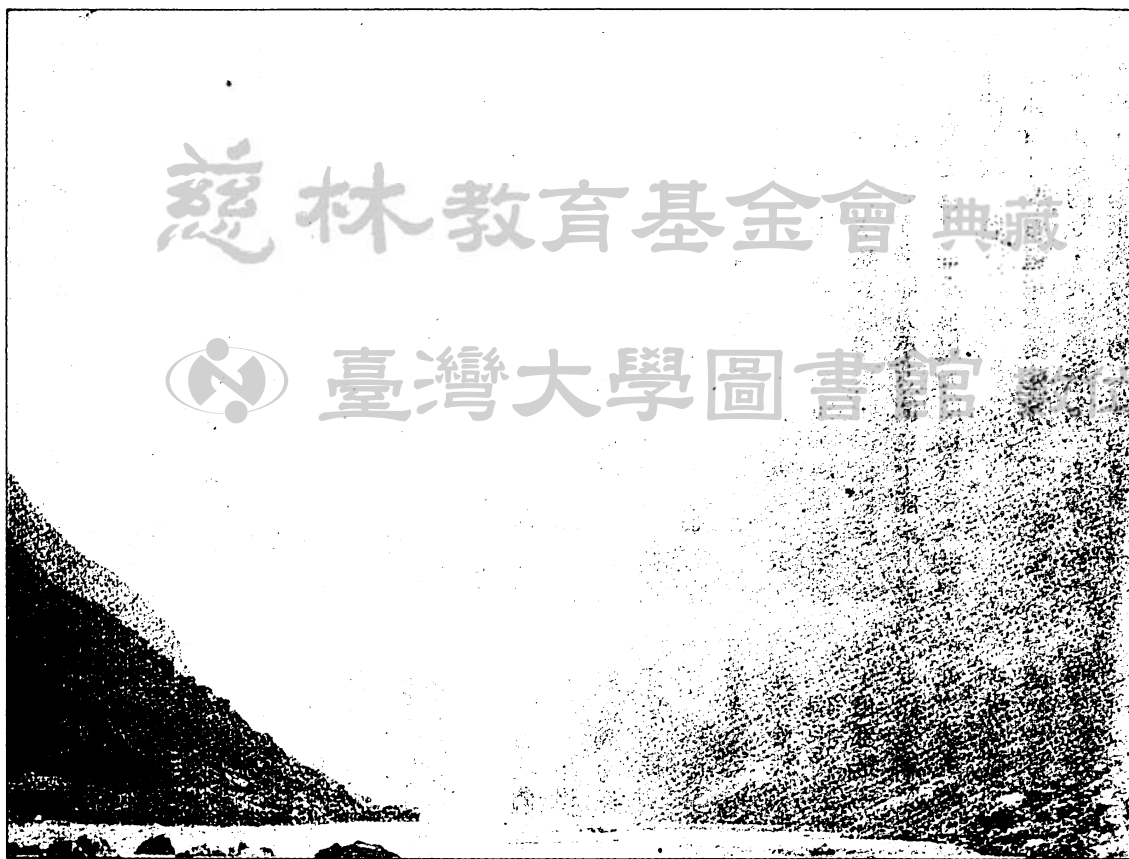
的人才，台灣需要中國大陸的市場，這和香港是一樣的。要解決台灣經濟，就需要搞出口，但這又和台灣的政治情況息息相關，不能割離的。

（轉載自六月十五日百姓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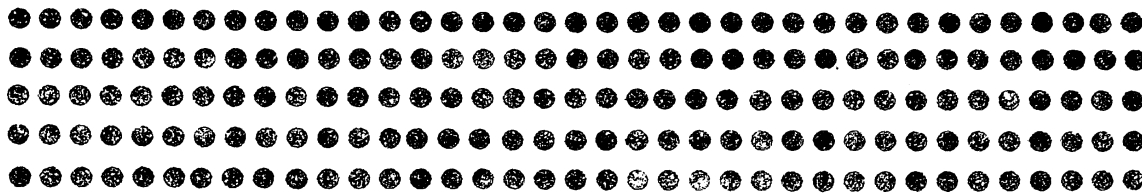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長江三峽是舉世聞名的勝景，侯德建神遊長江，寫下了「龍的傳人」。



秋海棠依舊，只是落紅罷了！ 他們爲什麼「回歸」大陸

洪金立

歷史轉折、地緣斷層、政治鬥爭

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不算偶然的「歷史偶然」下，國民黨痛失江山、倉皇辭廟、退守台灣，轉眼間三十四個年頭過了。當初若不是美國軍事力量介入中國內戰、協防台灣海峽，那麼今日世界七嘴八舌的「台灣問題」，可能早就不存在了。

就因爲有這種或那種「台灣問題」存在，三十幾年來才出現那麼多「回歸」、「台獨」、「改革」的方案；台灣人民自光復至今運氣不算太好，海峽對岸隨時準備對台「統而戰之」，而國民黨政府「政治反攻」的口號聲亦高至雲端，眼見國共兩黨長久以來如此內戰、如此鬥爭、如此延續，在悲歡歲月的逆旅中，台灣本土的民運人士能退而「捕破網」，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好像也算是「萬幸」了。

中共自對台放出「三通」、「四流」的和平統一煙幕後，一九八一年葉劍英又提出「九點和平統一建議」，裏頭說來說去，都是國共兩黨如何「共同分享國家領導權」的問題，根本不讓兩岸人民上枱面，套句葉劍英自己的話，這些不良老年的不良企圖未免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葉劍英的老套顯然吹皺不了台灣的春水，然而有意思的是，十多年來卻有不少大陸以外的中國知識份子或明或暗地，走上「回歸」的道路；這一些人當中，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有很多人竟然是喝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奶水長大的！如馬璧、黃植誠、李大維、侯德健、范壽康、梁容若，他們喝國民黨、吃國民黨，最後卻跟國民黨搞「分裂」，揮一揮衣袖，走了！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檢視海內外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何以「回歸」大陸，便不難發現其各有懷抱；同時也易於了解「回歸」者絕少是因認同於中共政權才跑過去的，他們各有各的處境、各有各的盤算、各有各的抉擇，其真正原因頗值探討、歸納。

盱衡時勢，默察歷史的發展，筆者將回歸大陸人士劃分爲九種類型，並將其回歸大陸的原因、政治特徵作一評估；也許有些地方會「滿紙荒唐言」，然而本意無他，只希望驚醒有關的「夢中人」罷了。

龍的故鄉·尋幽探勝

(一)「尋幽探勝」派：此派人物以侯德健、李翰祥最具代表性。先談「龍的傳人」侯德健好了，依筆者的了解，侯德健之所以毅然拋棄台北，遠赴北京，主要是因爲台灣的家庭及事業「兩頭空」，加上他快行己意的性格，因此爲了揚棄「因襲的負擔」，他只好拔利劍斬斷妻兒的情絲、斬斷來自國民黨的亂麻！在創作事業上，侯德健在台灣曾被警總約談，許多歌曲不是被改就是被禁、文工會會希望他譜作一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於上述有形及無形的壓力限制，侯德健曾說：「台灣方面，把持著檢查權的都很笨，很愚蠢，他們應該起用心胸比較開放、眼光比較遠大、對年青人比較瞭解的、比較有理想的人去做這些工作。當然我在無論甚麼檢查制度下仍會寫東西，但台灣這方面的做法令我很討厭、很頭痛。」至於在家庭方面，侯德健赴京之前在香港接受訪問時說：「我發現認識一件事，跟去做一件事，是有很大分別的。舉個簡單的例，和女孩子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組織家庭，想來很簡單，我過去絕不覺得有什麼困難，但我結婚以後，才知道這太困難了。我結了婚，有一個兒子，婚姻給我的壓力很大，我才知道想像的和

真實的世界，距離是多麼的大。」既然「根本不該作那個決定」（指婚姻）、「政治氣氛非常地悶」（指音樂創作沒遠景），對侯德健而言台灣當然不再有什麼可「留戀」的了，就這樣，他離開台灣了！

至於一九八二年秋天電影名導演李翰祥為什麼「回歸」大陸呢？國民黨的文宣機構當然有他們自己一套的官方說詞，什麼李翰祥「晚節不保」啦、「利慾薰心」啦、「上賊船」啦……反正痛罵李翰祥一頓就是了。李翰祥的事，李敖在「李翰祥回大陸的真正原因」（見千秋評論第十五冊「舊案·新黨·兔」）一文中，有很清楚、感人的現身說法：「……李翰祥因我被國民黨誣陷，以至一再進出警備總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產生極大的反感、憤懣、與恐懼，使他自台灣一脫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來了。」「在台灣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揚子江風雲』、替軍方拍『緹縈』，他是相當投合國民黨的趣味的……」

李翰祥與侯德健原都是非常優秀的藝術工作者，一個拍電影、一個搞音樂，雖然他們在台灣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國民黨合作過、風光寶島過，但同時也都被警總調查過、約談過，這兩人沒想到最後卻都以「回歸」大陸收場，如此結局，國民黨固然要負部份責任，但其中原因也有無關乎政治，無關乎兩黨鬥爭的。侯、李兩人都是狂熱的藝術工作者，有極強烈的創作慾；對於侯德健，大陸有豐富的民間音樂吸引着他；對於喜歡拍歷史片的李翰祥，大陸那些充滿歷史痕跡的實景，更是夢寐以求的；侯李二人為藝術而尋幽探勝去，可以說是造成他們回歸大陸的主因，這是國民黨無法負責的。因此藝術家的「回歸」大陸，固然有值得

國民黨檢討的地方，但國民黨也應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理解，而不要動輒罵街，這次對侯德健的「回歸」，不管是基於什麼理由，國民黨當局冷靜而理性的表現，總是一種進步的現象。

棄甲曳兵·「經濟起飛」

(一)「經濟起飛」派：此派人物以黃植誠、李大維最具代表性。先談民國七十年八月八日的黃植誠事件好了，當時此事發生，軍方先是封鎖消息，繼之宣佈黃是因「迷航」才「迫降」大陸的，結果紙總是包不住火，到現在市井之間還不是非常清楚黃植誠是自發性的投共！他一到大陸就淪為中共對台統戰的樣板，大唱特唱「龍的傳人」（說什麼台灣人民「心嚮往祖國」）、大談特談「盡忠不能全孝」的教條，「紅」透了！黃植誠在台北期間風流倜儻，喜在林森北路、中山北路一帶的酒廊留連忘返，曾欠下了酒廊老闆一筆相當可觀的「煙花錢」；再加上他好賭，欠了別人四百萬元賭債，女人債和賭債兩項齊壓在黃植誠頭上，平常一無積蓄的他怎麼可能擺平這些事？最後在黑社會「討債專家」的威脅恐嚇下，空軍少校黃植誠自知混不下去了，當然只有訴諸遠走高飛一途——飛到大陸，從此台灣的賭債、女人債不必還，而且還額外接受中共巨額的獎金。

至於今年四月廿二日「投奔」大陸的「空軍英雄」李大維，跟黃植誠的情況算是比較類似，差的是李到大陸之後，罵國民黨罵得比黃兇得多！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李大維是因為賭博輸了五十萬元，無力償還，最後才駕機一走了之的。

黃植誠和李大維的案例，不但暴露了部份空軍人員生活的糜爛、鬥志的蕩然無存，而且

還反射出國民黨反共愛國教育的缺失，「打著藍旗反藍旗」，寧不悲哀？黃植誠與李大維二人在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尚未完成之前，就在台灣先把自己的經濟基盤搞垮了，最後只好駕飛機飛到大陸去！

前塵舊夢·反攻倒算

(二)「反攻倒算」派：此派的代表性人物當屬蔣勻田。蔣勻田一九〇四年生，安徽蚌埠人，曾在美國哈佛大學作研究，並擔任過總統府國策顧問。民國六十八年七月，這位被張君勸視為「民社黨舵手」的老人，兀自前往中國大陸、接受中共正式招待，並對台廣播國共兩黨和談主張，頓時之間使得民社黨大為驚慌，國民黨更無所措其手足！蔣勻田究竟為什麼投共？這個問題不容易從正面回答，不妨試從反面來旁敲側擊，或可尋繹出其間的蛛絲馬跡。

不必諱言地，蔣勻田個人的學術根基紮得相當深，尤其對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法政思潮及各國政府典章制度的鑽研功力，絕不是陶百川、徐復觀等人所能望其項背。在「自由中國」時代，他以在野民社黨黨首的身份，勇敢的說了不少肺腑之言，如「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對反對黨應有的容忍問題、批評「台灣省妨害選舉取締辦法」不公的問題……都是，尤其是他在所寫「對蔣總統的忠誠建議」（一九五六、十、二六）一文中，對蔣公有極直率的忠言：「我盼望總統依據憲法，樹立憲政規模，舉其最顯著的事項為：(一)軍隊國家化；(二)警權地方化；(三)情報人員司法化；(四)司法超然於政黨關係。此皆國家社會安定的力量，勿使之有捲入政潮之可能。那是憲政的規模，也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更進一步，我盼望總統鼓勵強大反

對黨的長成，樹立兩黨更迭政府的基礎，以為政治上的防腐劑。」蔣勻田這篇文章的「敏感性」，絕不下於徐復觀隨後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其對蔣公忠耿之情可見一斑。

為什麼過去學術人品都算不錯的蔣勻田先生，他一夜之間就狠心離開了他苦心經營、勉力維持的民社黨？為什麼他一念之間就對國民黨掉頭而去？他以前在台灣不是說過「共產國家不容許有民主的貨色」嗎？既是如此，他「回歸」大陸豈不自打嘴巴？蔣勻田投共的事例，正代表了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

科學中立·派上用場

四「派上用場」派：此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可以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為主，他們三人都是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其知名度早就在全世界「紅透半边天」了。事實上對這些中國的科學家而言，因為他們術業有專攻，重視學以致用，所以「回歸」大陸並不一定因認同中共政權所致；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從「實用」價值來觀察的話，更容易了解：在台灣與大陸之間，這些游學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可能認為大陸比台灣更有發揮所長的餘地，更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再溶入濃厚的「民族情感」的話，他們乾脆義無反顧地「回歸」了。

日葵向陽·偷雞摸狗

五「偷雞摸狗」派：此派的掌門人以馬璧、傅朝樞之流為主。馬璧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三日經由香港投靠中共的，這個事件至今仍讓國民黨很難堪，因為馬過去在政戰學校擔任國父思想教授、前後達廿四年之久，這樣的「三民主義權威」，竟陣前倒戈，跑到大陸去幹「

政協」常委，實在是出盡了國民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洋相！

馬璧今年七十歲，跟毛澤東同鄉(湖南湘潭)，在台期間緊抱住「國父思想」大腿不放，對三民主義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其著作等身自不待言；他離台前職位不少，如警備總部審查顧問(專門對付黨外刊物)、國防部總政戰部特約研究委員、國父遺教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總幹事、「政治評論」雜誌社長等等，他在輔仁、文化兩所大學亦兼授國父思想課程。儘管馬璧在台期間俱有「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的學者身份，但是由於他與軍方關係的密切及特殊身份，卻也曾扣過不少不滿份子紅帽子，搞起「血滴子」來！如民國六十二年台大哲學系「師生約談案」發生後，馬璧不但落井下石，甚且親自在「政治評論」上寫社論，指相關的人是「赤色份子」，不判刑是太寬大了！由此例可知馬璧心腸之狠，陷害忠良之一斑。馬璧一夕之間從台灣的「三民主義權威」突變為中共的「政協」常委，這絕對是一種「三百六十度的回轉」，他若不是在台臥底的匪諜，便是十足的投機份子。俗謂：「做賊的喊抓賊」，這句話貼在馬璧身上是再適當不過了。

再看傅朝樞。他老兄的「台灣日報」在民國六十七年被國防部接收後，就「躲」到香港搞中報系統的月刊及報紙，說是「中報」，其實何「中」之有？早就立場、言論向左轉了，鼓吹「和平統一」了，向中共投懷送抱了。傅朝樞過去在台灣的政、新聞界，「偷雞摸狗」是出了名的，攀附權貴、豪華巧取、「擺譜」扯爛污……十八般武藝樣樣都要。從台灣到香港，傅朝樞的本性依然不改，政客實質依然不變，開始「西瓜靠大邊」、痛罵台灣熱愛中

共了！上次傅朝樞到大陸訪問，鄧小平還特予接見，據說鄧甚至與傅「晤談」七十分鐘，傅以後逢人便提及這種「恩寵」，也因為這個緣故，「傅七十」的綽號從此便在海外不脛而走。

馬璧與傅朝樞先是以陷害忠良來對國民黨政府表忠貞，繼之投機倒把地對共產黨大跳「忠字舞」，這種「向日葵」的政治行徑，可以說是所有「回歸」份子中，最令人不齒的。

兩邊押寶·拈花惹草

六「拈花惹草」派：此派人物可以陳香梅、邱垂亮的行止為典型。陳香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本就是聞名國際的交際花、女政客，她擁有「一千個春天」，筆者是相信的。今年六月十日陳香梅在哀悼甫去世的廖承志時，曾發表一篇措詞曖昧，驚動台北的悼詞，什麼「廖公畢生為國事奔忙，卓有勳勳」、什麼「為祖國前途做出最後的貢獻」、「廖公德高望重，學貫中西，知識淵博，作風淳樸，平易近人，實為難得的偉人」……，悼詞中最值得注意的下面是下面一段：「我等一直盼望廖公能多活幾年，以便完成中國和平統一之崇高使命。」陳香梅總算露出狐狸尾巴來了。的確，她近年來在華盛頓、北京、台北之間，像花蝴蝶一樣地飛來飛去，目的無他，只為中共「和平解放」台灣作一事先的暖身準備爾！陳香梅在海峡两岸的政治角色既是如此，她的第一千零一個春天既是鄧小平，台北當局為何還對她禮若上賓？至於邱垂亮的角色也頗值一提。他現任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當年原是李煥身邊的紅人，「台政」時代因「兩種心向」一文得罪罪當道，搞得他無法像魏鏞、張京育一樣搭上「青年才俊」的巴士。這幾年在海外飄泊期間，邱垂

亮寫作甚勤，筆鋒亦常帶感情，但其範圍總脫離不了「思考」中國及「和平統一」的論調；此外，他對高雄事件、林宅血案及陳文成命案的關懷、憤怒之情，同時也溢滿紙上。邱垂亮目前跟陳香梅類似，也是海峽兩邊押寶，海峽兩邊飛來飛去。當然邱垂亮的政治份量是比不上的陳香梅，然而像他這類型的知識份子，海外多的是。「邱垂亮型」的特徵是——中共、台灣同時都「愛戀」，但也兩邊都批評；這種「欲拒還迎」的政治尷尬，以及那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苦悶心情，真是「難為」他們了。

山河之戀·暗通款曲

(七)「暗通款曲」派：這一派是專指那些沒有特殊政治懷抱，只是單純因為在台灣呆久了、年老思鄉「回歸」大陸去的人民。雖然中共近年來不斷對台展開「三通」、「四流」的攻勢，但是國民黨的政府堅定得很，不准通就不准通，任何人只要胡亂「一通」、至「大陸探親」被有關單位發現，就可能變成台北縣土城鄉仁愛莊（政治犯感化所）的「新住戶」了。

浮蟻遊羣·純純的愛

(八)「純純的愛」派：此派人物可以段世堯（陳若曦的先生）、郭松棻（筆名羅安達）、劉大任……等人為代表。這一派人都是從台灣過去，留美的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在七〇年代「保釣」期間，左傾「回歸」了。當時由於台灣在國防、經濟方面受制於美國和日本，加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面臨最後攤牌，政府處理「保釣」的笨滯、軟弱方式不免令太多留美學生失望！這種深刻沉重的挫折感一方面強化了保釣運動的愛國熱潮，另一方面亦促使中共有可乘之機，在狡滑巧妙的運用下，

結果「就把本質上是衛土的、民族主義的保釣運動，推向本質上是政治的、意識型態的統一運動了。」（郭松棻語）。

參加保釣運動、左傾「回歸」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部份都是基於「愛國主義」的單純動機，後來因受到中共宣傳品的統戰，以及對中共政權產生情緒化、非理性化的盲目認同，才開始由白色變成紅色的。像段世堯及郭松棻等人，他們原都是相當優秀的學者，當年卻因對左翼思想的偏執，放棄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寧願走上崎嶇險峻的警路，這種精神儘管有誤導的成份，卻是一般的小知識份子做不到的。

從左傾到覺醒、從回歸到對中共失望，這是「純純的愛」派的一種火鳳凰的洗鍊，也是一種激情的試誤過程，香港「七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在「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一書中說得好：「我們當中不少人把祖國、母親、人民、土地、河山、民族，連同政權、政黨、當政者、領袖以及政策混合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去認同了。我們對這一整體中的各個成份中的是非、真偽、優劣也缺少辨別。」

其他如詩人高準亦可列入「純純的愛」派。雖然他去年亦「回歸」大陸，但他却是在大陸的土地上公然批評中共；他認為任何中國人，都有權利到他想去任何一片中國的土地，儘管如此，真正的高準卻從此「不準」了——中共不再歡迎他，而台灣當局也不准他回台。

到處碰壁·梁山召喚

(九)「梁山召喚」派——「可能回歸」派：這一派屬於「未來回歸」派，筆者說得有所保留，但是對於陳鼓應、許信良，甚或是郭雨新這一類浪跡海外的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而言，因

為國民黨放逐之，通緝之，孤立之，有朝一日如果他們連美國都呆不下去時，他們究竟何去何從？台北既已「拒絕往來戶」，屆時說不定會因被逼上梁山而走上「回歸」的道路。這是政治的現實，也是小知識份子的悲哀！到處碰壁的「梁山召喚」派，是一種傾向，也是一種警訊，國民黨當局應該用更多的政治智慧來密切注意才是。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以上分析九種「回歸」類型，只是一種嘗試性的劃分和分析，它是用廣泛的角度來解釋「回歸」、描述「回歸」，並作為將來看待「回歸」問題的一個基礎。

「回歸」問題必然牽涉到回歸者、中共和國民黨。分析完上述回歸者，我們不免另有一番感觸。就因為有「分裂」，才會有「回歸」問題；「分裂」是國族的大悲劇，但是多少生離死別、骨肉分離的時代悲劇，却提供了偷雞摸狗、投機倒把的機會，這對於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實在是莫大的諷刺！由於長期不斷的鬥爭，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更使得國家民族的品質日趨下流。想到在異鄉有多少優秀、純潔的炎黃子孫，他們因不善於、也不齒於這種惡劣的風潮，甚而冷眼疏離國族，我們不免要呼籲黨派中的有力人士，請不要為了一時黨爭的輸贏，而將海峽兩岸的廣大人民當作「生死輪盤」上的賭注！

啓：本期因稿擠，連載稿件暫停一期，特此致歉。



議會走廊

立法院

限制連記法 強制表決通過

整個選罷法爭議最激烈的恐怕是修正草案第三條「限制連記法」了。草案第三條規定，監察委員選舉，由省（市）議會議員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投票法」行之，其連記人數以不超過應選名額「二分之一」為限。

也就是說，原來一個人只能投一票的，現在可以投好幾票，原來買一票就行的，現在要買好幾票，原來一票只能賣一人，現在可以賣好幾個人。所以連記法不是杜絕賄選的辦法，而是把一人買票變成集體買票，把一人賣票變成集體賣票的辦法。

國民黨執政當局却認為，買票的對象加多，不易控制，買票就更難。雖買票就少有人買票，所以行政院說「限制連記法」是防止賄選的好辦法。

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國民黨真正的意圖是要把黨外完全排除在監察院之外。

這個條文在委員會以多數票決通過了，六月十七日又以多數票決通過了二讀，想來三讀不會有什麼麻煩。

院會二讀之後，康寧祥發表了一個精闢的見解。他說：國民黨在選舉上做了三件事，在歷史上足以和曹現賄選相提并論。

一、規定六十歲以上不得參與縣市長選舉，這完全是針對余登發、許世賢、楊金虎而制定的，可以稱為「楊金虎法案」。

二是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這也是針對高玉樹而發的，可以稱為「高玉樹法案」。

三是監委選舉改採「限制連記法」。這是針對尤清而修正的，可以稱為「尤清法案」。

事實上賄選和單記法沒有直接的關係，國民黨使出這一招，只不過是為了囊括整個監委名額。因為黨外素質不一，很容易賣個一兩票給黨內財閥。而黨外都是窮光蛋，根本就不可能買票。黨外的票數不能集中。只好望「監」興嘆了。

其次連記法正是控制黨籍選票的利器，因為透過配票的方式，根據排列組合的計算方法，只要對照候選人得票數，就可以很容易查出違紀投票的黨員。

這樣的連記法只能使得政治風氣更敗壞，不會更清明。國民黨為了一己之私利，竟使出這樣的殺手鐮，未免太狠毒了。

表決當天，表決部隊出非常「踴躍」。當周書府提出停止討論時，會場上竟有一五七名的出席數。想是透過慎重的安排。所以周書府的動議一下子得到一四七票，通過停止討論。依議事規則，停止討論之後必須立即表決。

費希平旋即動議。他說，表決方式有四種：

口頭表決、舉手表決、無記名投票表決、點名表決，這個條文太重要了，應該採用無記名投票表決。

費老的意思，是認為黨籍立委受到控制，加以無記名票決，說不定可以喚醒個別立委的良心。可是他的動議，在表決時就不夠附議人數，胎死腹中。

結果還是以舉手表決行政院草案，可以想像黨外連附議的人數都不足，在表決部隊壓境之下，焉能不全軍覆沒乎？

康寧祥所謂的「尤清法案」將是台灣政治上另一筆濫帳。

張德銘 也會放水嗎？

六月十四日立法院就委員會審查完竣的「獻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進行第一次院會審查。

這個修正案被康寧祥批評為「既不成熟，又不誠實」。所謂不成熟就是張德銘所聲稱的，選罷法已經混亂了整個法的體系，而修正案則是越修越不合理；所謂「不誠實」即蘇秋鎮所聲稱的，所有修正案都是為了要限制黨外政治活動而制定的，黨外有什麼活動，原案不夠嚴，就修正條文來整人，把黨外限制得動彈不得。但是對於國民黨的政黨活動及公務員的干涉選舉却有意加以放縱。

這一次黨內外就廣泛討論，連番發言，場面十分熱烈。黨外的策略之一是採取拖延戰術，拖到幾時算幾時，至少使它不適用於年底的立委選舉。

會議開到下午五點多，黨內陸續有人建議停止廣泛討論，進行逐條討論。直到下午五點五十四分，謝生富正式提議「停止討論」，但當時還有八個人登記發言，所以主席徵求委員意見時，立即有人表示異議，既有異議就要表決。可是這時已接近散會時間，「資深委員」早就走了一大半了，根本就無法達到法定人數，怎麼表決？這個動議如果提早一個鐘頭提出，早就通過了，距離散會時間僅六分鐘的現在提出這個動議，謝生富的馬屁拍不到，拍到馬腿上了。

於是主席命令「打鈴」，所謂打鈴，就是按下電鈴，呼叫場外委員進來表決。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五十五分……五十六分……五十七分……，氣氛非常緊張。黨籍委員正在積極向黨外進行協調，梁肅戎找到張德銘，不知說了些什麼，張德銘突然上台說話：

「我們今天散會好了，剩下八個人發言完畢就停止討論。」

這是什麼話，現在是表決的時候，黨外已經穩勝了，張德銘居然出來放水！為什麼八個人發言完畢，就要停止討論，下次院會還有多人要登記發言，張德銘憑什麼剝奪別人權利？張德銘忘了選罷法是個限制民主的法案，只要拖過這一會期，年底的立委選舉就有更多的自由，張德銘自稱是民主鬥士，居然在這個關頭放水！

這時蘇秋鎮聽了十分氣憤，大叫：

「下來！不要說話！」

主席倪文亞對蘇秋鎮說：

「你不要罵他嘛。」

張德銘從台上回座，面色如土，呆若木雞。

六時正一到，主席立即宣佈散會，表決終於流產。第二次院會，依然是一場激烈的辯論。

黨內圍牆，黨外打圓場

在立法院裏面，凡是有拍桌對罵的火爆場面，大約是黨內外對立爭執引起的，但是黨內「資深立委」和「增額立委」之間的矛盾也不小，偶然也會有火爆場面的出現。六月二十五日的預算審查會中吳梓和莫萱元、汪漁洋的對罵便是一個例子。

早先，六月二十二日預算案委員會審查中油公司預算時，吳梓提出質詢說，桃園廠浪費公帑，興建高爾夫球場供少數高幹娛樂，及大林埔油槽設計錯誤，十六座油槽拆除兩座，到底是怎麼回事？會中決議將「定期」邀請中油公司到立法院「專案報告」。

結果在議事錄中，這「定期……專案報告」被主席修正為「專案報告」，不必到立法院報告了。

吳梓心中氣不過，在二十五日審查中鋼預算時，突然提出「程序問題」，要求主席莫萱元播放錄音帶，予以澄清。

莫萱元同意播放主席裁決的部份，但吳梓大聲反對，要求把他的發言錄音也放出來，莫萱元不肯，吳梓在台下大聲叫罵：

「你這是為中油護航、放水！」

「我決不會護航！」莫萱元說。

「上次公賣局的事已經護航過一次了，這

次更不像話。」

「你太過份了。」莫萱元大怒。

兩人於是分居台上台下，大動肝火，互相拍桌叫罵。

這時鄭余鎮和康寧祥看在眼里，頗為怪異，怎麼黨外剛剛宣佈從選罷法集體退席，黨內立委之間就開始兄弟鬩牆起來了。於是忙打圓場說：

「現在是審查中鋼預算的時候，要吵，等審查完畢，延長半個小時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吧。」

但是吳梓不同意。

老委員汪漁洋上台說：

「上次宣讀紀錄時吳委員不在，紀錄已經確定，現在再提出已經慢了一步了。吳委員也有錯。」

吳梓聞言大怒，對汪漁洋吼道：

「你不要說風涼話，你沒有選民，我有選民，你沒事來走走，我還要向選民負責。」

汪漁洋反唇相譏說：

「沒有海盜何必護航？」

言下之意，吳梓是海盜嗎？還是誰海盜？鄭余鎮怕吳梓再發怒，忙上台說：

「不要吵了，現在先討論主題，等一下再延長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吧！」

這才暫時平息一場風波。

黨內圍牆，黨外出來當和事佬，這可是很新鮮的事。

省議會

藍榮祥 沒有說出真心話

新竹縣選出的國民黨籍省議員藍榮祥，二十四日在中國時報第二版，發表了「如何提高省議員的出席意願」的文章，認為省議員出席意願低落的癥結，可以從時間、人力、經費及精神四方面加以探討。他並且提出四點改善方案：

- (1) 設置專人協助省議員處理各類事務；
- (2) 對於任滿屆期而表現優異者，予以適當安排，使其在議壇上累積多年的經驗，繼續獲得發揮；
- (3) 組織之提名及輔選，應作到公正、公平的原則；
- (4) 議長、副議長及黨團正副書記等六人，應經常主動與議員同仁聯繫照拂。

據筆者觀察，省議員出席意願低落的真正原因，藍榮祥祇說對一半而已。問題的癥結乃是在：

(1) 議會的職權有限：「跟省縣自治通則」二讀草案中所列職權項目相比，議決省自治事項、審核省決算、議決省稅省公債及其他增加省民負擔事項、議決並檢查省公有財產和公營事業之經營及處分、議決省社會安全實施等職權，有些遭到「從缺」，有些實尚未落實。

(2) 議會的功能受到戕傷：在中央及執行黨有關黨部心目中，省議會只是省政府的「立法處」，僅有橡皮圖章功能而已，許多議會決議案不是被行政院破壞，就是被省政府「三七五減租」了事。

(3) 省議員幹的再好，也很難返鄉當選縣市長或被遴為廳處長或省府委員，在出路有限的情況下，加上競選耗費過於龐大，許多議員悵鬱而退，成為「搭錯車」的台籍政客。於是「在前途有」、「錢途茫茫」及職權功能同遭戕傷的大前提下，散居各地的議員何苦趕到霧峰出席大會？事實上，以藍榮祥的聰明才智，他一定可以想到這些「降低出席率」的因素；可是，他不肯說出來。

換句話說，省議會的「二枚腰」藍榮祥，已經是徒享虛名了。

林猿羊 已經日薄西山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省議會議事堂裏差些演出「伸張民拳」的糗事。

當時的狀況是：大會從四時開議以後，一個小時內，幾乎是黃玉孺議員在演個人秀；偏偏她所提的刪減台銀預算說明，又無法說得讓人盡懂內容，基隆市籍的黨外省議員周滄淵於是向議長高育仁提議「暫時擱置」。

周滄淵議員的動議，竟然使屏東縣籍的國民黨籍議員林猿羊大為光火。他說：「我在這裏聽了大半天，一直都沒有結論，現在又要暫時擱置，究竟要拖到什麼時候？我不愛做『聽長』了」。他的這席話，換來滿堂鼓噪。

林議員的發火，理由很簡單：這位在省議員會裏素以護航著稱的議員，眼見台銀的預算審查已經延宕許久，却因在場議員人數不足，使他無法提議「停止討論」和「表決」，祇好出此下策。

其實，林議員的護航「本事」不高，品味也不如台北縣選出的國民黨籍女議員苗素芬，而且還會要求「代價」：去年第二次大會時，由於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只給他「乙等」考績，曾經讓他火冒三丈，並且在議事堂內一反常態發出干擾，而鬧出笑話。他認為，以他的衝鋒陷陣，理應得到「甲等」考績才對。

更有趣的是，在他眼裏，不但把黨外議員視為眼中釘，選把同縣籍的其他黨內外議員蘇貞昌、余煥、謝漢津與簡明景視為肉中刺。其實，他們四位的平均年齡，比他小二十歲左右，差了一輩。

不過，或許是去年那件「陣前倒戈鬧場」奏效的緣故，他已經安排出任省漁會理事長，從而打消他「意欲角逐漁業團體增額立委」的野心。這就是國民黨的厲害之處。

一九四二年八月，東港事件暴發以後，當時擔任林道庄保正的林議員曾經遭到波及，並被日本特高警察打得死去活來。對於這件往事，林議員的感想是：政府實在應該給予表揚！他的事蹟是否值得表揚，在此無法細述。唯一可知的是：這位屬於屏東縣林（石城）派、最年長的第七屆省議員的政治壽命，可能已經日薄西山矣！

（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台北市議會

議員出國

各懷鬼胎

△議員出國的機會不少，諸如考察、訪問、進修……等，名堂之多不勝枚舉。而隨着天氣炎熱，議員出國的熱潮也沸騰了，副議長陳健治早在六月初就赴美進修去，蔣乃辛、張忠民兩位黨籍議員，在定期大會尚未結束時，也雙雙向議會請個公假飛走了。

說起議員出國，動機不一；有的名為考察，實則出國談生意，有的說是訪問，實則旅遊成分居多，至於像陳健治副議長者，年年出國進修（陳健治去年夏天亦曾赴美進修），所為何來？爲了政治前途，勤於學習英文，充實學識？或是……？當然，我們不願意假設有人是爲了綠卡出國的。

至於議員組團出國考察等事，升斗小民常有疑問：究竟是真的去考察了？還是接受賄賂出國玩玩？譬如爲了興建焚化爐之事，第一次定期大會結束後，警政衛生小組即浩浩蕩蕩的出國考察去，是否考察出個結果來，市民不得而知，倒是劉樹錚、鄭娟娥爲了旅費，吵了一架！

如是這般，議員出國玄機多多，頗堪尋味！不過，做爲選民的小老百姓有權要求：一、議會開會期間，議員爲了私事出國，議會不可放自己的水，給予公假。二、所謂出國考察，應有嚴肅的責任，真正觀摩他國的做法，以爲自己參考，千萬別來個「府會大家」，大家出國花完錢，回來什麼都忘了，更別再鬧出爲了旅費而吵架的丟臉事來。（林妍）

古蹟遺址立墓碑 警方大喊會「犯沖」

△最近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爲了樹立無形古蹟紀念碑一事，飽受各界的抱怨，尤其是市警局不同意文獻會把「清台灣巡撫衙門舊址」的無形古蹟紀念碑，樹立在警局大門口的對面人行道上。市警局反對的理由是，該紀念碑形狀、色澤類似墓碑，正對着警局大門口會「犯沖」，他們說：「將來警方有什麼大案破不了，要文獻會負責！」

雖然市警局這種不以科學辦案的迷信，簡直無理取鬧，不過真破不了案，文獻會可也負不起責任。但若認真追究，罪魁卻是無黨籍議員謝長廷了。

早在去年四、五月間，謝長廷、陳水扁等人，即於議會民政審查小組提議，古蹟遺址應予立碑標示，以爲文獻教育。那時，爲了台北市的四個城門嵌上「青天白日」的標幟，黨籍議員與無黨籍議員還爆發了一場「國徽」、「黨徽」之爭，黨籍議員趙少康、郁慕明、劉樹錚等認爲，在古蹟上嵌上「國徽」，可以激發民族情感、正氣，而謝長廷、陳水扁、林正杰等人認爲，在古蹟上嵌上「黨徽」，破壞古蹟的完整性。

經過一年，民政局總算從善如流在台北市選定二十個古蹟遺址，進行立碑工作，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爲了紀念碑的形狀、色澤，搞得官員們雞飛狗跳！

無形古蹟標示工作，在許多國家均已開始實施，並被肯定爲文獻教育的重要步驟；「但是，我們怎麼知道民政局會把它搞成這個樣子？」謝長廷啼笑皆非的說，什麼型式、顏色都好，卻偏偏弄得像個墓碑！他說他每次經過碑址都要合掌拜一拜。「早知道是這個樣子，那時就不應該反對嵌上黨徽，現在如果他們說要

嵌上黨徽，我一定不反對了！」（林妍）

● 基隆市議會

垃圾問題爭論不休 填山、填海 各有千秋

垃圾戰爭像一場瘟疫似的，在全省各處泛濫起來！從淡水鎮與台北市的垃圾紛爭開始，及至台北市議會爲了興建焚化爐的利弊得失一事，搞得市府官員、議員們焦頭爛額，而在桃園、中壢，更爲了垃圾問題，演出街頭武打來，大批民衆睡臥馬路，攔阻垃圾車通行！

在一片垃圾戰爭中，最近基隆市政府與基隆市議會之間，也爆發了一場垃圾大戰。

據悉，基隆市現在位於八斗子長潭里海邊的垃圾處理場，大約只能繼續使用半年。半年後，基隆市每天二百五十噸的垃圾要丟那裡去？這很使人頭痛！

最近基隆市政府在深澳坑槓子寮的山谷裡，找了一塊公有土地，準備半年後做爲基隆市的垃圾處理場！但是這項措施卻遭到大多數市議員的反對；他們認爲，垃圾若倒置在槓子寮山谷，將來因垃圾而產生的廢水，勢必流向基隆河，污染該河流域，而基隆河是基隆市自來水的水源地，如此一來，市民的健康深受威脅。

而議員們反對的另一個理由是，市政府制定政策時，本身的相互矛盾！據悉，市政府決

定在槓子寮山谷設垃圾處理之後，卻又花了二億多元做市地重劃，並將重點擺在發展深澳坑繁榮。

這使議員們十分納悶，既要設置垃圾場，深澳坑已無發展可言，這是人人推論可知的，而市政府卻偏又來個市地重劃，準備開發深澳坑！其中是否牽涉到派系傾軋，或者市政府真的白癡到這種地步？此皆有待查証和追究。

根據基隆市黨外議員李信志表示，市政府所以曾提出在深澳坑槓子寮山谷設置垃圾處理場，主要的依據是省政府衛生處所作的一項評估，而這項評估全文僅約五百字，不僅對該處設置垃圾場的利弊未作深入分析，而且對於可能產生的公害、污染問題，亦隻字不提。由於市政府的草率行事，對於關乎基隆市民的健康，如此漠視，很引起議員們的憤怒！因此遂爆發了府會間的「垃圾大戰」！

處理基隆市的垃圾問題，並非別無他策，李信志曾於議會提案，在八斗子長潭里現有垃圾場附近海邊，以築堤填海方式，解決基隆市的垃圾問題。他說，先將垃圾以壓縮處理後，再填置海堤內，如此，不僅解除燃眉之急，且於數十年後，可增加海埔新生地。他並表示，築堤填海的經費預算約八億元，而將來新生地預計總值約三十億元，可增加市府不少財產。

李信志這項提案，已獲得多數議員的支持。而省府主席李登輝於前些日子，巡視基隆時亦表示，處理該市垃圾問題，亦以填海方式為宜。他並指示基隆市長應循築堤填海原則處理。

，作一次深入的評估，以為決策參考。然而，築堤填海的方式，也非萬無一失，它同樣牽涉海域污染的嚴重後果！因此，可以預見的，「垃圾戰爭」在基隆市府會之間必將更形擴大、尖銳！說不定還要波及市民呢！

(林妍)

嘉義縣議會

議員會場打圍

場外「兄弟」助陣

△嘉義縣和嘉義市最近相繼發生議堂動武案，笑鬧江湖，使民衆又好氣又好笑。

這兩個案子發生的經過，都已經報紙詳細報導，值得關心的是：①目前各地方議會成員素質之低落，②黑社會份子介入地方政治之嚴重性。

在嘉義縣議會陳德海與林崑山兩名縣議員在議事廳打完架後，告到法院，由林崑山控告陳德海傷害及妨害公務，六月廿五日在嘉義地檢處開庭，但前一天晚上，林崑山遭到一大批黑道份子包圍，圍住他家，威脅要他撤回告訴，但林崑山堅持告訴，因此，他在廿五日出庭前後都請了警察保護。

林崑山自己也不是沒有自己的黑道兄弟，只不過是對方動用了黑道份子，他改用「白道人士」，如此而已。

高雄市議會

瓦斯公司包賺不賠

非特權份子莫屬

△高雄市政府準備發展類似「大台北天然氣公司」的自來瓦斯事業，並且決定由民間籌組公司來辦。這個決定從暗中醞釀到公開籌組，都有特權操縱的影子。

最近，事態已經明朗，特權已經現形，把持這份包賺不賠的「半公營事業」的，第一個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二個是高雄市議會議長陳田鏞，第三個是在高雄發行的民衆日報老闆李哲朗。

議長加上報老闆，再加上「天子」身邊的輔導會，許多人擔心將來這個自來瓦斯事業能否為全體市民作到安全、便利、廉價的服務。高雄市現有的瓦斯分銷商店希望能在這個公司中佔有一定比例的股權，但在特權把持之下，他們都失望了。

目前，這個「公司」已到了開張的階段。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原訂六月廿一日審查該公司送審的文件，但臨時取消，改將全案報請經濟部審查，據說，是因為建設局受到很大的壓力，才逼使建設局臨時改變主意，不敢自己審查。

● 議會走廊 ●

● 屏東縣議會

議長太人、報老闆、以及輔導會都不是小
小一個市政府建設局能得罪得起的。(南雄)

議會預算編列浮濫
居然勞動縣長刪減

△屏東縣議會下年度的預算編得驚人的浮
濫，不但打破屏東縣歷年的紀錄，也高居全省
冠軍。

屏東縣議會這次共編了三千六百八十八萬
元，比去年的二千六百九十一萬元，增加了百
分之卅六。

由於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七十三年度
的預算，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在「節編」，各
地預算都呈「負成長」狀態，唯獨屏東這個又
窮又落後的偏遠縣份，編了這麼龐大的預算。

令人痛心的是，在屏東縣議會這個龐然大
物般的下年度預算中，多的是為議員自己謀福
利的預算，比如為每位議員添置高級西裝，一
編就是五十萬餘元；又如開個慶祝會，也編列
高達一百萬元的預算。

屏東縣議會的這項年度預算，如果扣除法
定的人事費用、建築和設備費用外，是二千二
百五十一萬元，這個數目在全省十九個縣市中
，也高居冠軍。以台北縣之大，下年度共編列
九十九億預算，比屏東縣多一倍，而台北縣議
會預算中屬「各項費用支出」的也只編了二千
一百卅一萬元，比屏東縣議會「落後」了一百
廿萬元。

● 高雄縣議會

屏東縣議會現任議長名叫郭廷才，據說，
他當初向縣政府提出的議會預算是一千一百七
十萬元，被縣長邱連輝認為「過份」，硬刪了
五百萬。——歷來只聞議會刪減縣市政府的預
算，而縣市長在編製預算時刪減縣市議會的預
算，尚屬少見。(南雄)

議會淪為派系私器

議員要求議會總辭

一向擾攘不安的高雄縣議會，在六月九日
又發生了爆炸性事件——由吳陳惠珍提案，蘇
惠珍、何堅心二位議員連署，要求議會總辭；
他們的理由最主要是因為縣府預算送議會審查
，結果分文未刪照案通過；浮濫預算不獲糾正
，調查真相的小組不獲成立。他們認為議會已
成派系的「私器」，喪失制衡的功能，也喪失
監督的作用，在在悖離百萬餘縣民的意願，為
示負責，他們呼籲議員同仁集體辭職。

吳陳惠珍還在提案中，指縣長在這次定期
大會中常亂開「黃腔」和「黑腔」，有失一縣
之長的身份，有辱議會尊嚴更損失縣譽，也請
縣長一併辭職，以謝選民。

雖然這個提案沒有人繼續參加連署，總辭
的呼籲也沒有得到全體議員的支持，但是在政
治上，却是非常有意義的。它不只針對蔡明耀
縣長，對於多數護航派議員，也是一種抗議。
而這一股強烈的抗議並不是臨時起意，可以說
經過一段時間醞釀的結果。

導致提案總辭的近因，可以追溯到五月卅
一日的十屆三次定期大會。當天大會否決組織
專案小組調查縣府機車管理，及工程發包的兩
個臨時動議，曾引發「紅」派及「黑」派二派
議員的退席抗議，當時黃八野議員還曾拿起茶
杯敲打和大聲叫罵，結果因為人數不足不能開
會，連大會的閉幕典禮都不能舉行就草草收場
。從此，紅、黑二派議員的聯合陣線和白派之
間的對峙便愈來愈厲害，整個議會充滿了火藥
味，任何一個小小導火線，都可能引爆。

黃八野議員在下次大會否決組織專案小組
案時，便曾揚言，將一再提案，直到獲得通過
為止。但是任何提案都須經過審查會審查，才
能提交大會討論，目前每一個審查會白派議員
均佔多數，在目前紅、黑二派和白派強烈對峙
的情況下，可想見，紅、黑二派的提案在審查
會是不會通過的，如果紅、黑二派堅持提案，
那麼敵對的氣氛一定更加濃厚。吳陳議員眼見
議會淪為純派系鬥爭的場所，遂憤而提出總辭
的呼籲。

但是如果果要追究這屆議會派系鬥爭惡化的
原因，恐怕白派要負最大的責任。這次白派在
高雄縣不但執政，而且在議會還掌握多數，以
往縣長和議長均分屬不同派系，如此自然產生
制衡作用，但這次白派貪心不足，連議長都囊
括，遂種下紅派（最有可能當議長）的不滿，
也導致紅、黑二派的結盟。而更糟糕的是，白
派不懂得尊重少數派，在議會白派議員專門護
航縣長，並且對少數派氣勢凌人，本屆議會擾
攘不安，甚而導致嚴重對峙的局面，恐怕是無
法改變了。

十年滄桑 話「中」美關係

奧森伯格 / 著 • 李日章 / 譯 下

邁可·奧森柏格 (Michel Oksenberg) 現任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兼該校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一九八〇年二月，他負責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中的中國事務，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篇文章回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二年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深刻的分析了其間周折起伏的關鍵所在，原刊於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八二年秋季號，是瞭解美國對華政策不可不讀的佳作。

美國談判 正常化的策略

布里辛斯基回來後，在六月二十日的一次會議中，卡特指示他的顧問們準備好在十二月十五日完成正常化，但不要告訴中共所擬定的時間。伍考克的談判就是在這個粗略的目標指引下進行的。

美國政府的談判策略要求伍考克一步一步地把美國的立場顯示出來。最敏感的事情——繼續賣武器給台灣，以及美國片面的聲明——留在後面再談，不會成爲絆腳石的那些問題，如美國決定保持跟台灣的經濟、文化等關係，駐台代表之非正式、非政府性質等等，則先提出來講。整個想法是準備以事先計量好的速度把美國的立場展示出來，如果中共很明顯的不會答應美方最起碼的條件，則把談判拖延下去。「中」美雙方原都懷著一個共同的希望，就是希望一切困難最後都得以克服，自從一九七一年以來，這個希望維繫了雙方的關係。如果中共竟然對美國最起碼的條件說出一個「不」字，那將對雙方關係造成不可言喻的、無法彌補的損失。因此，整個局面被佈置得足以確保中共一定會說出一個「是」字。

從七月到十二月伍考克向中共外交部長的頻頻提議，只不過是北京與華府的三個管道之一。布里辛斯基一直維持著跟華府連絡辦事處主任的定期會面。他的目的並不在評論伍考克的提議，而是在討論世局——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伊朗國王的處境、蘇聯在非洲的擴張主義，以埃和平展望——使得中共能夠了解卡特政府心目中作爲正常化之大背景的全球戰略局面



越南的新領導班子在西貢召開一會議。他們野心勃勃，企圖控制中南半島。

最後，郝爾布魯克又建立了第三個管道，透過這個管道，中共向他提出對美國報紙正在報導的售台武器一事之異議。這使得中共得以專從這個管道來表達他們的異議，而避免爲了他們迫切關懷的事而佔用了其他兩個管道，以示他們還希望其他兩組對話能夠繼續進行。

這些討論進行著，同時，雙方最高當局密切注視著三個有關的發展：他們跟越南的關係，美國跟蘇聯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他們自己在國內的地位。

從一九七八年夏季到初秋，「中」越關係繼續惡化，越南越來越接近蘇聯，到了九月，越南與高棉之間的一場重大武裝衝突愈趨可能。這個局勢不但促使中共去改善跟美國的關係，而且加快了越南尋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步調。在九月間跟郝爾布魯克的一次會面中，越南正式對美國提出賠償的要求，作爲關係正常化的一個條件。越南注意到：在該地區的武裝衝突，或跟蘇聯的更密切關係，都會使正常化更爲困難。雖然越南了解正常化不可能在十一月美國國會改選之前實現，美越談判還是在十月間開始，談的問題都是以正常化爲中心：凍結的資產之處置、使館設置的計劃……。

這時在美國政府裡面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把對越南的談判與對中共的談判關聯起來的問題。十月十一日，卡特告訴伍考克他不希望因爲過早跟越南關係正常化而使對中共的談判複雜起來。不過中共與越南都沒有被告知這件事情。但不管怎麼樣，上述的問題不久就由於若干原因而不再成爲問題。在國會改選前的一天，越南與蘇聯簽訂了同盟條約，因爲它看出：只有蘇聯才會提供軍事與政治的支持，使它完成入侵高棉之舉。在十一月初，這些

計劃已經愈趨明顯。此外，越南之把無數越南人放逐於海上，也逐步削減了美國對正常化的政治支持。以上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美國之承認越南成爲不可能的事。

迫在眉睫的越南高棉軍事衝突，以及已經簽訂的越蘇條約，使中共開始醞釀以軍事行動對付越南。這個可能性使完成關係正常化一事變得更有吸引力。它也可能加強了鄧小平對抗內部批評的力量。要跟美國就正常化達成協議，一定要有所妥協，這些妥協總是難免招致批評的。

在美蘇關係這方面，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已有了很好的進展。這又增強了對中共的刺激。到了十一月下旬，協定的達成似已在望。布里茲涅夫與卡特在一九七九年元月或二月舉行高階層會議的可能性，開始在報界謠傳。布里辛斯基把這些發展一一告知中共，同時也告訴它伊朗的災禍、大衛營協定等等消息。中共終於了解：它如果想在美蘇關係好轉之前而不是在其後大幅改善「中」美關係，就得迅速行動。

美國堅持 售予台灣武器

華府與北京的國內政治力量，以及當時的戰略局面，正在輻輳交錯，共同推動正常化。卡特覺得在大衛營的成功之後特別易於解決正常化的問題。回到華府之後，在九月十九日，他跟中共連絡辦事處主任柴澤民舉行會談，爲正常化談判鋪了路，且表明美國堅持繼續售予台灣武器，只是將小心予以選擇，使其不致對中共構成威脅。這個方案曾在許多場合中反覆提出。然後卡特又於十一月二日透過伍考克告

美國對台軍售是中共與美國間最敏感的問題。美國僅願售予台灣F—15E型戰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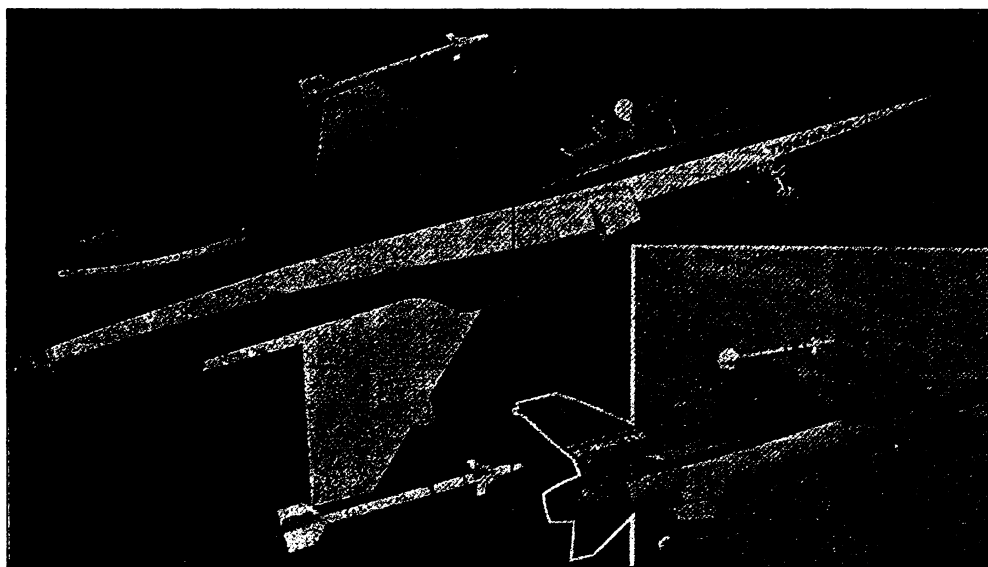
訴中共：他擬以次年元旦為正常化之日期。他早就開始在考慮於耶誕節之前向美國人民宣佈三大成功的事例：完成大衛營協定、「中」美關係正常化、簽訂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協定。鄧小平也正向前猛衝。他已經跟日本訂好和平友好條約。在國內，跟文化大革命有關的那些頭目，地位繼續在下降。鄧於是公開表示中共已準備好正常化：他在某一個場合中表明了想訪問美國的願望，在另一次接待會中則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既然只花了一秒鐘就訂好了，「中」美正常化也只需兩秒鐘便可以辦妥。十二月四日中共間接對伍考克表明：他也打算以元旦為正常化的日期，而且鄧小平準備參加談判，至此，結局顯然已近在眼前。它似乎已準備好承擔軍售問題，並就承認公報進行談判。

伍考克接到通知，說鄧小平想在十二月十三日見他。布里辛斯基也第一次跟柴澤民討論起在北京舉行談判的事宜。為了使計劃中的會談更有結果，布里辛斯基於十二月十一日預先透露了一點美國的提議，表示伍考克將會邀請華國鋒或鄧小平於元月份訪問美國，且提出一份修正過的聯合公報。（伍考克在十一月初便已交給中共一份第一度草稿，中共則在十二月四日提出第二度草稿。）鄧小平既已得知布氏的提示，便代表政治局在十三日接受了美方邀請，並就公報草稿與美方協商。在知道美國決定終止協防台灣條約，且依約讓該條約繼續在一九七九年生效一年之後，鄧小平要求美國在那一年不要賣武器給台灣。

最後的衝刺

伍考克把對話的內容報告給卡特，卡特於是獲得一個結論：只需一次會議，便可以把細節弄妥。鑒於處理伊朗問題時時機外洩的往例，卡特繼定如此重大的一個協定絕不可能長久保密。如果事情點點滴滴的洩露出去，他將失去主動把正常化一事告知大眾的機會。因此，

台灣希望購買而美國不願出售的F—15G及F—16J 79。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鄧小平訪美，與卡特於華盛頓合影。

他決定迅速完成談判，並且在兩天之後，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宣佈這件事情。十二月十四日伍克兩度進見鄧小平，第一次告訴他：卡特寧願在十五日宣佈此事，第二次則跟他一起潤飾聯合公報。伍氏還傳達了卡特願意在一九七九年停止新的軍售之意，但這並不包括補充的零件，以及已經購買而現在正在交運的物品。

華府還擔心中共把暫停軍售一年誤會為長期停售，因此指示伍克再跟中共舉行一次會議，以澄清美國的立場。會中，美方重覆了一次卡特九月十九日的方案。中共也以同樣堅定的態度表示：對台軍售侵犯了中共的主權，中

共無法接受。這一來，談判的紀錄已夠清楚，斯後絕不會有誤會產生。對這個最困難的問題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雙方一方面固然同意使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却也繼續維持其軍售問題的歧見。中共保留了日後重提此問題的權利，美國官員則表示他們相信正常化以後的日子會逐漸出現討論這個問題的較佳環境。

美國從未對這些軍售設下時限，也未曾保證以後漸予減少。然而美國的立場隱然含有一個意思：美國會把軍售的質與量跟北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連在一起考慮。上海公報早就把駐台美軍的數量跟該地區緊張的程度相連在一起。這已導致正常化時駐台美軍數量減至兩千五百人左右。雖然這並不是美國與中共討論的結果，但這原則的引申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當緊張繼續減少時，軍售也會隨之減少。還有，在正常化以前，福特與卡特政府早已決定繼續售予台灣F5E戰鬥機，而不照台灣所要求的售予威力更大的F4。

由於卡特政府曾經大力強調它期望中共設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中共可能因而推斷：他們如果對美國的這個期望有所回應，美國將會在這個地區自行節制。後來的情勢果然如其所料想的那麼發展。由此看來，美國對台軍售仍然是「中」美關係的一根刺。雙方有關的立場既有差距，雙方已有的連結也不甚強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當時雙方如果堅持要就這個問題達成明確的協議或諒解，正常化可能便無法完成。

「台灣關係法」

美國的承認中共以及一九七九年元月鄧小平的訪美，打破了阻攔「中」美關係自然發展達三十年之久的障礙。其後癡狂的兩年有三十項條約、協定與草約在「中」美政府機構之間簽訂。貿易、旅行、學術交流激增。這個驚夢重溫的歷程無可避免的會引發大眾的欣快感，雙方也都對對方產生了過度的期望，這類期望與其說是出於對經濟、文化、學術各領域之未來可能性的理智分析，不如說是出於感情。

但是對若干留心的觀察者而言，一九七九年的某些發展已經發出了警號。該年二月的「台灣關係法案」強力地重新肯定了美國在台灣的利益，這使中共頭腦清醒了過來。事實證明政府無法緩和國會的情緒，後者對若干有關正常化的問題非常激憤，許多議員認為這些問題事先並沒有經過大家充分的磋商。卡特政府事

蘇聯軍力不斷擴張，促成中共、美國加緊聯合。



先已警告過中共：國會可能不得通過一條法律，規定跟台灣維持一種非官方的關係，但後來通過的法案，其有關軍售的措詞却比正常化談判中的卡特方案更為露骨，使雙方對這個問題的歧見益形突出：「美國將供應台灣必需數量的防衛物品與防衛設施，以使台灣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卡特對中共保證：這個方案會在符合正常化協定的方式下加以施行，而且他一定能夠做到這點。但這個保證只能解除中共部份的憂慮。這位總統也許堪予信任，但是下一位呢？

這時高華德及其他幾位參議員又向法院提出控告，指卡特無權不經與國會磋商即行終止協防條約。卡特政府原已向中共保證其所做所為完全合乎憲法，這時中共才知道原來其行為的合法性還得經過政府的第三個部門（也不隸屬於總統）之判決。

「蘇聯的作為加速了 中」美聯合

最後，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又捲入一場有關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爭論。究竟應該先給他這個待遇呢？還是在給蘇聯這個待遇的時候再同時給他？如果採取後一個做法，政府應該在什麼時候行動呢？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之前或之後？有些國務院的蘇聯問題專家，企圖把跟中共在六月簽訂的貿易協定延遲提交國會，他們希望等到美蘇關係穩定下來時再行提出。他們認為，當時美國正被捲入「中」蘇爭執中而偏袒中共；他們還咬定美國之日益向中共一面倒乃是激發蘇聯之機會主義的一大因素。

反對的一方則以為，在蘇聯斷然拒絕變更他們的移民政策以滿足美國的法律要求之後，不給中共最惠國待遇，不啻是因蘇聯的不妥協而懲罰中共。有一件事情在爭論中幾乎被忽略了，那就是美國曾經答應，設法迅速通過貿易協定以及給中共最惠國待遇，以換取中共接受美國財政部長於一九七九年三月根據有利於美國的條件而擬定的，解決凍結資產問題的辦法。但不管怎樣，總統最後還是支持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不但如此，他還支持副總統孟岱爾的建議：舉凡一切雙邊問題，應該就蘇聯與中共分別加以考慮，這些問題包括：出口管制、進出口銀行融資資格、最惠國待遇等等。孟岱爾在

在秘魯獨立紀念日亮相的蘇製坦克；美國一向密切注意蘇聯在拉丁美洲的發展。



其八月的訪華之行時告知了中共這項基本決定。中共也禮尚往來，在一九七九年一年之中加速對西方開放。事情進展得出乎意料之快，原屬閉路性質的孟岱爾北京之行，竟幾乎完成了雙方在一九七九年元月擬定而預計十八個月才能完成的全部議事日程。尚待談判的則有航空、海運、紡織及領事協定，這些複雜的談判預定在一九八〇年八月間完成。

無疑的，蘇聯在此前一年中的所做所為加速了「中」美的聯合，這些行為包括：布里茲涅夫為警告美國及歐洲盟邦而採取的諸般嚴厲措施；蘇聯在拉丁美洲、越南、中東及非洲的機會主義行為；蘇聯在中蘇邊界的不斷軍事集結，包括在蒙古的增強軍力。這個一般戰略情勢，以及卡特與鄧小平在一九七九上半年繼續保持的政治力量，為雙方關係的突飛猛進提供了基礎，並使雙方對台灣問題的歧見遙遙沒入背景之中。

一個新的 「太平洋聯盟」？

到了一九七九年夏天，友好關係已經擴展到軍事之外的一切領域。在孟岱爾訪問期間，軍事領域的關係也開始醞釀，當時雙方都同意了國防部長布朗在近期訪華。在此之前，關於雙重用途的技術與歐洲武器的銷售問題，在卡特政府中早已引起了爭論，布朗訪華之行的準備工作，更使這爭論趨於尖銳。布里辛斯基與布朗都希望把「中」美關係培植到變成蘇聯永遠都必須列入考慮的因素之程度，讓蘇聯認識



政治海報：「魔鬼（巴勒維）走了，天使（柯梅尼）降臨。」從此美國失去中東最重要的據點。

到任何擴張主義的行動都有促進「中」美軍事合作的危險。這可能有助於約束蘇聯的行為，而對華府與北京有利。

這個策略代表了從國務院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所鼓吹的政策之更進一步，該政策因美蘇關係的惡化而推行受阻，其目的原在設法同時增進對「中」與對蘇關係。因此，毫不意外的，國務院有人擔心布朗的訪問及其後果會不必要的激使蘇聯從事冒險，因為它原已感到被圍困。卡特強力支持布朗之行，不過認為應該善自約束。這次訪問本身的象徵意義，以及

其後防務交流的安排，就已經夠瞧了。

蘇聯的入侵阿富汗使布朗訪問的範圍擴大——這次訪問本來在入侵（十二月廿七日）之前即已排定。在他啓程當天早上，卡特總統吩咐布朗告訴中共：美國願意考慮售予非致死性的軍事裝備，不過必需逐案考慮。這時卡特想到的是卡車、雷達、交通器材、指揮與控制裝備。當時中共沒有立即反應，不過等到一九八〇年年底，事情已經探討到相當細的細節。中共國防部長耿飈加入副參謀總長劉 所領導的一個小組，在五月跟布朗舉行進一步的商討，又在九月跟美國國防部發展研究部門首腦佩里（William Perry）舉行一次同樣的商討。透過這些訪問，雙方對售賣各種裝備與技術的必要性、可能性與局限性都有了更確切的了解。這時，許多觀察家已開始談到「中」美（及日本）開始要形成一個太平洋聯盟或協約之事。

無疑的，一九七九、八〇年的軍事聯繫，乃是肇端於前此數年蘇聯軍事力量的急速膨脹，以及蘇聯之介入南非、中南半島與阿富汗。伊朗的災禍，以及美國之希望長久在波斯灣維持一支軍力，也是原因之一。美國在波斯灣的部份海軍係來自太平洋艦隊，美國能否長久指派艦隻擔任中東任務，則視西太平洋之穩定與否而定。如果韓國有衝突發生，而波斯灣又緊張如昔，美國的處境就很難了。這只不過是隨便舉的一個例子。同樣的情形，中共如果自信美國不會再用台灣來增加其防衛計劃的複雜，他們就可以完全將其軍事資源投注於應付蘇聯之威脅及中南半島問題。基於這個觀點，從一九八〇年年初，繼續到現在，建設性的「中」美關係，以及其所帶來的東北亞之穩定，已經

德黑蘭的伊朗民衆燒燬美國國旗，遊行示威，高喊：「美國是我們的敵人。」



成了美國與中共國家安全政策之主要基礎。

與此同時，布朗的訪問也揭示了雙方戰略展望之歧異。於此，美國的反蘇論調第一次顯得高過了中共的論調。中共並不顯得急切想透過明顯的方式跟美國「作去協助巴基斯坦。中

共勿寧開始發展出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在其後兩年中愈來愈見重要。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大計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去實現。中共已得出一個結論：對中共的利益而言，增高美蘇關係的緊張，並無必要。那可能會把中共捲入一場非其所求的衝突。總之，蘇聯之入侵阿富汗，可能提醒了中共跟美國走得太近的危險。

雷根的親台政策

從一九八〇年夏天到一九八二年夏天，雙方關係經歷了一個不安與緊張的時期。所遭遇的困難有一部份開始發生於卡特政府任內，當時政府授權美國飛機公司與台灣商討售賣高級噴射戰鬥機F-X的事宜，並准許台灣在華府非官方機構「北美事務協調會」之成員享有外交豁免權。更嚴重的是候選人雷根在一九八〇年八月聲明他希望使美國對台灣的關係變成官方關係。雷根拒絕認可上海公報或正常化協定，却以「台灣關係法案」作為他對華政策的基石。中共又眼見雷根受到極端親台灣的顧問們所包圍。他們終於相信：雷根內心支持「兩個中國」的立場，其真正意圖是使台灣永遠與大陸分離。對中共的整體世局觀與中國革命的目標而言，統一中國的慾望當時仍然是很強烈很核心的一個慾望，因此「中」美關係在雷根一開始執政的時候就註定了要風雨飄搖。

雷根之邀請台灣派代表參加其就職大典（後因中共的抗議而有所變更），雷根個人之繼續抗拒認可上海公報，以及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艾倫之開始與「北美事務協調會」主持人接觸，諸如此類的事情，自不可能有助於事情的改善。而對台軍售問題仍然隱隱存在於背景之中。



，售予F-X戰鬥機一事，大有可能成爲事實。雷根政府於是試圖穩住情勢。它先於一九八一年三月宣佈不再升高對台關係，繼則派遣國務卿海格於六月訪問大陸。海格告訴中共：雷根願意考慮售賣武器給中共，並正在放寬出口高級技術到中國大陸的限制。海格的訪問似乎也緩和了中共對美國對台軍售的恐懼。中共副參謀長劉某二度訪美之事也被提出來討論。該年夏天，中共官員表示：他們期望在不久之後美國對台軍售可以逐漸減少，而終至完全停止。售予F-X戰鬥機則將導致嚴重的倒退，中共自必反對，但他們還可以忍受慎重的售予。但雷根一九八一年三月之重申信守上海公海格積極支持聯中（共）制俄政策。他的去職多少影響了中共和美國的聯合行動。

報與正常化協定，以及海格在是年六月的訪問北京，並沒有產生持久性的效果。劉某二度訪美沒有成行，便是一個徵兆。中共繼續看到美國內部在對華政策方面意見分歧的徵象。在中共眼中，海格已成爲現行政策的護衛者，但眼見白宮與國務院的關係緊張、海格的官運不濟，心中不免暗自焦慮。

鄧小平的難題

還有，在中共內部，鄧小平自身的政治力量似乎也受到了考驗。一九八〇年末期開始的開支緊縮，使人對鄧小平前此兩年的經濟經營發生疑問，一九八一年中期對文化領域的加緊控制則使某些自由化的趨向不進不退，在此之前一般都把鄧小平與這些趨向視爲一體。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所做的評價，乃是持久的、紛亂的爭辯之產物。由於來自內部的壓力，鄧小平將主要精力用在繼承人的安排上。因此，在整個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初，鄧小平都比較欠缺能力與意願去把他原已有限的政治資本花在保護「中」美關係上，這個關係當時在華府方面也沒有受到細緻的經營。

中共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九點方案

大概是自覺到一向表示得還不夠肯定，而且拖延下去也不見得完全有利於他們，中共於

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卅日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九點方案。雖然所提出的各點在以前都曾經提過，但這次的舊話重提却大力強調了北京之偏愛和平解決。中共還開始一項主要的努力以促使台灣從事談判。九點方案的一個次要目標，可能是想影響美國有關軍售問題的辯論。這個話題，在該年十月雷根會晤中共總理趙紫陽時，以及同月中共外長黃華訪美時，都沒有談出令雙方滿意的結果。

中共希望美國保證在一段確定的時間內終止對台軍售。但在政治上，在法律上，（許多人甚至會說：就是基於外交政策，也是一樣。）美國都不能這麼做。在正常化時一度被巧妙地攔在一邊的台灣問題，這時又被擺在第一綫與最中心。

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霍德瑞治在一九八二年元月去到北京，通知中共：雷根決定不售予台灣F X戰鬥機，但準備在一九八三年期限到達以後繼續幫助台灣合作製造F 5 E飛機。霍氏也開始跟中共一道探求若干雙方都能接受的、處理軍售問題的原則。雷根政府故意延遲通知國會有關F 5 E飛機的決定，希望能夠先和中共在這方面達成協議。

雙方的商討持續了整個春天與夏天，一直在北京進行著。其間，四月五日，雷根總統曾經致函趙紫陽總理與鄧小平副主席，五月美國副總統布希訪問北京，帶去一封雷根給共黨主席胡耀邦的信，參議員貝克也一度訪華。在這段期間，「中」美關係的前途確確實實是安危未定。

「中」蘇關係的轉機

在這段期間，蘇聯做了一點努力以改善「中」蘇關係。但中共並沒有做出任何戲劇性的反應。自從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共一直都在努力使「中」蘇的關係穩定下來，這努力是顯而易見的。除了一九七九年初中南半島衝突期間，與一九八〇年初阿富汗危機期間，從一九七六年以來，中蘇關係確實一直朝向一個較不充滿仇恨、較不那麼反覆無常的趨勢在發展。意識形態的爭論總算過去了。邊界對峙已不像以往那麼緊張。某些低階層人員的互訪也已開始。然而雙方的軍事集結却持續著。

在「中」美關係陷於緊張期間，北京不急意向莫斯科靠攏，以響應蘇聯的主動示好，却選擇了另一個做法，即特意突出它的獨立於兩大超強。它的論調開始把蘇聯與美國歸併在一

起。「霸權主義者」一詞不再保留給蘇聯專用，却擴大使用到美國身上。美國對拉丁美洲、非洲與中東的政策，被它以嚴厲的語調加以譴責。總之，它一方面稍微疏遠美國，一方面則加強強調其開發中國家的身份，而更活躍的贊助第三世界的各種目標。

中共一九八一—八二年間外交政策的這些微妙變化，並沒有阻礙跟美國的協議，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雙方終於發佈了有關軍售問題的一份重要公報。這份文件以上海公報與正常化協定為基礎，使隱含在上述兩份文件中的東西明顯化。它綜合了上述雷根三函以及中共歷次有關其對台政策的聲明之用語。由於把先前那些分開的話語關聯在一起，使它們相依相待，它們乃有了更大的約束力。公報有如下幾

中共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十一國。津巴韋總理穆加貝在機場迎接趙紫陽。



Photo held by Professor Tsu-Ping
Digitiz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個重點：

一九八二年「中」美 公報發表的背景

——中共重申其力求和平收復台灣的政策。

——美國否認有意侵犯中共主權或破壞其領土完整，或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

——美國表示其了解及欣賞中共力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

——謹記著前述雙方的話語，美國表示不想施行長期對台軍售政策，其軍售在質或量上不會超過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水平，而且有意逐漸減少其軍售。

——雙方保證盡各種努力以創造有利徹底解決軍售問題之條件。

這份精心製作的文件並沒有解決軍售問題。但它却使雙方重新開始擴大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這一來，軍售問題將來便可以在雙方不斷增強連繫的局面下加以處理，在這個局面下，各方自然會有充份的動機去繼續照對方的利益。

那些因素促成了這份八月文件呢？內部的顧慮是一個因素。由於雷根需要在短期內通知國會最關F5E飛機的安排，談判便不能不有一個期限，當時美蘇關係的狀況則使得雷根政府不容它與中共的關係惡化下去。在政治上，雷根固然面臨著逼迫他恢復對台大筆軍售的強大壓力，但他如果由於處置不當而使「中」美關係惡化，他在政治上將極易招致人們的攻擊。

因此，雷根政府準備及早解決這件事情。在中共這一方面，籌備全黨十二屆大會乃是當時領導階層主要關心的大事。該年四月，鄧小平集團似已恢復了在一九八一年一度失去的對重大人事安排、對重組政府官僚體制、對指揮經濟等事務的主動能力。到了八月，全黨大會的籌劃已有充份的進展，鄧小平又有餘力可以對付棘手的軍售問題。此外，在一次重大會議的前夕，能夠跟美國達成協議，也有助於加強領導階層的地位。這次大會將決定國家領導權的繼承，以及未來經濟發展的策略。跟一九七八年後期的境況相似，加強與美國的連結，在內部是很有用的。

結語

「中」美關係的基礎

本文開始的時候，曾經提出三個問題。什麼是一九七二年以來「中」美關係升降起伏的原因？什麼促使它前進？什麼阻礙了它？我們的考察揭示了三大因素的微妙互動：全球戰略情勢、雙方的內部政局、台灣問題的處理。其中每一步都需要雙方的妥協與遷就對方的政治需求，也需要有穩固的領導階層跟對付困難問題的能力。

單是穩固的領導階層尚不足以保證連結一定會擴大。連結的擴大必須符合雙方的戰略與經濟利益。一九八〇—八一年間，促使關係往前發展的，是對蘇聯加諸雙方的危險的共同認識，以及對必須改善關係以作為應付威脅之手段的共同認識。在最近這個時期，中共發現蘇聯對他們的直接威脅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嚴重，

因為後者已經陷於阿富汗與波蘭的泥淖，並深深投入中南半島、古巴與非洲。然而對美國仍然是有用的，美國不但是長期平衡蘇聯壓力的籌碼，而且也是加速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與技術之來源。對美國而言，對中共的關係，以及其所帶來的東北亞的安定，使得美國得以把它的資源集中在更直接受到蘇聯威脅的地區，所以也是很有用的。更有甚者，八月十七日的公報接受了一個前提：台灣人民，不能從一味依賴武器而獲致幸福，只能從建設性的「中」美連結而獲致這幸福。

然而「中」美雙方利害確有衝突，特別是在台灣問題這方面。除非內部政局與戰略情勢容許這個問題緩和下去，否則台灣問題隨時都會變成「中」美關係的一根大刺。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或總統候選人必須應付一大批國民，他們相信美國對台灣人民（某些人還會加上政府）負有很大的道義責任。任何中共頭目也都必須面對一項強烈的意見，這意見認為必須把收復台灣列為國家的一個主要目標。一旦這個問題熾熱起來，雙方便需要運用一項圓滿的技巧以達成一個新的和解——像一九八二年夏天雙方所顯示的那樣。

十年來的紀錄顯示了一大弔詭。在一方面，「中」美關係始終表現出一種脆弱性，很容易因為台灣問題的處理不當而趨於銷蝕。另一方面，當雙方面臨破裂的可能時，它們又會被迫達成和解，因為建設性的「中」美關係已經變成雙方國家安全之不可或缺的成份。



廖承志過世 引發的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在他即將當選為中共國家副主席之前一週，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消息傳出，頗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廖某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之一廖仲凱的獨子，小時曾在日本一所天主教學校受教育，一九一九年回到中國大陸。他父親於一九二五年遭到暗殺後，他又回到東京，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三年後，他因從事革命活動遭到日本政府驅逐出境，遂以海員身份到歐洲旅行。其間，因分發共產黨宣傳品又被德國驅逐，隨後，他

即取道蘇聯返回中國。

廖承志回到中國之後仍然繼續共黨活動，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遂遭國民黨政府逮捕。但是因為廖某的母親何香凝在國民黨內部有影響力，她利用其地位親自向前總統蔣公求情，廖某不久即獲釋放。抗日戰爭期間，廖承志在華南共黨活動中再度遭國府軍隊逮捕，從一九四二年一直被囚禁到一九四六年初。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廖承志曾活躍於蘇聯控制下的國際青年與和平組織中，一九五三年還曾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史達林的葬禮。

廖某雖然在少年時代即已參加共黨活動，但國民黨創始人士之一的後裔這個身份，對他在紅朝的宦途却有深刻的影響，而其中有幸也有不幸。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會抨擊廖某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但廖某早於一九七一年即獲平反，而且隨著中共逐漸加強國際關係和對港、台統戰，也逐漸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

由於在日本出生和受教育，而且曾在日本活動過，能說流利日語的廖某，在對日關係上明顯地從事統戰的第一綫工作；他不只介入一九七二年中（共）日建交工作，建交之後，經常訪問日本，且擔任中（共）日友好協會會長，一九七八年還陪同鄧小平一起到日本訪問。廖某和日本關係之密切，從這次廖某過逝後，日本政、經界領袖所發表的談話可見一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給中共總理趙紫陽的電文中，稱讚廖某「在日中（共）友好關係的歷史上，留下不朽的功績」；外相安倍晉太郎表示「我們失去了一位寶貴的朋友」；自民黨幹事長二階堂也表示：「我們失去了良師，也失去了好的談判對手。」

「經濟界方面，中（共）日經濟委員會主席土光敏夫形容廖某之死是中（共）日兩國商界「無法補償的損失。」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稻田嘉寬也提到：「廖承志是真正可以依賴的人，也是真正了解日本的人」。日本天皇則特別派禮法務大臣古井喜實為特使，赴北京追授廖承志「勳一等旭日大綬章」。按日本政府對中國人贈給勳章，這還是第一次，由此可知，廖某和日本關係之密切，以及他在中（共）日關係上所起的積極作用。

廖某的國民黨關係可以說是他近年受重用的原因之一，但他在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戰方面却沒有成績可言，廖某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廿四日發表了致蔣經國先生的信，固然引起海內外華人界和國際的注目，但國民黨政府顯然無動於衷。

由於廖某是廣東人，其祖父及父母輩也均為華僑，因此他在對華僑的統戰工作上自有其便利之處，也因此，廖某才能擔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一年來，中共積極推動收回香港工作，廖某又成為處理香港問題的重要負責人（擔任香港澳辦辦公室主任），所以廖某的過逝，香港方面的反應也較為強烈。香港問題上，廖某固然只是執行中共黨的政策，其過逝不足以影響中共處理香港的既定方針，但是往後由誰來接替廖某的工作，仍甚受香港人的關注。某些香港觀察家預測，習仲勳可能接替廖某的職位，也有謂繼位者將會是有海外關係，具備外交修養的年輕幹部，而且最可能來自廣東和福建。

總之，由於中共卅多年來政局經常動盪不安，政策幾乎無法貫徹，因此北京政府對外所提的任何政策（尤其是對港、台）被取信的程

● 華人世界 ●

度相當低，因此在統戰方面，「人」的因素便相當重要，而廖某因為頗受僑界重視，他在對香港和僑界的統戰成果也相當可觀。六月廿四日廖某的追悼會上，中共黨和國家領袖及各界貴賓共有近三千人參加，可說是備極哀榮了！而這不只是中共對廖某的回報，更可視為對廣大華僑界的一次統戰。

總之，廖某一生為中共鞠躬盡瘁，其過世固不致於影響大局，但在可見的未來，要找到同廖某一樣在個人條件上便於對港、台從事統戰工作者恐怕已不可得，因此廖某的過逝，對於目前正積極推動統戰工作的中共當局仍是一大損失。

本屆中共「人大」所透露的新訊息

這次中共「人大」大會的召開，到目前為止，比較引人注意的有以下三件事情，一是烏蘭夫出任「國家副主席」，二是李鵬與田紀雲升任「副總理」，三是凌雲出掌「國家安全部」與于明濤負責「審計局」。

首先，烏蘭夫出任「國家副主席」真是白棟到，拜廖承志死亡之賜。然而，就廖、烏兩人來說，廖是革命六勳廖承志之子，又是廣東人士，對台灣及海外統戰具有高度價值，去年以私誼寫信予蔣總統經國即造成相當程度的震撼，不料廖氏一死頓使中共大失統戰資本。面對此一挫折，「國家副主席」只好由烏蘭夫充任，希望藉著烏是蒙古人的身份，對中共內

部少數民族實施統戰，以示中共團結拉攏少數民族之意，但在對海外及台灣統戰方面就沒什麼作用了。

其次，李鵬與田紀雲升任「副總理」，顯示中共內部的專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而且也發展到相當的政治地位。自中共進行「四化」以來，由於本身在資本與技術方面的欠缺，導致工業、農業、科技及國防的「四化」幾乎成為四個空話、夢話的「四話」。在這種情形之下，專業技術人才受到重視與肯定是必然的趨勢，就是任何堅持「土法煉鋼」的中共頑固派，也不能不承認「專」比「紅」要重，至少應等量齊觀。可惜的是，「紅」與「專」兩者孰重孰輕的問題，一直與政治糾纏不清，並不是個技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所以，要想就此斷言，中共已走向專家政治之路，恐怕還是癡人說夢，猶待時間來說明這個答案。

最後，凌雲出掌「國家安全部」與于明濤負責「審計局」，皆與中共進行「四化」及「門戶開放」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設立，乃是共產極權國家要想與外界接觸的防犯措施，而中共自實施「門戶開放」以來，一般人民對共產主義及中共政權的懷疑與反感益烈，中共為了壓抑這些與日俱增的反共勢力，唯有加緊控制內部，免得江山不保而遭倒台的命運。「審計局」的創置，跟中共貪污腐化與浪費亂用有關，這也是進行「四化」的重大阻礙，像審核收支的單位會出現，即指出中共財政問題有待大力整頓。

此外，鄧小平出任「國家軍委主席」，以及彭真出任「人大委員長」，甚至李先念擔任「國家主席」，皆在觀察家的意料之中，實不足為奇。而本次「人大」對葉劍英的冷落有加

，則是鄧小平故意如此，希望將葉氏趕下政治舞台，徹底打擊反鄧勢力。

總之，中共「六屆人大」的召開，就目前所知，鄧小平的「體制改革」已獲得相當的進展，至於是否還會另出奇招，尚待進一步觀察會議的進行。（育生）

中共的石油開採

——一場鉅額的賭注

中共最近在渤海灣採油，相繼傳出進行順利，獲得成功的消息，正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從七十年代開始，中共就全力探查渤海灣的石油，不幸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發生了海上鑽井裝置傾倒事件，結果有七十多人喪身。顯示中共自力更生的過程中，還有不少的困難。

其後中共改變政策，決定引進外國企業科技，准許日本、法國的石油財團參與渤海油田的開發。而其中以日本的成就，最為顯著。最近三年，試挖六口採油井，其中五口碰到油層，而且噴出的石油，都是商品價值頗高的輕質油。

過去中共曾經自誇「地大物博」，可是由於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科技落後，不得不承認底子單薄，於是表現悲觀而不敢過份誇耀。然而最近渤海石油開發成功，使中共逐漸恢復了已經喪失的自信心。最近中共當局正快馬加鞭加速開發所謂海洋油田：包括南中國海（珠江口及黃海）等大陸棚的石油。

據了解，由日本負責開採的渤海灣油田，將於三年後（一九八六年）開始產油，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日產量將會達到二十萬桶到三十萬桶之間。如果這項估計正確，那麼這個油田，將稍微小於印尼最大的「米那士」油田，而與挪威的阿克費斯克油田大體相同。

中共當局爲了促進三個海域的石油開發，曾讓外國企業以自費方式進行物理探鑽調查，事後根據蒐集的情報，將四十三個鑽區，提出國際投標。

參加投標的三十三家石油公司中，于五月下旬，初次准許B P石油財團（由British Petroleum等英、加、澳、巴西，五家公司組成），取得黃海一個鑽區和南中國海四個鑽區的開採權。

從一九七九年到八〇年初期探勘，有各國國際石油財團（Majors），日本石油公社等八個集團（四十六家公司）參加，經過地震探鑽，取得資料分析。調查面積大約四十萬平方公里大陸棚中，可能含有石油、瓦斯的地層結構數目，約爲渤海的五倍左右。

在幾項試算中較樂觀的估計，將黃海、南中國海，鶯歌海包括在一起，到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期，日產量將達一百萬桶，再加上渤海油田，中共的海洋油田合計產量爲每天一百二十萬桶之譜。

中共目前陸上油田，每天大約生產二百萬桶的原油。其中外銷量約占百分之十五，如果因陸上油田逐漸枯竭而減產，依據最低限度的估計，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中共的陸海石油合計日產量，將達三百萬桶級的產油大國？提到三百萬桶級的產油國，以目前來說，是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產量。

石油乃是具有濃厚政治性色彩的商品，如以低價輸出，或在匱乏的時候適時供應，輸入國家對輸出國家將會產生依賴性，所以中共對鄰國的國際關係，將可能發揮上列石油外交效果。

相反的，如果中共正式向亞洲、西太平洋能源市場推銷石油，就等於奪取印尼、馬來西亞、婆羅洲、泰國、澳洲、紐西蘭的石油市場，而對他們構成威脅。

爲了鞏固能源市場，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在戰略上會團結起來，以對抗中共石油帶來的震撼。倘若中共石油屬於輕油，而流通性普遍的話，新加坡所表現的立場，就顯得微妙了。石油輸入國菲律賓顯然也會靠攏中共，這一切都可能引起東南亞國家的變化。

如果亞洲、西太平洋區域，吸收中共增產的新天然氣，則只有減少中東石油的輸入。最近中東各國首要，相繼訪問中國大陸，就表示對新石油勢力擡頭日漸升高的關切。

中共搖身一變，成爲石油外銷大國後，勢必加強經濟、軍事，以及外交的力量，加上中共擁有核子武器，而且不會參加核子武器裁軍談判，以此特殊條件可能改變日本對中共的觀點。

然而上述的假定，一旦發現在南中國海等大陸棚含油層內，並不是石油，而是海水時，那麼將立刻成爲「南柯一夢」，萬事皆空，所以說，中共現在正開始面臨一場最鉅額的賭注。（綠洲）

香港問題最新發展

自從一九九七大限問題被提出以後，香港曾經歷過一段人心惶惶的日子，股票和房地產大跌，大批專業人士積極安排移民，這種趨勢如不抑止，對香港的繁榮和安定必有惡劣的影響，中共與英國見及此，不但盡量掩蓋彼此的分歧，而且積極散佈樂觀的論調，這一陣子香港輿論界談到一九九七問題，普遍較以往樂觀，不是沒有道理的。

最近（六月廿三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次官楊格男爵夫人在上議院發表演說時說道：「鑑於英中關係友好，而雙方均希望香港保持繁榮和穩定，我們和中國政府，自然希望談判成功。本人相信，只要具有誠意，一定可以談判出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有關談判所討論問題，謠傳紛紛，本人不欲置評，因我們深知，欲使談判成功，必須保持機密。」這是典型的英國論調，以目前英國的立場，既要安撫香港人心，又不能得罪中共，自然只有打高空一途了。

但是中共這方面便不同了。爲了配合四個現代化，中共自然是以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安定爲上策，中共既然要收回香港主權，未來香港能否維持繁榮和安定，責任在於中共，爲了取信於香港人，中共自然不能像英國政府那樣打高空了。六月六日中共六屆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趙紫陽作政府報告時說：「我們將在適當的時候收回香港主權，並且採取適當措施維持香港繁榮。」趙此說，可以說是中共最高國家機構第一次提及香港問題，頗受各界重視。據香港方面的說法，從上海市長汪道涵在六月六日對香港記者的發言看來，中共已對「適當措施」有實質的解釋；汪某向香港記者團指出：「當香港日後作爲「特別行政區」的詳細

● 華人世界 ●

策略，逐步具體擬定，中國（共）支持香港繼續繁榮的原則是不變的。港人治港後，香港的經濟體系，如何納入國家的整體經濟計劃，目前正在研究中，是會按其特殊性而因時制宜，奠基於中港互利的基礎上。」汪某表示，目前中共要做的是多與香港的工商界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上海市既然獲得貿易自主權，中共會大力促進港滬之間的商貿關係。在這次談話中，汪道涵也透露上海市將計劃興建「世界貿易中心」和「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前者已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取得聯繫，後者也將以香港經濟為重要課題。汪某強調，只要是有利於香港生產競爭的投資和措施，上海當局都樂於參與。上海市政府於去年在香港設立「上海投資發展公司」作為在港拓展貿易的個體，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雖然汪某強調，中國大陸的資源將有助於香港的生產競爭，可以使香港繼續保持作為自由港的有利優勢，但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自由港的地位，對中共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均非中共其他地方所能代替，這也是香港信心的來源之一。

據報導，中共某些經濟學者曾提出恢復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難議，但一般估計在目前情況下，要將上海建立為金融中心，將涉及中共國家體制，實現的可能性太小，換句話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共暫無其它城市可以取代。

以目前中共當權派的經濟掛帥，目前香港問題的經濟意義是太於政治意義的，這從其在港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六月初，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進出口局長戴杰便曾向新聞界表示，進出口局計劃透過香港華潤公司負責統籌擴大中共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不只限於進出口貿

易，有關建議均已獲香港新華社的支持，而且該局還將其第七分處處長李良四女士調職香港。又，中共最近委任長於經濟的許家屯出任新華社社長，也很明顯的和中共在港的經濟發展有關。

也由於經濟掛帥，中共在港拉攏對象以企業界為主。這次港澳人代和政協代表大都是企業界鉅子和商會活躍份子。這次人代和政協會議結束之後，港澳代表回港透露，鄧小平接見港澳代表時曾表示，中共希望明年跟英國達成協議，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他們從北京得到的訊息，使他們對香港前途頗感樂觀，政協代表、香港南聯實業公司董事長安子介在政協會談上提出「港人治港」和「港法治港」，他認為是可行的辦法。但是法界人士表示，這首先要明確「港人」定義，及闡明將會按照何種原則去制定香港法律，換言之，亦包括將授權或任命那些人去執行香港法律，因此，「港法治港」法例還是必須先獲中共同意才可行。

儘管中共信誓旦旦，表示「一定充分考慮香港同胞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見，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從香港實際出發，是成得很寬的」，現實主義的香港人，只要有辦法的，仍然在安排退路，航運界巨子董建華便是一個例子。最近董建華在吉隆坡接受「企業時報」訪問時雖然表示：「中英雙方都對確保香港將來繼續作為一個金融中心表示關心，香港方面並無驚恐」。但是他却同時透露，他的集團正認真考慮在馬來西亞拓展業務；據「企業時報」的觀察，董氏企業在馬來西亞的投資可能包括航業，港口管理，及離岸石油。這就是目前的香港，儘管在政治上「港人治港」、「港法治港」高唱入雲，中（共）、英、港三方面所提出

的投資計劃也很誘人，但是在描繪未來美景時，誰也沒有十全的把握。

但是即使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有些香港人卻認為。因為有台灣的存在，香港未來不至於太糟糕。在今年四月參加香港學者及專業人士訪問團到大陸訪問的電腦業人士何厚煌便預測稱：倘若中共於一九九七仍未能統一台灣，處理香港問題時會較為開放，因為中共要做一台「好戲」給台灣看。

迎接「中國之春」的

王曉波著：「春天與中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在紐約出版了一本雜誌叫「中國之春」。在這之前，一九八一年四月，擬視中國未來的王曉波為迎接中國的春天，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叫「春天與中國」。王曉波以充滿樂觀奮鬥的堅定口吻宣告：「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在陽光下逝去的，冬夜的酷寒也終必為春風驅逐。分裂的中國要統一，被壓迫的人民要民主。中華民族要從重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擁抱即將來臨的春天。」

這本書論述了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苦難，也探出了「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春訊的脈動。「中國之春」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曉波敏銳的觀察和預見。

出版／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政／一〇五六二六號
定價／二〇〇元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記

美國記者亞克森斑所著的

日本上空之煞星

——復活中的軍國主義

將以翔實資料與親身訪問告訴你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如何在日本官僚與財閥的陰謀統籌下有計劃地復活起來，龐大起來。

出版／學術出版社
定價／六十五元
郵政帳號／4876號



潛望鏡

智利皮諾契

政權麻煩大了！

自從智利軍方掌權近十年之後，如今這個國家處於危機的陣痛之下。失業一詞已成爲日常話題。在大聖地牙哥地區，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是無業的，同時幾乎半數擁有工作者處於低度雇用狀態之下。

在低薪資以及高物價的雙重壓力之下，購買力衰退。大多數人們無法清償債務；私人銀行的虧損超過其資產；銀行破產是一九六二年以來的最高峯。此種沈鬱的景象反映出智利當局在經濟方面診斷上犯的過錯，同時又無能力去矯正。

起先政府辯稱此危機係世界性的蕭條所致，智利人民應勒緊他們的腰帶。惡化的狀況迫使政府在去年六月把披索貶值而食言了其早先的固定匯率主張。在今年一月又宣佈清算三家金融機構，且由政府直接控制其它七家。到現在爲止政府已控制了全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信用，同時目前正在把關係到「維持就業」的、百分之六十已破產的工業中的一部份加以接收。

如此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劇痛不可能不形成政治回響。對統治者的擁護基礎已告碎裂。農業及

商業部門皆已因錢幣貶值和高利率而告瓦解。

那些在一九七三年爲推翻阿萊德而喝采，同時從皮諾契的「智利奇蹟」中大嚐甜頭的中產階級，如今十分憎惡失業以及購買力的跌落。進口汽車、蘇格蘭威士忌酒以及彩色電視機會經使他們忘却了對自由的打擊和對人權的摧殘；而今殘酷的現實喚醒了他們！

對於來自各角落和一些有組織的示威中增長的批評，政府正加強鎮壓。因爲皮諾契總統擁有可觀的權力：以維持秩序爲藉口的鎮壓權力、放逐那些擁護「違反國家利益」信條者的權力、限制集會及新聞自由的權力。

政府當局正嘗試以恐怖手段對付共產黨及左派革命運動（*Mapu*）活躍的貧民區。據人權委員會報導，一九八二年受害當事人供述的施虐事件大爲增加。

儘管對個人安全威脅日增，在智利，人們已開始聚會、討論；不但檢討目前，同時還爲將來打算。這在警察國家並非易事，是會遭受許多挫折的。

去年十二月軍政府面臨了自從執政以來最大的兩件抗議示威。在聖地牙哥工人們不顧現場強大的警力集會抗議物價上漲及失業。那次集會使得兩個主要工會的領導人被放逐。兩個星期之後，左派組織在聖地牙哥、瓦帕森遊行要求「麵包、工作、公道及自由」。

在執政團執政之初便已被軍管的大學內也發生無可預料的激盪。學生們抗議高學費以及校園中的秘密警察。在一九八二年有組織的勞工變得更加戰鬥性。工會變得激進化和政治化，其主要目標在於掙脫立法加諸勞工的禁止集體議商和罷工權的桎梏。

「民主主義」的右派和極左派在兩件事上有

着共識：經濟危機的解決關鍵在於重建民主，而且只要皮諾契將軍在朝一天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民主派人士的政治運動雖然日益蓬勃，但也存在許多問題，譬如對共黨應採取何種立場？面對武裝力量的策略如何？當共黨、左派革命運動及社會主義者宣稱「人們有權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所有形式去鬭爭」之時，其他政黨却要求「積極的非暴力行動」。

對於皮諾契將軍來說，他的袖裏乾坤不只一招。雖然他擁有軍方堅強的支持，但是他已免除所有可能帶給他麻煩的官員的職務。十二月的示威過後，他似乎開始轉向「全民國家主義」。在幾個場合中他曾提到有必要着手「基本民主」。但是只要他在位一天，「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

（劉薑齋）

金泳三絕食所引起的回響

韓國反對黨領袖金泳三在五月十八日光州事件三週年時，開始絕食，直到六月九日上午宣佈停止絕食，金泳三進行了二十二天爲抗議韓國全斗煥政權壓制民主的絕食行動。

金泳三開始絕食時，要求全斗煥政權全面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政治活動及言論自由，以及恢復總統的直接選舉。金泳三表示，如果全斗煥不答應這些要求，他們絕食至死。

金泳三並沒有絕食至死，他的絕食行動主要仍是一策略，以求突破他長期被軟禁、言論被封鎖的情況。他開始絕食沒幾天，韓國當局就破門而入，把金泳三架到醫院去強迫打營養針，找金泳三的朋友遊說他停止絕食，但金泳

潛望鏡

三究竟仍堅持了二十二天之久，憔悴虛弱不堪。

對他的停止絕食，有人批評金泳三「放水」，既然當初已誓言韓國當局不改進現況，將絕食至死，而停止絕食後又說「與其餓死，寧可站得鬥死」，不免自相矛盾。在效果上來說，而未予韓國政府有力打擊，使其放鬆壓制政策。與北愛爾蘭梅茲留獄中，視死如歸的共和軍絕食者比較起來，金泳三的絕食是失敗的。

但另一方面，亦有部分韓國反對派人士認為金泳三停止絕食是對的，留著有用之身還可繼續奮鬥。而非自己絕食至死的，沒有資格批評別人絕食不徹底。他們認為，金泳三的絕食已引起世界性的重視，國際重要的新聞媒體無不爭相報導此事，世人已經知道，韓國的政治是多麼糟糕，而絕食者所樹立的道德形象亦足以鼓舞反對派人士的鬥志，和貶損全斗煥政權的合法性，已達到相當程度的效果，全斗煥即使目前態度不得不裝著強硬，但他必已感到可觀的壓力，將來不得不作些政治上的改善，以免再度引起類似抗議事件。

對金泳三來說，他在停止絕食後的說：「絕食抗議是否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不言之過早，我希望聽到的是批評。」這句話充分顯示他的絕食抗議是策略性運動，也就是說他對此一策略的有限性事先有充分了解。既然如此，絕食是否致死就不是那麼重要的了。

涉及這種以個人生命作為賭注的絕食抗議行為，他人實在不易置評，更無法無限期期待其效果。事實上，以全斗煥政權的性格而言，他絕對不會懼怕金泳三絕食，他大可將金泳三強迫帶到醫院打營養針，使他絕食的效果減至最低。全斗煥是不怕殺人的，所以絕食抗議目的

是在以抗議喚起更大的抗議，以道德的呼喚更多道德的行動，絕食本身是非暴力的。但其影響力却不小於暴力，從金泳三絕食期間，韓國大學生示威罷課的行動即可看出。當然，如果金泳三絕食至死，那麼所引起的反應就一定更強烈。全斗煥不會讓他輕易死去，所以金泳三見好就收，停止絕食，也是聰明的。

美國主教的反核震撼

羅馬天主教的主教們攻擊美國的核武政策剛只是一個起頭。

美國全國的二百八十八位主教們，在芝加哥集會，已同意發表激烈的抗議聲明，呼籲立即結束武器競賽——以二百三十九票對八票的多數通過——剩下來的工作就是設法讓五千一百萬的天主教徒贊同。而初步顯示這個運動是相當艱辛的。

五月初發表的一百五十頁的聲明是印發給一萬八千九百零三個教區以及九千五百四十九所學校（隸屬全美一百七十四處主教轄區），以便牧師、修女以及社會領袖們用來做為指導工具，促使此全國最大的教會變成對抗核武的決定性力量。

在去年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裏顯示，全美百分之五十三的天主教徒反對片面凍結核武製造，而百分之四七同意——幾乎和一般公眾以百分之五十五對四十五的比例反對單邊凍結正相符合。

主教們在文件中，不理會白宮的遊說，又在芝加哥做最後的修正，強調以下幾點：

「呼籲」立即從事雙邊協定以停止新核武器系統的試驗、製造和部署」。而採用了「停止」(halt)的字眼，不用「抑制」(curb)一辭。主教們贊同核武凍結，和雷根所堅稱除非蘇俄軍頭率先裁減否則不接受凍結相抵觸。

「拒絕政府當局的觀點：美國必須維持決定權，以便萬一要阻止蘇俄坦克踐踏歐洲之時，可以首先使用小型核武。」

「宣稱對於任何「傳統性或核子攻擊所做的核子報復」均為「不合法的防衛，也是「道德上的不公正」。對蘇俄城市的報復性核子轟炸也應加以限制。」

「宣稱只在做為朝向談判解除武器的一個暫時步驟之下，才有理由保有核武以防攻擊。」

白宮官員設法把此項投票盡可能淡化，把此文件稱做只是一項道德理念方面的聲明，和現實世界發生不了關係。但是政府次級官員則擔心此項聲明會激起國會及街上的凍結核武運動。

有些政府官員同時擔心此項文件會對雷根的外交政策有不利影響，包括計劃在歐洲部署新的潘興二號及巡弋飛彈，而且也將升高對雷根的壓力，使其和蘇俄在武器控制的會談上立場軟化。

某些主教對核武的處理表示了比這文件更強烈的個人觀點。前任主教會議的領袖——舊金山總主教昆(J. R. Quinn)認為，一位服役的天主教徒應該拒絕任何啓爆核彈的命令，因為即使總統也不能「有理由強迫某人去做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事。」

芝加哥的樞機主教伯納定(J. Bernardin)

(Jin)——起草委員會的主席——指出任何「直接攻擊人口中心的企圖，在天主教道德意識之下將被視同謀殺。即使是為了報復對我們城市的攻擊，也不認為那是合理的以及是例外的。」

是否美國政策違反這些原則呢？對此一疑問，伯納定強調主教們大多數見解並非經常憑天主教徒的良知。他指出，在某些事情上，「我們審慎下判斷，但我們了解，面對真實數據，有些人不是會以不同的看法下不同的結論。」

由於看法上的分歧，各主教在轄區內推展此一文件的熱烈程度也有所不同。天主教主教國家會議的主席聖保羅——明尼亞波利的樞機主教羅契(J.R. Roach)指出，在國內許多地方，「世俗人對此事加以攻擊」。

有些保守的主教表示在其轄區內將不會推展此一文件。新奧爾良的樞機主教漢南(H.M. Hannan)誓言要「向羅馬陳情」，抱怨此一文件的支持者限制辯論，而「使之急速通過」。

許多俗間的領袖也表示主教們的觀點不能在不加以討論之下接受。麻塞諸塞州伏契斯特地方的聖十字架學院的教會史教授歐伯倫指出，「如果主教們想要立法規定天主教徒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他們將會發現那是行不通。」

由於意見上的分歧，不管是天主教主教，或其他任何人要在核武方面的宗教攤牌行動中獲勝之前，還有冗長的辯論橫互在前哩。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劉蕪齋)

布里滋涅夫 模式的再版

在六月十六日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上，我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獲得與會代表一致鼓掌通過，出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從而登上蘇聯國家元首的寶座。安氏取得斯職之後，連同先前已有的俄共總書記(共黨首腦)，以及國防委員會主席(三軍總帥)兩項職務，使其成為布里滋涅夫後的最高領袖，集蘇聯黨、政、軍大權於身，而這種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領導模式，也正是「布里滋涅夫模式」的再度拷貝。

安德洛波夫當選為蘇聯國家元首，大都在觀察家的預料之中，並未出現什麼黑馬與其相爭。但是，令人玩味再三的是，提名安氏出任國家元首的人，居然是他的頑號政敵契爾年柯，而且這種現象也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的。據了解，去年十一月十日布里滋涅夫死後，同月二十二日的俄共中央委員會中，安德洛波夫也是由契爾年柯提名，再經由與會委員選為總書記。在布氏死之以前，安、契兩人被認為是角逐接班人的死對頭，彼此競爭之激烈，幾達水火不容之勢。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很難想像候選人會由對手予以提名，尤其像蘇聯此一奪權鬥爭非常激烈的國家。

因為，由過去的經驗可知，於蘇聯歷次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中，任何競爭者一旦鬥爭失敗，不是「上表請辭」、「告老引退」，就是「下落不明」、「身死名裂」，鮮有能為政敵作嫁者。像早期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

夫先後與史大林爭奪第一把交椅，結果托氏身死異域，而加、季兩人則落得槍斃以終。近如包戈尼、柯西金與布里滋涅夫彼此明爭暗鬥，最後包氏「因故去位」，柯氏「因病請辭」，而由布某「欣然接受」，獨攬內外一切大權，創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布里滋涅夫領導模式」。所以，與安德洛波夫互爭雄長的契爾年柯，不但沒有遭到前述諸人的命運，反而成為安氏的提名人就值得觀察家推敲了。

就目前的跡像看來，契爾年柯似乎已與安德洛波夫妥協，契氏承認安某的領袖地位，而安氏則讓契爾主管黨內思想事務，一如當年的布里滋涅夫與蘇斯洛夫。但是，這種暫時妥協的局面，是否能維持長久，頗令人懷疑，除非契氏從此甘於雌服任安某差遣，而安氏也能容許他人鼾睡於其臥榻之側。另外，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雖未更動，但權勢顯然業已大減，許多事物皆由艾力耶夫與葛羅米柯兩位第一副主席掌理，吉氏僅受優崇尊重而已。至於尤斯蒂諾夫與艾、葛兩人一樣，都是安德洛波夫的有力支持者，而他們三人也被賦予相當的權限，分別負責國防(尤氏)、外交(葛氏)及安全(艾氏)，短期內恐不會再有改變。

經過這次最高蘇維埃大會之後，不論在法律上或實質上安德洛波夫已是全蘇聯的最高領袖，既是共黨首腦也是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因此，可以想見的是，安氏會在蘇聯國內乃至世界舞台，將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而他也會比往昔更為活躍，左右蘇聯及世界的政局。

他山之石——

也談接班人

塞內加爾總統桑果——政權過渡的典範

■ 南方朔



編按：最近，繼承人問題成為各方談論的話題，我們認為，繼承人問題如果不放在國家民主化的框架上，是沒有意義的。基於此，我們願意推薦這篇文章。塞內加爾桑果總統的選定繼承人和國家民主化同時進行的成功例子，顯然太值得我們思考。——編者案

桑果當法國學院院士

六月上旬，法國學術院全體院士投票，決定將塞內加爾前總統桑果（Leopold S. Senghor）聘為院士，這是對高年七十七歲的桑果一生道德文章的最佳肯定。

法國學術院是一六三五年由法皇路易十三世所創，迄今已三百餘年歷史，全體院士四十人，均為法國知識文化界的一代俊彥。許多在當時有爭議的人物，由於功過難定，均無法進入學術院。舉例而言，文學大師諸如福樓拜、普魯斯特、莫泊桑、波德萊爾、紀德、沙特等均未進入法國學術院。由此可知法國學術院院士資格的嚴謹。桑果當選院士，可能是第一位黑人院士，尤見意義不凡。

桑果是著名的非洲詩人、政治家、神學家、哲學家；在第三世界像他這種能博古通今的人物確屬鳳毛麟角。而更重要的是，桑果是少有的能理論與實踐並重的領袖。在理論上，他是黑人民族主義者，為非洲黑人文藝復興運動的第一代宗師；而在政治思想上，他是民主的社會主義者，主張民主和倫理以及人本主義；至於具體的政治實踐上，他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將塞內加爾這個報爾小國由一黨制過渡到多黨制，並選定國家的繼承人。他這種一方面選定國家繼承人，而同時又能本於民主理念，將繼承人問題落實到國家基本民主制度上的作法，坦白的說，不但在第三世界少見，就是在整個人類民主發展史上也前例不多，他的民主胸懷和道德風範，的確值得許多領袖們思考。

「黑人自覺運動」

重建非洲文化價值

塞內加爾為法屬西非的重鎮，人口五百餘萬，包含了三個部族：沃洛夫（Wolof）佔百分之卅七，富拉尼（Fulani）佔百分之廿四，賽瑞爾（Serer）則佔百分之十六。桑果一九〇六年十月九日誕生於塞內加爾的喬爾（Joal），他的遠祖乃是賽瑞爾族的貴族，他們家信奉天主教，而塞內加爾人絕大多數都是回教徒。桑果的父親經營貿易成功，家資極富，「有十五匹馬、四十四匹驢、千餘頭牛」。因此桑果全部廿五兄弟自幼即生活優裕，七歲時，他被父親送去白人教會學校唸書，桑果自承：「基督教教旨使我受惠不少，我的脾氣剛強急躁，經過多年的教育薰陶，我開始懂得如何自制。」在該所學校唸完書之後，他接著又到西非大港達卡繼續唸書，一直到一九二八年。這一年起，他又負笈法國。

到了法國，他最先在巴黎著名的路易中學就讀，許多法國日後的重要人物如已故總統龐畢度等都是他的同學及好友。中學畢業，他接著進入巴黎大學，他是第一個獲得優等畢業證書的非洲學生，並獲得任教的資格證書（agrégation），時在一九三五年。接著，從一九三六年以迄二次大戰，他均留在法國擔任教職。

桑果在求學以迄教書的這段時間，他結識了來自法屬西印度群島的文學青年色賽（Aime Cesaire），初時他們追隨當時由安德列布里東領導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從這個文學運動中，他們自覺到拾人牙慧的無意義，於是開始鼓吹黑人回顧自身，回歸鄉土的「黑人自覺運動」（Negritude）。他們認為：「在認真處理非

洲政治問題之前，首先有必要恢復非洲文化價值的信念，非洲文化必須重新加以估價和發揚。」他們為了推動非洲的文化復興，亦辦了一份「當代非洲」刊物。後來「黑人自覺運動」這種文學運動轉化為黑人的文藝復興運動，桑果一直執掌大旗。雖然後來有許多黑人激進派對他的理念和作法有許多嚴厲的批評，但他的先驅性歷史角色終歸無法抹殺的事實。而後，在一九四〇年，他因反抗納粹而被捕，在獄中他仍領導難友反抗，除此之外，兩年的獄中歲月，他也同時進修古典文學及寫作。

桑果——非洲民族運動的鬥士

一九四五年起，他開始涉入政治，同年，他的第一本詩選「黑暗之歌」（*Chants d'ombres*）也出版。在稍後的歲月裡，他計出版過各類詩集和神學、政治學著作「黑的獻禮」（*Hogfies noires*）、「黑人詩選」、「夜曲」（*Nocturnes*）、「非洲社會主義國家論」、「德日進和黑人政治」、「自由：黑人意識及人文主義」，……等，著作等身這句話可以用在桑果身上。然而，桑果的才華固不僅文學一端而已，他在政治上的表現實在更足矚目。

從本世紀起，非洲大陸才產生受過西方教育的新世代領袖，第一代領袖計有黃金海岸的海福德（Casely Hayford）、塞內加爾的戴亞格德（Blaise Diagne）、拉哥斯的麥考萊（Herbert Macaulay）等，不過這些領袖在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並不能發生太大的作用。一直到等到第二代領袖出現，黑人的民族獨立才告蓬勃

，這些第二代領袖包括了桑果、象牙海岸的伍弗布尼（Houphouët-Boigny）、幾內亞的杜爾（Sekou Toure）、迦納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等，他們都是戰後在非洲叱吒風雲的人物。在這些人物，尤其是在法屬西非的諸領袖中，桑果的地位舉足輕重。戰後非洲的民族運動，前英屬殖民地以恩克魯瑪為首，而前法屬殖民地則由伍弗布尼及桑果各居一支，桑果代表的乃是溫和的社會主義支派。

戰後，法屬非洲的參政機會增加，桑果開始返回塞內加爾從事政治活動，他最先和桂耶（Lamine Gueye）組成了親法國社會黨的「非洲集團黨」（Bloc Africain），同一年（一九四六年）他被塞內加爾人選為出席法國議會的代表，接著他又和伍弗布尼等五人被選為法國第四共和制憲會議的制憲代表。翌年，伍弗布尼聯合法共成立「非洲民主聯社」（RDA），和幾內亞和上伏塔等相互唱和，聲勢浩大，但桑果對共黨的都市階級鬥爭不感興趣。於是一九四八年他自創「塞內加爾民主集團」（RDS），桑果認為英國殖民地的鬥爭不適用於法屬殖民地，因此他主張合法爭取法國改善殖民地待遇，並給予海外領土更大自治權。為此，他於一九四八年並聯合許多法國非洲籍的國會議員組成「海外獨立黨」（IOU）。

泛非主義與 分離主義的抗衡

桑果和伍弗布尼兩條路線的差異，可以簡單的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伍弗布尼是職業工運領袖出身，故和共黨有親和性，而桑果則否。加以塞內加爾為典型農



藝術活動是非洲民族運動最重要的一環。

業國，對都市之鬥爭也不感迫切。

(二) 桑果不主張各法屬殖民地很快的獨立，因為各殖民地均小而窮，獨立對各殖民地並無實質意義，因為這只不過會造成西非的巴爾幹化（指分成很多小國）。因此他認為各法國殖民地的國會議員應培養泛非感情，他並主張將法屬西非只分成兩個國家：一個以象牙海岸的阿必尚為核心，一個以塞內加爾的達卡為核心。但伍弗布尼卻反對，因為象牙海岸為西非最富裕的國家，如果和其他殖民地合併，將會使象牙海岸貼補別的地區，增加象牙海岸的負擔。

根據歷史的檢證，我們可以發現，在桑果和

伍弗布尼的意見衝突中，桑果的意見是比較合乎非洲人民利益的。不過可惜的是，自一九五三年起，法國制定「綱領法」(Not Cadre)，伍弗布尼的意見由於符合了法國的利益，致為法國所採納，幾內亞的杜爾到了後來也支持桑果的見解，不過均未被法國採納。

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綱領法」，法國對西非殖民地繼續保持外交、國防和經濟發展之權，而其他事務則歸自治政府，但自治政府的體制不是以往的「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兩個殖民政府，而是又細分為十二個各別的殖民政府。法國將西非予以「巴爾幹化」，至此定下大局。西非

洲至今仍然小國林立，支離破碎，不由使人更欽佩桑果的遠見。

一九五八年戴高樂掌權，為了變相加強對法屬西非的控制，公佈讓殖民地選擇：或者以自主共和國的身份留在「法蘭西社會」，或者就是立即而完全的獨立。對於法國政府的陽謀，幾內亞的杜爾獨倡反對，於是戴高樂一夕之間盡撤法國的一切人員、技術及財政援助，幾內亞被迫倒向蘇俄及「非洲的列寧」恩克魯瑪的懷抱。對於戴高樂的陽謀，桑果於一九五九年曾和蘇丹等合組「馬利聯邦」，以防止西非的支離破碎，不過此舉並未成功。馬利聯邦的成員均接受法國的主張，桑果獨木難支，塞內加爾於一九六〇年獨立，並繼續留在「法蘭西社會」中。桑果的泛非主義受挫。

民主化是

桑果的政治理想

塞內加爾獨立後，桑果即一直擔任總統。在這段期間，信仰天主教倫理、溫和社會主義者的桑果總統，在激進勢力極大的非洲，遭遇到無數次的挑戰，加以桑果出身的賽瑞爾族乃是小族，他代表的天主教又是少數派，這使得他的地位更為艱難。在他任內，有過數次政變幾乎發生，一九六七年他逃過一次暗殺，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由於提高物價，他又面臨過無數次的暴動。不過，儘管如此，桑果卻以各種方式一一應付。最嚴重的是一九六二年，他的副手里亞(Mamadou Dia)和他政治衝突，里亞代表了「激進」及「回教」勢力，桑果被迫將里亞逮捕下獄，結束可能的政變。

桑果總統自一九六〇年塞內加爾獨立後即一

直擔任總統，以溫和的社會主義治國，相當的尊重中產的技術專家，因此在非洲，塞內加爾的經濟建設相當的可圈可點。

而更值得稱頌的乃是桑果總統的政治胸懷。象牙海岸國立大學的席拉 (Lancin'e Sylla) 認為：「在塞內加爾，桑果總統私人開始發動一連串的民主化過程，有秩序的轉移政治權力，這是非洲大陸絕無前例的事。」

「超人」型領袖並沒有 超級治國能力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韋伯 (Max Weber) 的「合法性」概念談起。根據韋伯的理論，統治者的威權來源有三種：(一)「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二)「法律—理性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三)「超人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所謂「超人」(Charisma) 乃是指一種綜合了道德、人格、煽動能力……等各種品質而能使人服從的領袖。這種領袖在非洲新興國家乃是極普遍而自然的事。

非洲從殖民地時代起，為了衝破殖民政府的規範，有民族感情附託或群眾魅力的超人領袖遂告出現。在各國獨立初期，由於舊典範的崩解，新典範的尚未建立，超人型的領袖更容易為一般大眾接受。因此，非洲各國獨立後，所有的元首都是超人型的領袖。

然而超人型的領袖，其本質益常脆弱，又均註定必然及身而沒；同時，超人型的領袖乃是一種「綜合的符號」，超人型的領袖並不表示具有超級的治國能力。因此，自非洲各國獨立以來，各國的「超人型」領袖均相繼的要碰到兩個難題



非洲國家人民經常因為飢荒和政局的動盪，而流離失所。

· 一是「國家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這包括國家組織的建立和國家機器的有效運作等。第二則是政權的繼承問題。有許多非洲的超人型領袖第一個難題都克服不了，這表示他們並無起碼的治國能力，因而很早即被政變所推翻。

至於政權的繼承問題，包括非洲在內的所有非西方式民主的國家，其繼承問題可以分為下述三類：

(一)「超人型領袖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指前一個超人型領袖死後，由另一個超人型領袖繼承，後任者或者是前任者指定，或者是自己搏鬥而出頭，它的產生均無民主化的程序，頂多只有擬似的民主化——如由一黨獨大的黨推舉而出，而後經各種「橡皮圖章」蓋章而已。

(二)由武力自「超人權威」體制改變為「法律—理性權威」的體制：這種改變的關鍵繫於政變

的軍人是否對國家的「建制化秩序」(Institutional order) 有企圖。

(三)由超人型領袖在他自己手中完成國家的民主化，在所有的政權過渡方式裡，這種方式最為可貴。

由「超人」型的統治 到民主體制

根據截至目前的非洲現代政治史，相繼的超人型領袖最為普遍，或者靠政變、或者靠指定繼承人、或者經由權力鬥爭；新的超人型領袖乃接續舊的超人型領袖。諸如赤道幾內亞、中非共和國、烏干達、多哥共和國、安哥拉、剛果，……等均屬於這一類型，這種類型的繼承方式，和國家的民主化並無任何關係，如果繼承得順利，人民尚不致受到影響；如果繼承不順利，則難免有兵燹之災。上述的這些國家均不民主，政治事務

永遠限於少數人物參與，它政權的合法性均繫於超人型的領袖和武力，政權繼承問題也反覆著超人型領袖的模式而重演著。這樣的國家是沒有政治發展的。

軍事政變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不過是「超人型領袖例行化」的一部份，政變者推翻前任的超人型領袖，然後再將自己塑造成新的超人型領袖，在非洲的多哥、尼日、貝林等國均例證斑斑。不過，軍事政變領袖在政變之後決心將政權的合法性由「超人權威」改變為「法律——理性權威」的亦非沒有，軍人政變後樹立新憲法，允許政黨自由化，開放國會及總統選舉，開始建立多元的民主體系。不過，非洲屬於「超人型領袖饑渴」的社會，此種型式自由化和民主化均需長期的考驗才能建立民主的新規範。這種例證由非洲的賴及利亞和迦納均可看到。它們均已分別在軍人手中建立起多黨制的民主議會體制，這是非尋常不容易的事。

至於超人型的領袖在他自己手中就建立起民主的體制，這在非洲可以由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和喀麥隆看出，而最值得稱道的乃是塞內加爾的桑果總統。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 解決繼承人問題

自一九六〇年塞內加爾獨立開始，桑果即一直擔任總統而成爲塞內加爾的「超人型領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桑果的合法性泉源和許多其他煽動型的超人型領袖不同，他主要是以道德形象及溫和有效的治國能力爲合法性來源。其次，由於他注重溫和的改革，自然的他也比較能尊重新興的小資產階級意願及建設面的貢獻，因此在

他任總統時，本來相當貧瘠的塞內加爾乃能一步的向前走，在黑色非洲大陸，塞內加爾可以說比較被看好的一個國家。

然而桑果總統畢竟是個對民主制度有深刻認識的人，因此，在他手上便逐步完成了許多劃時代的工作。

在當政初期，桑果實施一黨制，由他的「塞內加爾進步聯盟」(DPS) 掌握政權，接著他於一九七〇年修憲，增加總理輔弼總統，他任命的乃是一個留學法國的年青技術專家戴奧夫 (Abdou Diouf)，當時他才卅五歲，回教人士。靠著這項任命桑果拉攏了塞內加爾的回教多數派，桑果的合法性更爲強化。到了一九七六年，他再度修改憲法，開放黨禁，使國家正式多元化，於是塞內加爾成了一個有三大黨的國家，不過桑果本人的「塞內加爾社會黨」(PS) 由本來的 (DPS 改名而成) 仍屬最大黨，這是個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另外較大的一個是更左的「塞內加爾人民獨立黨」(PAI)，另一個則是更右的「塞內加爾民主黨」(PDS)。

開放黨禁的同時，桑果在憲法中也規定：如總統去職，由總理代行總統職務至任期屆滿。等於說，桑果總統在這次憲法修訂中，一舉解決了繼承人問題和國家的民主化問題，這種高招後面所蘊藏的政治智慧實在古今罕見。

接著，一九七八年總統及國會大選，在修憲的敬佩餘波之下，桑果再度連任，他的社會黨在國會中獲百分之八十二席次，其餘席次則由右派的民主黨獲得。

桑果以身作則

宣告退休

在政治生涯的高峯時期，同時也是給繼承人真正磨鍊的機會，一九八〇年，在塞內加爾獨立廿週年紀念時，桑果總統向國民宣告退休，由他看中的接班人——總理戴奧夫接任。戴奧夫在桑果遺下的兩年任期果然不負重望，表現相當傑出。任期屆滿，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七日再度大選，戴奧夫正式成爲總統，社會黨在國會獲百分之八十之席次。桑果總統選任接班人和國家民主化的雙重任務，至此初步成功。

由桑果總統選定接班人和國家民主化同時進行的成功例證，顯示出一個在現實政治上的鐵律：選定接班人如果只是由以前的超人型領袖選定另一個超人型領袖，那麼這種接班人的安排並不是有政治發展上的意義；也就是說，接班人的問題一定要放在國家民主化的框架上才有意義；而對於一個開發中的國家，國家民主化如果沒有適當的接班人安排作爲導向，則又易使人產生疑慮，甚或造成新強人的趁機而起，兩者結合以作爲理想的過渡期，應該是值得仿效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桑果總統簡直可以說是繼華盛頓、凱末爾等人之後，世界上少見的傑出民主實行家。

歷史與思潮

也談後藤新平的

治台方案

廖祖堯

編按：

對本刊上期刊出的「請勿認賊作父」及「黨外的台灣史為誰服務？」二文，廖祖堯先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廖先生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有極為透徹的認識，但他認為肯定後藤新平的治績不是認賊作父，關於這個問題，請讀者參閱王詩琅先生的「日本治台政策試探」。廖先生的第二個不同意見是認為日本據台時期沒有實行軍法審判，確較現今的戒嚴法合理，但我們要指出日據時期雖無軍事統治之名，其嚴酷的警察統治卻屬於軍事統治性質，關於這點請閱本期許雪村先生的剖析。我們感謝廖先生的指教，也歡迎大家共同嚴肅負責的討論台灣史，使台灣人民認識台灣史的真實面貌。

歷史是不能篡改的、日人後藤新平的治績對台灣的確有驚人的開發成果，不是認賊作父的褒獎，不過日本治台最大的目的是獲取台灣豐富的物產、意欲將台灣開發成爲本國經濟的支持力量，以做爲南進的本錢。基於這種前提

，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投下巨資，做有計劃的並且是全面性的開發，與荷蘭人、西班牙人的掠奪式殖民完全不同。在短短的時間內建立了至今仍爲台灣首要工業的砂糖煉糖業、新法製鹽、耕地激增一倍、農業加工業、鑛山林業開發等、其發展之迅速和效率令人嘖嘖稱奇。以往台灣的支配者、對台灣豐富的資源和肥沃的土地不知善加開發，只一味掠奪現成的物資。

日本據台若于時日後，方進入富強國家之林。然而台灣的現代化，產業的開發並沒有使台灣人受到利益，更而身陷黑暗的境地。

日本治台之目標在開發所有資源，作爲帝國富強的基礎，以便進一步侵略中國大陸和南洋、乃是日本帝國海外經濟漸次發展的基地。因此悉以本國利益爲唯一的考慮，完全無視估絕對多數的本土住民。

在兒玉總督時代，由後藤新平採取激烈的社會改革，使台灣人原有的社會結構迅速崩潰，原有的家族制度及舊產業盡失、成爲澈澈底底的無產階級。

「後藤新平的政策悉以本國的需要做爲調整

的準據、不僅無視於台灣人的需要、更刻意剝削台灣人的經濟利益、刮盡台灣農民的血汗。在「台灣爲南進跳板」的國策下，總督府控制一切產業、供日本人使用、從香蕉開始、蔗糖、樟腦、林木、煤炭業、電力、交通等都成爲日本人的獨佔事業、台灣人完全沒有插手的餘地。雖然從事生產都是台灣人，但是生產的成果却悉歸日本，可見台灣人在當時是只有付出而沒有相對的代價，多半成爲清潔溜溜的無產階級，做爲台灣現代化的最大動力、而成果却移到日本本國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展的本錢。後藤新平這種過激的犧牲台灣人來支持日人資本的偏差政策、因人設事，因人修法，置台灣人利益不聞不問的壟斷政治、不久便付出流血的代價、使得已經寧靜的台灣社會、在邁向現代化的路途中爆發了台灣人難以壓抑的再度流血抗日。

有關「匪徒刑罰令」是後藤新平，用來對付全島如火如荼的抗日行動。但是爲了避免誤殺及濫殺無辜、怕失去民心，因此制定「匪徒刑罰令」。後藤的政策、對付暴力者、處罰要嚴厲，但是要有法律依據（現在日本如斯）。後來在大正十四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二五年頒佈「治安維持法」，次年又頒「暴行行爲懲治法」之後，總督府就很少再適用苛酷致人死地的「匪徒刑罰令」。遠在明治二九（一八九六）年，也就是日本據台的第二年，桂總督就公佈「臨時法院條例」、如有暴動發生、地方法院應移至事件發生地審判，規定平民不受軍法管轄，不受當地行政及軍事單位審判，因爲日據時代沒有長達五十年之久的實施戒嚴法。史實就是實實際際的記載，這並不是認賊作父或沒有愛國心。

黨外對

台灣史

認識的貧困

■許雪村

近年來，黨外在民主運動中不斷地戳破國民黨統治的神話，使一般民間視聽漸有耳目一新的局面。其中，向來被割斷、扭曲的台灣近百年歷史，也在黨外各種不同立場的努力下，加以重新的陳述。這是可喜的現象，但也有些隱憂。

黨外在批判國民黨惡政時，動輒好說：「日本時代」也不會這樣糟。其中有些立論還不離譜，有些就難免荒唐走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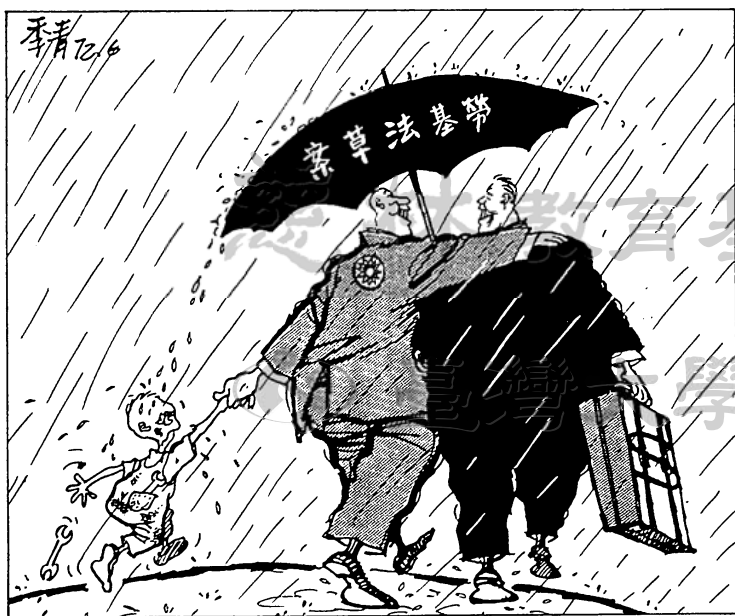
例如，在國民黨所主辦的選舉江河日下的今天，有些人便列舉「日本時代」選舉如何如何，甚至說出一九三六年台灣人就有地方自治的選舉，彷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台灣在文官總督統治時代所設置的總督府評議會（一九二一），其中雖有台灣人評議員，但全由總督所任命（也就是「遴選」），且多為御用者。地方級政治則雖在一九三五年有市制、街庄制的改正，翌年全島實

行有限制（包括納稅五月以上）選舉。但是所產生的市會議員、街庄協議員，除了半數為官派外，街庄協議會仍然只稱得上是諮詢機關，各級的議會不能罷免行政機關首長和行不信任決議。這種地方自治只不過是徒具虛表罷了。

再者，有些人又舉日據時期司法與軍法分開一事，來諷刺國民黨軍法審判的濫用。其實，日據時期的「匪徒刑罰令」之苛酷，早已為時人所詬病，台灣人成爲此令犧牲者不下萬餘人！話又說回來，日本統治台灣是以警察而非軍隊爲主，警察對台灣人幾乎無所不管，又行使檢察官的職務對台人「司法」審判。警察權力之大，幾乎是各街庄的小王皇帝！而且，在

台灣警察力配置之稠密，幾乎是每五百多位台灣居民便設一名警察；每一平方公里便有三、一位警察；高於同殖民地國的朝鮮有兩倍之多！（台灣總督府『台灣現勢要覽』大正十三年版，頁四十五）。

個人不反對歷史以「古」諷今的功用。不過未加批判和輕率的援引，甚而造成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印象，不但有違黨外一向標榜反壓迫，爭民主的立場，更加暴露黨外對台灣史認識的貧困。這點，是某些黨外應該戒懼謹慎的。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台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Collection held by Professor Tsu-Ping Lai

65 Digitiz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年七月

日人治台政策試探

■ 王詩琅

「近來黨外雜誌上登載的台灣史文章出現許多奇談怪論，怪論之一就是：日本的殖民統治使台灣「現代化」。他們所謂的「現代化」其實是指殖民地式的「資本主義化」，再無其他內涵，而這種資本主義化是奠基在種族歧視、剝削上的，也就是由台灣人民的血淚積累成的，其目的則在供養母國日本，做為日本向外侵略擴張的資本。身為被殖民、被壓迫的台灣人後裔我們最該做的是：嚴厲指控日本帝國主義者榨取台灣資源，奴役台灣人民的罪惡，徹底揭露隱藏在這些「建設」下的醜陋動機，所謂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那是日本人洋洋自得之餘說出的無耻之言，絕不是台灣人該說的話。台灣者宿王詩琅先生親身經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反抗日帝卓有英名，深悉日本殖民統治的實質，對所謂「日本的統治帶來了——台灣的近代化」有極深刻的剖析，本刊特予節錄刊出，有興趣閱讀全文的讀者，請看黃富三等編「台灣史論叢」第一輯，衆文圖書公司出版。」——編按

「在日本，幾十年來，雖然有部份的知識份子和學人，懷抱所謂「贖罪意識」，對他們「治台」所造成的罪惡，表示歉意，可是這種想法的人祇是少數，大多數的日本人，毋寧說是相反地，被戰前統治階級的宣傳所蒙蔽愚惑，以為他們的「治台」是有很大的成就，過去台人是悅服其「統治」的，他們甚至誇耀說：「日本的統治，帶來了台灣的近代化」、「繁榮」、「台灣的統治顯然成功」，然而，他們所謂成功，語氣模糊，所指的「近代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些都是需要檢討的問題。

固然，我們知道，在他們的「統治」時期，台灣大事開發了，產業也興隆了社會也進步了，人民生活很安定了，而且老百姓普遍受過教育了，可是關鍵是在這些「開發」「興隆」「進步」「安定」「普遍」的內容如何？我們敢斷言，這些不外都是他們爲了「統治」，爲了「剝削」同胞所造成的附帶物，他們立意並非爲台人而作的。

現在日人退出台灣後，還昧於台灣過去被其統治時代的情形，我們還可以再引用小林文雄著「アジアをみる見眼」(一九七六年三月版)的一段，來看看戰後日人對戰前台灣的認識程度。

「……包括台灣民衆的合法、非合法，歷

時長期的抗日運動——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揭發和抵抗的實態，在當時或是到了今日，很多的日本人還是不知道的。不但如此，正如「朝鮮是日本支配的惡例；台灣是好例子，成功的例子」，權力者的造語所顯示，以為日本是開發了未開地台灣，把它近代起來，全體的台灣民衆都已接受、「歡迎」他們。形成這種論理就是現在的情形。因此，雖然是屬於經常被人引用的話，戰後在所舉行的日韓會談，當時的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曾經這樣說過：「經營台灣，合併朝鮮，於滿州寄託以五族協和的美夢，倘若把它稱爲日本帝國主義，那麼，那是光榮的帝國主義了。」他們從這種論理出發，所以才會把一九三〇年一月發生的霧社事件，看做是日本支配下的例外中的例外案子，霧社事件是台灣土著野蠻人——番族之忘恩的舉動，也是由於未開化才有的妄動。這也是迄最近大部份日本人所懷抱的意識。」

這雖然是反映在他們眼裡的台灣和台灣抗日運動，但也可以說是多麼可怕的被歪曲的看法。

曾於一九四二年三月由每日新聞調任台灣新報主筆、社長，到了日本投降後的一九四六

年二月才率領被遣返的日籍報人，海軍關係人員離台返日的伊藤金次郎在其「台灣欺かざる日記」中曾經痛罵日人的這種無知，說他們是「自以為已經捉住支配下異族的人心之無知小孩子。」

然而，這會是台灣統治者的代言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眼見安藤利吉簽署降書後，台灣民衆雀躍狂歡，還埋怨說：

「眼見狂歡的民衆，這苟是短時日的領土，當作別論，可是五十年來在『日本帝國臣民』的名目下，共同生活過來，携手相親，緣故至深的台灣民衆，到了日本敗北，情形大有一反其掌，不顧日本及日本人的憂愁，陶醉於歡喜感激的高峯。」

這當然是他們對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獲得解放，重返祖國懷抱的心情，認識不足而來的。台人跟日人「共同生活」原是無可奈何的被迫者，所以根本就沒有「携手相親」可言，縱有也是虛與委蛇的強作歡顏的，過去台人只是從屬他們的被統治者，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對強力壓迫的統治悅服的被統治者。」

「我們要重贅一句，日人的台灣經營，建設台灣，正如後藤新平所說的：「要台灣能夠伸展爲日本的一部份」，並在這一種發展中作爲「國際上的連關中動盪的一環。」當然，這「一部份」或是「一環」，就是從屬日本的典型殖民地，以養肥日本本國及日本人，這就是日人在台施策的主要目標大力經營的目的。

因此，日人歷時半世紀的台灣統治，祇是或明或暗或強或弱的「壓制之五十年」、「奴化之五十年」，台灣人的基本地位始終未變。至於統治者的「優越感」「差別感」，祇可以說是這種本質所產生的現象。統治者的地位崇

高優越，而被統治者沒有民族自主權，地位卑賤，在雙方對立之下，必然的要發生磨擦抗爭，帝國主義統治下之殖民地內在矛盾苟若存在一天，敵對是絕難消滅的，也是永遠無法和解的。日據時期，台人的抵抗，或有組織而大規模或零星或突發的，或武力或非武力，始終綿綿不絕，理由即在於此。

誠然，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進步，台灣居民生活的安定，水準提高以及整個台灣的近代化等事實是毋庸諱言的。可是問題是在這些進步、提高、安定及近代化的內容與型態。我們倘若進一步詳加觀察和分析，便可以知道，這一切都是沒有獨立性的，被歪曲的，畸形的殖民地形態的進步、安定、提高以及「近代化」，也是在其殖民地體制下的副產品。因爲日本統治者深知，要母雞生蛋必須好好地餵養牠。

車上請勿吸煙

有一位癮君子突然於癮難忍，但是看到標語寫著「車上請勿吸煙」，所以不敢抽。

突然他有個「發現」，使他十分不服，便問車掌：

「車上不可以抽煙？」

「不可以。」

「那麼車上這麼多菸蒂，是誰丟的。」

「乘客丟的。」

「爲什麼人家可以抽菸我不能抽。」

「因爲他們沒有問我。」

「那你的標語是寫給誰看的？」

「寫給不敢抽菸的人看的。」

癮君子突然哈哈大笑：

「我懂了，明天我要搶銀行去了。」

腐敗的美國

(一册)

Micheal Harrington
Fred J. Cook
合著
卜如維／翻譯

定價：二一五〇元

美國學者透露：
美國墮落、靡爛與犯罪手法之內幕專書
爲什麼美國
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本書正是一把解剖刀，旨在手術與醫治美國的瘡疤，同時亦在使世人認清血淋淋的美國人！！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斷裂的巨龍

——評被扭曲的民族主義

■ 紀斷弦

Collection held by Professor Tsu-Ping Lai
Digitiz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侯德健惹的禍

一個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的青年，要到大陸瞻仰長江、黃河，就如同猶太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樣，是件很自然，而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侯德健這次小小龍兒回家，之所以引起風波，其實是現實政治扭曲了中國人民情感的一種反映。

大體上，官方對侯德健事件仍保持緘默的態度。黨外則對此事件多有評論。目前黨外的評論則發生二種對立的看法。

一是陳映真認為，侯德健回大陸，是一種「自然的民族主義情感」。並且，他指出今天中國人所認同的應該是一個歷史的文化的中國，而不是一個黨派的中國。從這個觀點來看侯德健回大陸，任何有黨派政治立場的偏見都是要不得的。他說：

侯德健背着他的吉他悄然走進了大陸。但這絕無關乎中共的「勝利」，更無關國民黨的「失敗」。他只不過是去看一看長久奔流在他的血液中的，在夢中神遊並且傾聽其澎湃和涵湧，經數千年歷史和文化所形成的父祖之國罷了。任何統戰腔調，任何指責其叛變之指控，都是對於自然的民族主義情感的羞辱。然而，單獨的、個人的神州暢遊，畢竟不若長留在兩岸，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團結做一點一滴的，長時期的，認真、忍耐和嚴肅的努力，來得對苦難的民族有意義吧。

另外，則有林世民和蔡義敏等的觀點，其基本上認為侯德健回大陸是對執政黨的背叛，

而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台灣推行了民族主義的教育。林世民問道：「把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的頭上，你還能期待有什麼好的後果？」林世民還說：

當我們瞭解「那些跑到大陸去的人，大部分曾經是執政黨眼中特別愛國的人」之後，我們應該自問的是：執政黨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教些什麼東西？為什麼教得特別成功的學生，往往就特別喜歡跑到中國大陸去？

在這項指控中應該包括有二點：一是肯定了侯德健回大陸是一項背叛的行為；另一則是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與這項背叛有直接而充分的關係。

自然的民族情感

站在理性的民主運動的立場，我們對執政黨的批評，不應是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應為肯定而肯定。反對也好，肯定也好，必須是依據事實和公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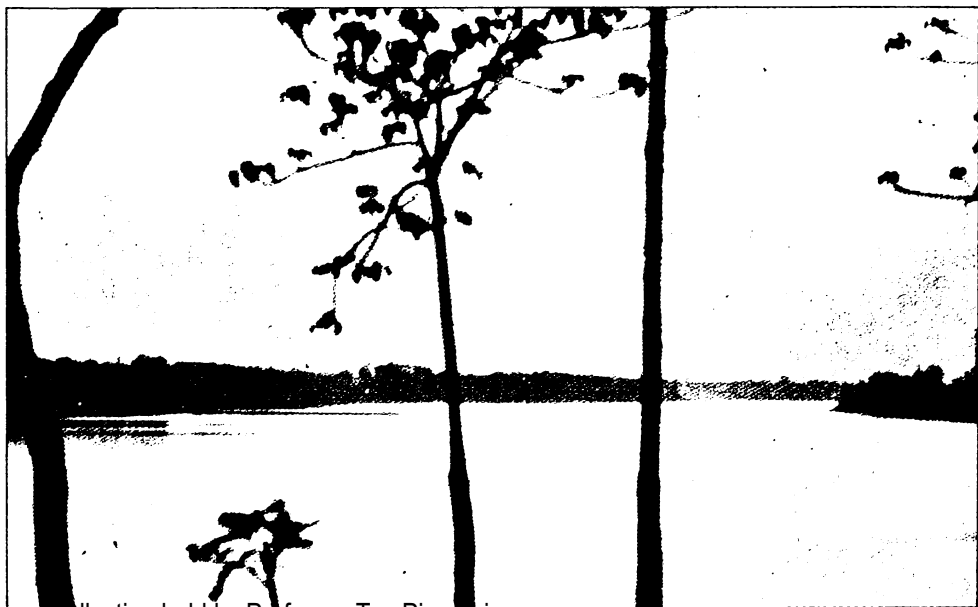
林世民把侯德健回大陸的政治責任推到執政黨的民族精神教育上，這點似乎與事實不相符合。

「父祖之國」的觀念可以說是每一個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中華民族如果沒有這種「父祖之國」的觀念，也是不能在歷史上出現的。中華民族最早起自河洛之間，爾後向四周綿衍。台灣的先祖因民族大遷徙由河洛漸漸入閩，為不忘木本水源，除族譜外，死後墓碑仍標示所來自，如潁川、泗水……。這項民俗沿襲至今而不忘。海外華僑，生不能回唐山，然死亦不忘己出，也把故鄉的名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

由於這樣一個鉅大的觀念力量，才凝聚了一個龐大而堅固的漢民族。如果說這是「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結果，那是貪天之功，執政黨再狂妄，大概也不敢當的。

台灣割日，同胞紛紛揭竿而起，武裝抗日失敗後，丘逢甲、簡大獅也都紛紛逃回大陸。

● 屈原投水的汨羅江——數千年來多少仁人志士，為民族的憂患鞠躬盡瘁！





八國聯軍長驅直入北京城。帝國主義的入侵，警醒了沈睡的巨龍。

丘逢甲並非有愛於滿清，簡大獅更被清吏出賣予日本，向大陸者無他，「父祖之國」也。

日據下的台胞，除了「半山」如謝東閔、黃朝琴、洪炎秋外，為一睹「父祖之國」，到大陸去過的也大有其人，大家知名的如文學家賴和、鍾理和、張深切、吳濁流，黨外人士如郭雨新、黃順興、蘇東啓。到日據末期高壓更

甚，一些反日台胞在台灣呆不住也往大陸去，如黃師樵。他們可是只受過日本的愚民教育，而沒有受過什麼「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

從一九四九年至今，在台灣的历史上，是台灣人到大陸去（旅行）最少的時期。黨外人士應該知道，黃妮娜在日本讀書時，旅行了一

趟大陸，回台後即被捕；洪誌良到大陸（不論其動機），回來也被捕，尚在獄中。八〇年，報紙公佈一個案子，有一個退役軍人，業計程車，積了一些錢，經日本回大陸和分離三十年的妻子相聚了八個月，實在過不慣大陸生活，又回來了，回來也被捕。又如詩人高準回大陸旅行一趟，也被迫放逐而流亡海外。我們還知道現在「仁愛教育所」中，有不少犯人，只是忍不住與大陸親人相聚的衝動，借機出國，回來就要償付失去自由的代價。

黨外不可扶同為惡

再說，三十年來到美國去的台灣人（不論本省外省），遠比到大陸去的台灣人為多。請問林世民，這難道不也是「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結果嗎？

執政黨為了保衛自己的政權，深恐有顛覆叛亂的活動，而有種種的措施，姑不論是否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但至少我們還是能夠理解的。

然而，三十年來，執政黨以台灣海峽為天堑，不但阻隔了台灣新一代青年對「父祖之國」的嚮往，甚至無情的斬斷了海峽兩岸的父母、子女、夫妻、兄弟的親情。一個計程車司機回大陸與妻子團聚八個月，又能動搖執政黨的政權嗎？一個女學生回去看看自己父祖口中所讚賞的祖國大地，就能推翻政府嗎？一個詩人探望一下自己所謳歌的長江、黃河，又何罪之有？如果有罪的話，為什麼一些外國人或持有外國護照的華人，却可以朝作北京客，夕為台北賓？

我們並不認為支持執政黨的某些政策就一定會有損黨外民主運動的立場，但我們却認為支持執政黨明顯而錯誤的政策，是必然有損黨外民主運動立場的。不幸的，我們發現林世民大作中，以侯德健事件對執政黨的批評，却是以肯定執政黨明顯而錯誤的政策為前題的。也就是他肯定了執政黨阻止海峽兩岸人民非政治活動往來的權利。否則，侯德健以強烈的民族精神進入大陸欲瞻黃河長江之美，又何罪之有？侯德健既然無罪可加，又何以以此加罪於「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黨外果若肯定執政黨這項明顯的錯誤政策，那就必須負起扶同為惡的歷史責任，要負起父母、子女、夫妻、兄弟不得團聚的人道責任。這項責任還牽涉到整個中華民族，黨外負得起嗎？

其實，侯德健的回大陸，並不是什麼「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教育」的成功，而只是執政黨推行的嚴刑峻法在「自然的民族主義情感」前被擊潰了。

李世民指責執政黨「把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頭上」。其實，這也是不實在的。以推介「龍的傳人」的新聞局長宋楚瑜來說，在他那篇成功嶺的講演中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就絕不是「把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頭上」。

是中國的歸中國

宋楚瑜在成功嶺的演講中說：

直到近卅年來，臺、澎、金、馬的中國人終於找到了該遵循的方向和發展的模式，同時，由於大家慘澹經營共同努力的結果，

我們總算是站了起來！

事實上，過去卅年來，我們全國上下在政治、教育、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努力發展的成果，已經把我們的國家推進到一個新的里程，但這並不是某一方面單獨發展進步而已，而是各方面相互配合，才能有今日的局面。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最為世人所矚目的，是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但是，經濟的發展，絕不可能憑空起飛，而是要以社會安定、教育發達為基礎；更重要的，則是人民身心健康、勤奮，政府開明、有為。可是，或許因為我們經濟方面的成就特別突出，而且比較起來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因此就成為國際間注目的焦點。

舉例來說，一向對我們不太友好的美國新聞週刊，在今年三月卅一日出版的一期中，破例地出現了一篇報導我國經濟進步繁榮的文章，標題是：「氣勢洶洶的經濟」(The Juggernaut Economy)。

任何懂得中文的人大概都可以了解，宋楚瑜所說的「我國」就是「中華民國」，就是「台、澎、金、馬」，再對照着全文，也就是「龍的傳人」。「台、澎、金、馬」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因此，宋楚瑜所說的「我國」的民族主義實際上並沒有「把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頭上」，亦明矣。

或者說前引之文只是宋楚瑜談台灣的部分，而不及大陸的部分，他全部講詞中涉及大陸僅有以下一段話為：

中國人一向認為君子要有「有所不為」的操守，而中共却不懂「無所不為」，甚且「無所不用其極」。他們一貫的拿手好戲，就是利用無行的文人替他們做吹鼓手。「文革

」期間，他們利用像韓素英之流的說客，到世界各地去演講，並且寫文章，大吹大捧「文革」運動是如何偉大，如何推動了「中國的進步；但是事過境遷之後，大陸上新的當權派又開始對「文革」加以批判和鬭爭。這樣的所謂「作家」，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美國教授，竟然墮落到成為中共獨裁暴政的傳聲筒，這不免令人感覺到：這個世界上的學術良知、文化良心、道德正義，似乎都有衰微、凋零之虞了。

我想，全世界的任何思想史家也無法在這段話中去發現宋楚瑜對大陸有任何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感情的。民族主義是認同人民的，但在宋楚瑜心目中，大陸有的只是中共，而不見人民。摒除了大陸十億中國人，全世界還能剩下幾個「龍的傳人」？看不見十億的「龍的傳人」，所以他只會責備那些媚共的美國作家和教授，及在他們面前和中共爭一短長而已。要在洋人面前與中共爭一短長總不是民族主義吧？前不久，宋楚瑜曾針對國際宣傳提出「是中國的歸中國，是中共的歸中共」的口號，大家都感到納悶不解，其實，宋楚瑜這句話清楚的說應該是：「是台灣的歸中國，是大陸的歸中共」，而宋楚瑜的中國就只是在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

唏噓感嘆的斷層現象

要說宋楚瑜完全沒有十億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這也是對我們這位青年局長的冤枉，他也和陳映真一樣曾感動於「龍的傳人」的歌詞，在演講中他說：



長城——中國傲世的偉大建築，也是中國民族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每當我聽到「雖不會看見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會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裏。……」心裏不免產生一陣唏噓感歎，時代的鬱悶，千百年來，在知識分子的心中，總是循環不已的。而今，我們為什麼看不到長江美呢？我們為什麼聽不見黃河壯呢？為什麼今天我們的年輕人和我們的大陸，甚至和我們的歷史傳統，產生了一種像許多人名之為「斷層現象」的隔閡呢？而古老東方的這條巨龍，為什麼不能騰雲駕霧於九霄之上，却似遍體鱗傷地困落在淺水之中，被蝦所戲呢？

從長江黃河，從歷史傳流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絕不應只限於宋楚瑜所說的台澎金馬，而為什麼他會這麼說呢？如果說這是「斷層現象」的話，那麼這種「斷層現象」乃是現實權力政治對中國人民族意識的扭曲所造成的。宋楚瑜自覺了這種「斷層現象」，但沒有指出它的原因，更沒有提供解決的方案。

在大陸，共產黨霸佔了中國，橫蠻的要人民「服從黨的領導」，除了對當權派歌功頌德之外，就不准有愛國。在台灣，則叫做「服從政府領導」，似乎除了歌功頌德之外，也不能有愛國。然而任何政權只是歷史的過客

，並不能等同於國家和民族，又如何能夠以「服從黨的領導」或「服從政府領導」來代替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呢？

從歷史文化的觀點來看，中國並不是屬於某一政權的中國，中國是屬於歷史的、文化的、人民的中國。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受亡國之痛，對祖國有更深一層的孺慕之情，但也從來沒有把袁世凱或北洋軍閥的政權等同於國家或民族。今天的大陸誠然為中共所控制，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中共，也必然會在中國歷史上消逝，然而，中國還是中國，民族的洪流是源遠流長的。

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我們不同意大陸是屬於中共的說法，也不能同意「服從黨的領導」或「服從政府領導」式的「愛國」。中國人民的愛國心發自「自然的民族主義情感」，也不是任何政權得以阻擋的。對侯德健的探訪「父祖之國」，陳映真說得對，「任何統戰腔調，任何指責其叛變之指控，都是對於自然的民族主義情感的羞辱」。

民族主義是認同人民的，要使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免於羞辱，要使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恢復正常，民族主義必須從「服從黨的領導」或「服從政府領導」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中國的民主一定要實現。也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宋楚瑜所說的「斷層現象」。

台灣不是美國的禁鱒！

余逢時

外交是一個國家主權的對外運用，必須本着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才不致於受他國所支配，屈於被動地位，遭到侮辱。

然而，考量中美兩國目前所謂的「實質外交關係」，似乎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現象。我方政府動輒宣稱，「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是平等互利的」，「中美兩國一向是以平等交往」。固然，中美關係自斷交以來是愈來愈緊密，彼此不斷維持防衛、經貿、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互利或許是有，平等交往可就令人持疑。但是，雙方緊密合作的結果，是我們對美國的依賴愈來愈高，不論是執政黨或黨外莫不努力要向美國爭取「保護台灣安全」的允諾，而美國也「順水人情」，表面上滿足我們的防衛需求，骨子裏却直把台灣當她一己之禁鱒。

我們之所以這樣指控美國，並不是無的放矢。今年三月卅日，國內聯合報轉刊了美國新聞漫畫家筆下的「隆納·雷根心目中的世界」。這一張幽默的地圖，是揣摩雷根總統的心意畫成的。在該地圖裏，漫畫家把台灣畫得比中國大陸小一點點，同時標明台灣是「我們（美國）的中國」，而中國大陸是「他們（共產黨）的中國」。或許，有人會以為它「具體說明了雷根總統

對台灣的感情」；不過從這張「內藏玄機」的地圖，我們不難發現這是美國人主張「兩個中國」的心態表現。這種外交模式傾向，在美國非常普遍，並不是孤立的現象。

在最近一期的「外交政策季刊」中，美國一位作者艾德蒙·李也撰文表示，「鑑於美國與蘇俄在亞太太平洋發生海軍衝突或爆發第二次韓戰時，台灣深具戰略重要性，華盛頓不可能鼓勵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由此可見，美國人基於戰略考慮，是不願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出現，他們寧可台灣繼續維持現狀直到永遠。所以雷根心目中的台灣，與「我們（美國）的中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今年五月下旬，美國參院共和黨指導委員會共同主席海契參議員，在華府就外交政策發表演說時，曾提出建議：「美國必須和台灣保持一種堂正而讓人尊敬的關係」；同時又主張美國應打所謂的「台灣牌」（Play the Taiwan Card），「以對付中共利用與蘇聯修好要挾美國的作法」，則更露骨地把台灣當玩物。怪哉！所謂的「台灣牌」，一個國家把另一個國家當牌打來打去，還有什麼「平等原則」的存在？海契參議員前面所說的「漂亮」話，是遮羞不了美國超級大國對台灣的「居心叵測」。海契主張打「台灣牌」

，屬於「一中一台」的外交模式，但仍然跳脫不出「兩個中國」的政策，益加驗證了美國視台灣為禁鱒，蓄意阻撓中國統一的可能發展。

至於把台灣視為禁鱒，卑劣無恥地表現在言論上的，則非共和黨眾議員李奇、民主黨眾議員索拉茲之流莫屬。過去，他們不斷地在美國國會提議案，「台灣的前途應以和平、沒有脅迫及符合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和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所簽訂的公報之方式解決」。儼然以台灣的「監護人」自居，彷彿台灣已成爲美國的第五十一州，其前途必須由美國國會議員提案討論作決定似的？

老實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中國人自己會決定台灣前途，根本不必美國國會議員「多」心！台灣前途的決定，是中國人的內政，任何人宣稱「台灣前途應符合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之方式解決」，都是嚴重觸犯中國的主權獨立，我們絕對不敢苟同。

以上所舉證的，只是信手拈來二三；類似這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視台灣爲禁鱒的言論，更是不勝枚舉，舉多了徒傷感情，不多舉也就罷了。過去卅多年來，我們一直尊重美國在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以及其爲國際和平與安全所作的貢獻。因此，我們對美國太「尊重」了，以致於落人口實說我們是「親美」。

但是，令人遺憾的，美國人不懂得「推心置腹」，加上超級強國的心態作祟，却難以平等地位待我，以致於各種干涉我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妨礙中國統一的「邪說謬論」充斥其間。今天，在全國上下高倡「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聲浪中，如何爭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正途，台灣不是美國人的禁鱒，過份依賴美國超級大國或任憑美國擺佈，都只有自取其辱！



寫作是一個思想

批判和自我檢討

的過程

——訪陳映真

■李瀛

陳映真終於將他「遠行」歸來所發表的一系列小說「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萬商帝君」，結集成「雲」出版。陳映真是國內對於戰後國際資本主義跨國體制，以及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具有反省力與批判力的文化工作者。他似乎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一位作家更關注台灣資本主義化下的內面生活、人性矛盾和文化衝突。正如他在華盛頓大樓第一部「雲」序裏所說：「文學和藝術，比什麼都更以人為中心與焦點。現代企業行為下的人，成為『華盛頓大樓』系列關心的主題。」

由於他曾在外國公司裏做過事，因此其文學思想，不完全是來自於理念，而是有實際的

生活經驗為基礎，這種對於現代企業下人的異化之本質的探索，以及凝視聳然傲岸的華盛頓大樓、對於人性尊嚴的維護、對於日漸崩解的固有文化的關切，乃使他的小說成為現階段台灣文學中具有比較特殊的文化、思想的特質的作品之一。

批判跨國經濟的問題

▲「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焦點，在於台灣的跨國公司中人的問題。為什麼這個題材那麼吸引你呢？

△做為第三世界社會的作家，跨國公司有這些理由引起他的注意：

●現代跨國企業是在這些條件上建立起來的：第一，歷史上空前龐大的資金，透過國

際銀行集團，使資本的國際性集中和積累成為可能。

●第二，這空前龐大的資金，使國際規模、超國家的營運預算成為可能。特別是它的「研究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部門，預算之大，超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科技、文教預算。這麼大的財力，使它可以在跨國範圍內，調動最強大的人力和現代科學技術，進行任何國家和政府都無與比擬的大規模研究工作，形成科技的高度壟斷勢力。

●第三，為了銷售其產品於世界市場，它發展和運用現代空前強力的大眾傳播技術知識、廣告技術和知識、行為科學、心理學、組織成空前強大的行銷活動，創造和操縱人的消費慾望，並且在這甜美的操縱中

，利用、改造、破壞各市場國家和民族原有的文化特性和價值體系，深刻地影響到人的生活。

●第四，跨國企業和強權政治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深刻影響弱小國家的命運。

●在國際性利潤貪慾下，跨國企業向落後國家的生態環境、醫藥法律、農業用藥法規……挑戰。它並且以「現代化」、「進步」、「富裕」、「消費主義」、「國際主義」向弱小國家的自尊心、民族主義、傳統節制的、尊敬自然的哲學挑戰。

跨國企業這些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並不是以利炮堅船加在弱小國家的頭上。它是以甜美的方式——「進步」、「舒適」、「豐富」、「享樂」……這些麻醉人的心炙的消費主義，加在我們的生活和文化上，需要一點批判的知識，才能透視它的真相。台灣知識、文化界的一般，似乎對之渾然不覺。既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和關切，寫自己所注意關切的問題，對於作家，怕是極為平常之事。

▲你覺得「華盛頓大樓」系列第一集，充份地在文學上達成你理想的高度嗎？

△不。有些故事寫得尚可，但在批判思想上存在着弱質。它沒有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換言之，有些故事背景改為土著資本企業，也不影響故事的內涵。「萬商帝君」，在自己看來，是比較深入探討跨國企業下的文化、民族認同、人間疏隔這些問題。但一般反應，似乎認為故事太為思想服務，枯燥無味。說起來，這是我才華不足，不能像卓別林、布列赫、蕭伯納那樣，使思想的宣傳充滿着藝術的芬芳。我一定要再努力才行。

寫作技巧也是哲學問題

▲如果一個作家太集中焦點於一時、一地的問題，一旦這些問題在百年而後，失去它的重要性，豈不使作品失去重要性？你有沒有想過比較永恆的題材？

△每一個藝術家最大的夢想，是能成就千古名山之業。

但是這是主觀願望。沒有一種「事業」比文學更無法單靠努力或計劃就可以獲至客觀的成就。我因此從來沒有過名山之業的想法。對於我，寫什麼遠比怎麼寫重要得多。技巧的問題，是每一個匠人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沒什麼好談吧。在一定的歷史時代的一定社會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說了什麼——關於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天的關係這些問題，那個作家想了什麼？說了什麼，這才是藝術的中心課題。

對於寫出「永恆」、「偉大」的作品，我不敢奢想，實在是因為我自知才華大大不如托爾斯泰那種等級的作家。因此，任何人不必為我能不能永恆操心（笑）

▲談到技巧，你是被認定不論在語言上、結構上重視技巧的作家。現在你却告訴我技巧不重要（笑）。你批評現代主義，但人都以為你從現代主義學習了不少技巧上的藝術。不知你自己的意見如何？

△方才說：技巧是一個走上文學工作的人的最起碼的要求，就彷彿肌肉發達，動作和反應敏捷是一個運動員最起碼的條件一樣。一個藝術家，出手就有技巧，出手就自動地思考

表現技巧的問題。這是第一點。

其次，技巧並非一定要花腔雕琢、怪異才真技巧。楊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動人，必不在現在人們所謂的「技巧」上，而是在楊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後巨大無比的人間性和人間愛。

再次，技巧，不是先驗的，客觀的東西，還有一個哲學的問題。對於技巧之巧拙判斷，是一個價值的問題。用什麼立場、什麼觀點去評斷技巧的優劣巧拙，結果是彼此大有不同。現實主義之以為善，恰好為形式主義者之所惡。

第四，說技巧來自現代主義，是一種在台灣所流傳的錯誤。技巧，尤其是偉大，歷久長新的大技巧，往往不但古已有之，簡直古今中外皆有之。時空的交錯、語言的精緻，敘述觀點的著落……從來就存在於古來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現代主義的「技巧」，往往都只能是發明者用一次就已墮落的東西。把臉畫成三、四個向度，抽象、意識流：第一個發明這些技巧的人，有技巧上的智慧。後繼之人，但覺痴愚學舌罷了。

沒有覺醒的知識份子就沒有大眾性的文學

▲在理論上，你主張文學的大眾性。可是你的小說，毋寧是知識份子的小說。特別是像「萬商帝君」那樣的作品。

△沙士比亞、狄更斯、都是偉大的群眾性作家，同時也是最知識性的作家。我絕對沒有那麼大的才能。我始終自以為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家。

受到自己的階級、文化的限制，我從來只想做好一個小知識份子作家。文學的大眾性，還有一個座標的問題。有些人以為民眾永遠、生來就是愚昧不文，而且會永遠如此。因此主張文學的非大眾性格。其實，文學的大眾性，除了作家要受到教育，民眾也要受到教育。一方面是作家在一定認識上丟棄個人的東西，努力去理解民眾的願望和要求，一方面是大眾主動爭取接受文化，並提高自身

的認識水平，而且絕對可以提高自己在文化、藝術和文學的創造力和欣賞力。台灣的情況，恐怕是知識份子的教育佔着急切的重要性。我們的知識份子，普遍在知識、批判力、文化和思想上還很貧困。他們應該讀一點費腦筋的東西（笑）。沒有覺醒的知識份子，就沒有大眾性的文學。因為文學的大眾化，基本上存在着寫什麼，為誰寫，為什麼寫和怎麼寫的深刻問題啊。

文學應該使人和睦

▲有人擔心像你強調國際資本主義下第三世界民族命運的文學家，會和主張先高舉本土性的台灣文學派，發生無謂的矛盾……。

△這是一個目前無法徹底討論的問題。有禁足嘛（笑）。

第一，把主張、哲學上的不同暫時擺着，讓我們努力寫出好作品。

第二，「台灣」也罷，「本土」也罷要注意它的具體內容。我只是說，所謂一些人含淚高舉「台灣」——它的文化、傳統、特質——在國際行銷體制和國際消費文化中，正在每時每刻，一寸寸地崩解。這似乎是本土論

著所未察的……。
我主張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文學應該使人和睦，不應該製造紛爭。

回顧五〇年代

▲「鈴鐺花」寫五〇年代。和「華盛頓大樓」系列不同。有計劃另寫一個系列嗎？

我開始往回頭看，回想着白色的、荒廢的五〇年代。這說明我老了（笑）。

寫小說，對於我，是一種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我終於能冷靜地回想那個時代的意義。寫「鈴鐺花」，是對於向着歷史的近代躍動的台灣和中國的審視和思考，也是對於我自己的思想和過去的實踐的審視和思考。我準備做一點研究。幼時的印象，傳聞和經驗，對這研究有助益。研究有一點眉目，我就寫。也許華盛頓大樓第二集的計劃暫時擱一擱……。

▲對於台灣的文學批評，有意見嗎？

△台灣缺少獨立的批評。許多作家都兼任當然的評論家。這是個惡傾向。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笑）。

批評人說話不負責任，不考慮所說的合理性，台灣有一種說法：「講出就是話」。現在是「寫出就是文章」。個個都是大師。文學批評、評論可任意為之，不必要推論的過程，專斷、蠻橫、文風之惡，真不知後人如何去理解我們這一個時代的文化的貧困。矯枉必需過正吧。現在我們需要有一點嚴謹，有規有矩，受過嚴格訓練的評論。否則黨同伐異，互相或自我吹捧，品質低劣的文學評論就沒個完。

▲往後看，有什麼計劃？

△年紀越大，越渴望專業——或半專業寫作。在島內各地旅行、寫筆記、談書、研究——為了寫東西。這是我的大夢，但實現的機會太小了。但我還是要爭取寫作，寫出比較好的作品。我知道我還需要努力，還需要長時間努力生活、思考和寫作。我生活也太忙了。花在為了吃飯的工作上的時間太多了。要努力在這樣的生活學習和寫作。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學搞一搞……。具體說，華盛頓大廈系列寫完它。十一層的大樓，才寫了四層，後頭還七層。慢慢蓋起來吧……。對於五〇年代的研究，也可以寫成系列。但兩個系列，都要先搞點研究。

中國需要思想 有批判力的作家

▲也許有人擔心，根據研究寫的東西，會不會太生硬……。不少人喜歡你較早的作品。

△寫東西的人既不應驕傲，老是一幅老子天才奇才，別人什麼都不懂的樣子。他應該在善於聆聽別人（文評家、讀者）的聲音之餘，有自己的想法。依照自己當面的認識、思想和情感，獨立地、誠實地，努力地寫下去。一定要許可自己寫出較差的作品啊——特別是在尋求一個思想或形式上的突破時，尤其如此。想要每出手都是傑作，除非天才，那是主觀願望，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其次，作家要有一份謙虛的獨立性。有時候必要把批評家、讀者留在後頭，讓他們埋怨、吃驚、困惑；你照舊走你覺得應走的路。以黃春明為例。許多人不習慣「蘋果的滋味

「以後的黃春明，彷彿一定要他們的作者回到「看海的日子」不可。其實，在我看，「蘋果的滋味」是春明在藝術上的一個大躍進。在台灣，我以為他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位有認識，有批判力、又有豐富原創力的作家。「蘋果的滋味」以後，一直到最近的「大餅」，都在孕育着一個更大的春明的形成。看着好了。

至於我自己，因為總改不掉「寫什麼比怎麼寫還重要這個想法，寫生硬一點，差一點，也只好任之。那不是我的寫作觀念的錯。有錯，就錯在我沒那麼高的才，可以讓任何程度的讀者都開心。但馬奎滋、布列赫特、波爾、沙特；他們不全是以自己的思想和研究為作品的主要多魂嗎？中國需要這樣的作家。

七七抗戰紀念 講演會

專題講演：認識日本

楊仲揆：日本人的民族性

(中華學術研究中心·琉球研究所前所長)

陳嘉驥：日本在東北的細菌實驗

(中央社派駐東北記者)

蘇慶黎：日本產軍複合體與
軍國主義的發展

(夏潮論壇總編輯)

許良雄：日本經濟對台灣的影響

(中華雜誌總編輯)

自由討論

胡秋原：總結

時間：七十二年七月廿日下午七時

地點：台北市耕莘文教院

發起者：中華雜誌社

贊助者：人與社會雜誌社

大學雜誌社

夏潮論壇雜誌社

文季雜誌社

科學月刊雜誌社

政治評論社

益世雜誌社

人權論壇社

新生代雜誌社

縱橫雜誌社

笠詩刊社

環宇出版社

學術出版社

人文科學研究會

反共愛國聯盟聯誼會

世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

松竹梅文化基金會

民權通訊社

帕米爾書店

婦女新知雜誌社

長風雜誌社

從江文也的

遭遇談起

■ 陳映真

史惟亮口中的 台灣籍老師

頭一次聽說「江文也」這個名字，是約莫在二十年前，爲了「文學季刊」去採訪史惟亮先生時，從他的口中聽到的。還記得當時問的問題，是爲什麼史惟亮先生一開始就走向中國民族音樂這條路。史惟亮先生沈靜地說，那是因爲他在北京學音樂時，遇見了一位叫做江文也的台灣籍老師。江文也先生先把世界上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的音樂，巨細靡遺地介紹給學生，然後告訴他們，中國的音樂家，應該走向繼承和發展自己民族的音樂這條路。就這樣，史惟亮儘管又去歐洲進修多次，却把一生全獻給了中國音樂的研究、整理和創作的的工作，直至病歿爲止。「文學季刊」訪問他時，正好是他和許常惠先生到台灣山地十個少數民族採集山地音樂，但因經費無著，無以爲繼的時候。

讀完了謝里法先生的大作「斷層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心中激盪着一種深沈的哀痛，不覺久久凝視着印在文章面頁的江



文也先生的照片。穿着素樸的白襯衫的，少壯時代的江文也，迎着陽光，向遠處凝視。在五〇年代渡過少年時代的我，在這幀照片裡嗅出許多五〇年代的氣息——很少剪飾的頭髮，白港衫……。這樣一個看似充滿着理想的人，却經過難以相信的長時期的政治上的抑壓，終至百病纏身，臥病不能起，瘡痍不能語。

在大陸台籍人士 也受到衝擊

因爲投身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抵抗運動而逃往大陸的台灣知識份子具體地經驗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台灣知識份子，有很大一部份人，以不同的程度受到文化的、思想的衝擊。根據一些資料（包括文學作品）看來，這衝擊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和社會生活，另一個是政治生活。

懷抱着單純的對於「祖國中國」的熱情，到了大陸，却看見一個社會凋敝、文化解體、生活、觀念和習慣還停留在「前·近代」階段的中國。對於中國近代史，對於整個爲了國家的獨立與民族解放而激盪中的中國和全第三世界的歷史運動沒有深刻理解的台灣知識份子，在這樣的沖擊下，始而驚駭，繼而疑惑，再繼而拒斥，這都是容易理解的。

在政治上，落後的政策和思想，對來自台灣和東北等淪陷區的知識份子加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歧視，使他們落入巨大苦悶、失望和認同失落的苦痛之中。在鍾理和與吳濁流的一些小說中，生動地表現了這種苦悶與痛苦。

老實說，我會一度相信，當時左翼的台灣知識份子，不會遇見這些問題。我相信主觀上

，當時的左翼台灣知識份子，在接觸了祖國的落後時，他應該有力量去認識到那是國內不良的政治條件和來自國外的帝國主義壓迫所造成的。我也會相信，客觀上，中國的左翼對於影響中國人民堅強團結的漢族沙文主義，應該有理論的、政策的批判力，因此對於左翼台灣知識份子，不會造成錯誤對待引起的巨大沖擊。

但是，這想法顯然錯了。「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共當局藉著把一切罪惡歸給「四人幫」所透露出來的嚴重錯誤，早已暗示了這事實。滯留大陸的台灣左翼知識份子，可以超越近代化殖民地台灣和前·近代中國之間的文化性和社會性的差距造成的沖擊，却終於逃脫不出中共的政治沖擊。這種沖擊的因素十分複雜：諸中共黨內長期存在，想解決又屢次無從解決的，關於錯誤對待革命知識份子問題；教條主義；「左」傾風，以及目前在大陸民主批評派所指責的社會封建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

江文也背負了 莫須有罪名

據謝理法先生的資料，「反右」以來，江文也背負了這些「罪名」：

一、反社會主義：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為日帝忠心效勞。寫過「大東亞進行曲」、「新民會歌」、「新民之歌」等反動侵略歌曲，並為侵略影片「蘇州之夜」配樂。

二、賣國求榮：一九三六年，曾以日本公民身份，把作品參加希特勒德國舉辦的國際音樂比賽，為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寫慶祝音樂。甘心充當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奴才。

三、投靠美帝及蔣介石反動派：把自己歌

頌日帝的作品「孔廟大成樂章」轉送給蔣介石獻媚。並為京、津兩地美國領事館、美兵俱樂部等作學術講演及演奏。

四、對學生灌輸毒素：

A、惡意歪曲、諷刺社會主義說：「現在什麼都講社會主義的速度，要速成，因此就不需要研究得那麼細緻了。」

B、散播資產階級觀點：「中國的和聲風格好辦，只要是五聲音階亂堆就可以，五聲音階是天下大協和。」

C、提供反動資料：在講課時別有用心把許多資產階級反動的、形式主義的作品給學生參考。

五、裡通外國：解放後，他託人把作品帶到香港去找天主教或美國領事館設法出版。這樣作用意在為自己製造影響，便於將來逃離祖國。他在一次學習會上說：「如果中國和日本建立邦交，我要乘第一架飛機到日本去。」

六、埋怨社會主義祖國，為自己醜惡的歷史辯解，認為「台灣人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是必然的」。把自己說成「拋棄一切回到祖國服務」，幾十年來却「得不到祖國的溫暖」、「新中國同樣是歧視台灣人」。對中央音樂學院的黨和行政領導大肆污蔑說：「學校領導工作搞得這麼壞，就是台灣派來的特務也不致於把學校搞成這樣糟。」又說：「台灣派來特務也幹不出來的事，統戰部却幹出來了。」

七、思想分歧：在台灣問題上，他揚言「廖文毅的宣言有相當號召力，得到台灣人的共鳴」，「別看他現在人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還說：「共產黨管不了台灣人的事，台灣要施行高度自治。」等極端反動言論。

拋棄一切回到祖國， 卻得不到祖國的溫暖

從第一項到第三項，又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性是莫須有的誣陷。這只要想一想劉少奇、彭德懷這些人，方其被圍之時，甚至有「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就可以思過半了。鬪爭江文也，他的日本求學、在殖民地台灣生長的背景，當然是羅織誣陷的好資源。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材料本身是真實或有幾分真實。但罔顧一個人認識的發展過程，罔顧一個人歷史的、社會的條件，不看他在日後的政治選擇和平時政治生活的事實，動輒揪小辮子，這和中世紀宗教裁判何異？何況，有沒有一個公正公平的機會，讓江文也為自己辯白，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第四項下各條，看來更是無理。四項的A條，可以理解為一個注重細緻研究的知識份子，認為當時之「速成」風，不但對學研本身不好，對社會主義也不好。B條批評中國和聲的品質，但不見得這就是看不起中國音樂。魯迅痛烈批評過中國傳統中黑暗、落後的部份，却沒有人誤解過他的愛國情懷。至於四條，和史惟亮的述懷對照起來看，知道江文也可能認為要學生走中國音樂的路，不是一味封鎖西方「資產階級反動的、形式主義的作品」，光教中國音樂就行。相反，江文也把世界上各種音樂呈現給學生，詳加介紹與比較，最後讓學生自在、自信地走向中國音樂的建設。如果這是江文也的教育方法，說他「提供反動資料」就是羅織了。

有關第五項，事實不明，無法評估。

第六項，尤其叫人心酸。江文也說「台灣人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是必然的」，也要看上文怎麼說。如果這句話的意思是類似「在日本殖民地台灣成長的台灣知識份子，或者因為在壓迫下不得已，或者因為思想覺醒先後不同，做出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事，是必然的」，那麼，江文也的話，就有辛酸的真實性和控訴性質。江文也「拋棄一切回到祖國」，幾十年來却「得不到祖國的溫暖」，用台灣經驗去理解，我們寧可信其真。這是多麼沈重、心痛的控訴！至於批評學校領導工作，從中共的許多文件所批評的官僚主義作風看來，完全可以理解。突出台灣在歷史過程中的特殊性，主張台灣的「高度自治」，在今日為中共統戰口號，在昔日又何以罪大惡極啊！

封建主義和 社會法西斯主義 嚴重破壞人民、 知識份子的團結

背負着這些罪名，從五〇年代中期「反右」運動起，江文也有慘痛的遭遇。做為一個音樂家，他寫好的作品被長期殘暴地糟踏，等到名譽恢復了，要演奏他的作品，還得到塵封的倉庫中去找。至於他創作的自由受到怎樣的壓抑，不言可喻。對於一個藝術家，有什麼壓迫比這更大呢？

「左」傾的政策，沒有深厚的文化根底所表現出來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和教條主義化，中共黨和政治生活中缺少客觀的、制

度化的民主主義，都是江文也連同大陸上所有愛國知識份子橫遭摧折的原因。但從最根本處去思考，則恐怕是不會經過資本主義改造的，中國前近代社會的落後的物質條件，反映到中共體制中，馴至在一身毛裝，滿口馬列革命語言的外表下，頑強地存在着落後的性格。而這個性格，便行化成各式各樣的社會封建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嚴重破壞了人民、知識份子的團結，在政治、經濟、文化、學術、藝術、文學上，帶來令人難以置信之慘重而深遠的破壞。

受迫害的是 全中國的知識份子

謝理法因此沈痛地說，近代台灣人的痛苦，特別在她與中國交涉的歷史上，簡直背負着沈重的「原罪」。從分確主義觀點看，或者也不無道理。問題是：中共的錯誤政策下犧牲的愛國知識份子，全部是、或者絕大多數是台灣籍知識份子呢？抑或全中國的愛國的知識份子，都無法倖免呢？最近，我讀到名鋼琴演奏家傅聰的父親傅雷寫給他兒子的信，想起像他那樣嚴肅對待自己，熱愛國家，對中共寄與極大希望，有高潔的靈魂和深刻人文素養的中國知識份子悲慘的下場，心中的悲戚和慘痛，和讀江文也的遭遇時一樣無從排遣。吳晗、巴金、蕭珊、胡風、艾青、丁玲、翦伯贊、陸侃如、馬寅初、梁漱溟、費孝通、儲安平、章乃器、陶孟和、熊十力……這些優秀的、愛國的作家、文化人，背負了什麼樣屈辱的罪名，遭遇了多麼悲慘的命運。而這些，還只是比較著名的人物。至於中下結構中的知識份子、教師、

技術人員……遭到沖擊的人，真是不知凡幾。就在大陸的台灣知識份子，蘇新、蕭來福、王萬得、謝雪紅這些人，全受過抑壓，背負過污辱性的罪名，遭受過各種壓迫。

這豈止是「台灣人的原罪」，簡直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原罪」。但如果有人這麼反駁：「我不管中國人的事。台灣人有委屈，所以……」我還是只有俯首不語罷了。

但是，身為台灣人，我常有這樣的苦悶：台灣人特別嬌嫩嗎？特別需要別人格外愛惜嗎？特別喜歡吮吸自己的傷口，特別需要自己憐憫嗎？思索到最後，逐漸覺得，台灣人需要有一種品質：和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民一樣，自主地、不特別嬌弱、卑屈、自憐，更不特別倨傲，那樣地，為了自由、民主、民族團結與和平的中國而奮鬥，並且在這奮鬥的過程中，治療歪扭的歷史給予台灣人、東北人和全體中國人民帶來的各式各樣的心靈的疾病。

你們被捕了

兩夫妻打架，老公拿西瓜刀，以斗笠為盾，老婆拿菜刀，以鍋蓋為盾。

忽然警察進來查戶口，見狀喝道：

「站住。」

兩夫妻一愕。

「你們都被捕了，根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你們未經許可無故持有刀械，要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

「我拿的是西瓜刀怎麼算刀械。」

「不管東瓜刀西瓜刀，用來打架的刀就是刀械，你們趕快束手就擒吧。」